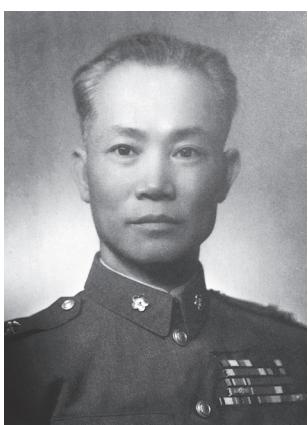


第六章 抗日战争中的黄琪翔

一、南京的邀请

黄琪翔与陈诚的关系，正如黄琪翔所言：“我和陈诚旧雨重逢，颇为相得。”“我和陈诚早在20年代便建立了师生关系，当时我担任保定军校任第八期的炮兵队长，陈诚是我的学生。大革命时代，陈和我都是由第四军起家的，后来陈调往黄埔军校任教官，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¹第四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黄琪翔和陈诚都是第一师的军官。黄琪翔任第一师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张发奎）副营长时，陈诚是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属下的连长，所以黄琪翔说他俩都是“第四军起家的”。

陈诚的确很欣赏黄琪翔。除了黄琪翔自己所说以上这两种关系之外，还应该看到陈诚的为人性格。陈诚这个人身材不高，气量很大，用人唯才，较不论籍贯、派系，只要善战，有才能，大都争取。随着陈诚在军中地位攀升，势力越来越大，被称为国民党军事主力“土木系”的首领——他起家的部队是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因“土”拆



陈诚

¹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四十三辑，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p3。



1936年，黃琪翔夫婦返國後，在上海《申報》刊登的結婚啟事。啟事中說他們結婚的時間是“本年”，事實上在1934年7月間，已經在德國柏林結婚。

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其麾下的将领也主要来自于此，故而被戏称。但还应看到，陈诚对有资望的指挥官是很尊重的，他曾说，可让张发奎指挥他的第十八军，以示信任。他对黄琪翔亦如此，因为黄琪翔是他心目中的好军官。

到了1936年，陈诚已在国民党军中崛起，成为蒋介石在军事集团中主要心腹干将，是所谓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这或许是得益于蒋介石的栽培——早在1931年12月，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女谭祥在上海结婚时，就是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

而且宋美龄还是这门婚事的红娘。黄琪翔说：“当时陈已是蒋介石的一员宠将，对于安排和笼络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权力。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中，我先后做了陈诚的助手。”¹

当时，中日关系已相当紧张，黑云压城城欲摧，中日必有一战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举国人民都在高呼抗战。国民政府也已悄悄在制定抗战计划，即《国民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该计划由参谋总长程潜上将主持制定，于1936年底送蒋介石审定，蒋又叫陈诚去认真研究。这说明，此时正是国家急需用人的时刻，特别需要那些曾经创造过辉煌战绩的军事将领。

为回应祖国召唤，身为军人的黄琪翔没有犹豫。他收到陈诚的电报后，立即收拾行李，带着妻子郭秀仪回国报到。

黄琪翔郭秀仪夫妻赶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的《申报》，刊登“黄琪翔郭秀仪结婚启事”：

我侪意诚相投，情谊素笃，经双方家长同意，于本年
在德国结婚，兹值海外归来，谨登报奉告诸亲友。

黄琪翔旋赴南京，已是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与一批高级军官同时被扣西安，其中就包括陈诚。所幸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达成了联合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最大成果是中日两国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至此进入战争的预备状态。

“西安事变”爆发后，黄琪翔内心焦急。他担心在外敌入侵之际，国内将发生重大内乱。黄琪翔回忆说：“我回到上海，正值发生西安事变。我当时怀疑蒋介石将被杀，国内将兴起大规模内战，抗战将无法进行。后来，中共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将蒋介石释放回到南京。这大出我意外。蒋介石回到南京，陈诚亦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p3。

同时回来。”¹

黄琪翔在等待与陈诚会晤的这段时间，他重新与各党派的民主人士走动起来，并且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关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提交给蒋介石的报告称：

“近社会民主党、生产党、第三党、新国民党、民权联治党、国社党等各派分子，自黄琪翔返国后，均在进行拉拢合作，如胡秋原、余慕陶、王独清、彭芳草、严灵丰、徐谦、张君励、王捷侠、李世章等。均由黄（琪翔）拉拢，联合一致，向中央接洽投诚，籍获优越条件。”²军统特务报告所言“向中央接洽投诚，籍获优越条件”，无非是指各党派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联合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抗战。

1937年的年初，黄琪翔终于在南京见到了陈诚。

谈到黄琪翔的工作，陈诚最初考虑，想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中将高级参谋，作为军事将领储备起来，理由是黄琪翔夫妇刚刚返国，可以先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这与满怀报国之情的黄琪翔的意向大相径庭，因此黄琪翔非常不满。

黄琪翔对陈诚说：“辞修（陈诚字辞修），我不远万里回国，就是为吃一碗闲饭吗？”

陈诚最后说：“工作的事，容我们再想一想，还是先安排你和委座见个面吧。”

很快，在陈诚陪同下，黄琪翔去南京总统府觐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很忙，但对黄琪翔很客气，简单问了一下他现在的情况。

他们之间毕竟结下了太深的恩怨。黄琪翔一生有多次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运动，不惜以武力对抗：比如1931年参加了流产的邓演达领导的武装起义；再比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在这些事件中，黄琪翔都担负着重要角色，这是很难回避的严肃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46-095。

问题。

蒋介石表现得极为豁达，对待历史问题，他态度很爽朗地说：“原是一家，旧账不算！”¹然后又说，“御行啊，以后有事的话，可以和辞修多商量。”便结束了会见。御行，是黄琪翔的字。

黄琪翔惴惴不安的心安宁了下来。因为蒋介石没有记恨他的过去，至少是在表面上如此。蒋介石也没有说到怎样与共产党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其实蒋介石心知肚明，黄琪翔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蒋介石随后电令军委会徐永昌：“本会高级参谋如有缺额，请委黄琪翔、叶挺二员。补充等事，请与辞修便商之。中正。”²

关于黄琪翔与陈诚别后重逢的具体时间，各种资料只大略记载为“1937年初”，现据台湾新近出版的陈诚日记³可知，他会晤黄琪翔的时间当在3月，其日记中涉及黄琪翔的工作安排等问题，有四次记载。

当时，陈诚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正在全力处理“西安事变”的后续问题，在南京和西安间不停地来回奔波，还正在撰写“国防军战斗序列草案”、“国防部组织系统表及配搭表”等，工作十分紧张繁忙。陈诚在3月3日这天，上午“谒委座”蒋介石，下午三点又“谒汪先生精卫”，其在晚上撰写的日记中写道：“对琪翔、武夷（叶挺）准以名义”，说明陈诚就黄琪翔的“出山”问题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批准“准以名义”，而非委以实职。

3月5日，陈诚又在日记中写道：“对黄（琪翔）、叶（挺）拟分任炮交兵签。”“晤向华（张发奎），商叶、黄名义。”这就说明了针对黄琪翔、叶挺的职务安排问题，陈诚与张发奎进行过磋商，因为黄琪翔和叶挺都曾是张发奎的旧属。

3月11日，陈诚因为老家被“匪”所抢，母亲去丽水，陈诚

1 完颜绍元文章《暮境坎坷的黄琪翔》。此资料为剪报，缺失版权页，由黄琪翔后人保存。下同。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10200-00174-014。

3 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7月印行《陈诚先生日记》（一）。

向蒋介石请假后去看望母亲。黄琪翔与陈诚结伴由南京赴上海。陈诚写道：“今早，偕黄琪翔、刘为章等来沪。寓华安。”

1937年4月，陈诚邀请张发奎、黄琪翔等同往温州、台州等沿海地区视察地形。这是为进行淞沪会战做前期的准备。

4月19日，徐永昌向蒋介石报告：“经与陈诚兄协商后，拟委派黄琪翔、叶挺为中将高级参谋，各月支薪五百元”。蒋介石批复“如拟”，即表示同意。可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中央将的月薪是法币500元。

黄琪翔闻知自己的任命后极不情愿，又跑去找陈诚。此时，陈诚将往徐州转开封，在其动身之前，黄琪翔找到了陈诚，表达了自己的不悦心情。陈诚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黄琪翔来谈，不愿就高参。”

黄琪翔对自己被任命中将高参并不满意，是因为他希望回国能为抗战出一份力，而不是虚职。其实他不知，陈诚此时为了他的事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就在黄琪翔返国后，蒋介石侍从室就通知情治部门调查黄琪翔近况。1937年5月28日，宪兵司令部提交了相关情报。6月2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这份报告批复：“移交陈次长辞修察核”。

这份情治调查报告系毛笔手抄件，内容是：

黄琪翔派员至（北）平活动。平讯：第三党首要黄琪翔近仍暗中活动，图谋不轨。现派一亲信彭某至平活动，联结各党各派，以反国（民党）反共（产党）为号召，大肆活跃，并进行拉拢冀察当局。但前数日，该彭某仅得会见秦德纯一次。

据邓悌称，黄琪翔确为第三党首要，与陈铭枢在欧活动甚力。黄主持在德之活动，彼被召返国前，尚在德公开反对中央与我领袖，现虽委以职务，但其言行仍宜注意。

钱大钧谨注。¹

¹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93-001。

陈诚看过钱大钧这份批注的报告之后，不动声色，依然在为黄琪翔的改任而努力，遂黄琪翔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炮兵监，具体时间是该年的6月18日。何应钦在提交的人事任命报告中，炮兵监一栏写“拟以黄琪翔、刘翰东、邹作华三人中择一充任。”蒋介石批示：“黄琪翔可也。”¹

黄琪翔在自述中也说：1937年“我和陈诚商议结果，搬家到南京住下。最初，军委会任命我为中将高级参谋，我拒绝接受。1937年夏，改任我为训练总监部的炮兵监，主管炮兵训练事宜。”²

陈诚家眷与黄琪翔家的走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谭祥与郭秀仪交往密切。郭秀仪的美貌和爽快个性，给谭祥留下很深的印象。而谭祥与宋美龄是留美同学，俩人接触更多，闲谈中，或将黄琪翔新婚妻子郭秀仪的情况告诉了宋美龄。

宋美龄认识黄琪翔。1929年国民政府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姐姐宋庆龄自德国返国，她的随员就是黄琪翔将军，所以她对黄琪翔新婚妻子郭秀仪，似乎也格外留意。这可能为宋美龄在随后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中，主动提携郭秀仪参与社会活动，埋下了伏笔。

由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改任为训练总监部炮兵监的任命下来后，黄琪翔虽然还是不怎么高兴，但他也知道，这些都是过渡性的工作岗位。

黄琪翔回忆说：“是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和各军高级军官到庐山训练团训练，我亦被调参加。训练的内容，除一般军事课外，还有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言论等等。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期间，黄琪翔还给训练团的成员讲过课。黄琪翔回忆说：“在庐山受训期间，爆发了‘七七事变’。蒋介石当时在庐山邀集全国各方代表开会，发表了抗日讲话，表示决心抗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84-007。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战。同时，参加庐山受训的军官也分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我回到了南京。”¹回到训练总监部炮兵监，黄琪翔根据自己的经验，为炮兵训练撰写了《战时炮兵》，供炮兵训练使用。

8月1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叶剑英急电中央书记处，建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8月9日，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成员飞抵南京。

在南京，黄琪翔与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见面了，朱德也是老相识，所以他们相见甚是高兴。黄琪翔说：“当时南京正和中共方面进行接触，商谈团结抗战问题，我和周恩来、叶剑英等也曾经为此有过来往，受到他们的鼓励。”²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关于抗日合作的谈判，在细节上时有不顺，所以周恩来特意找到黄琪翔说，希望由他出面邀请张群出来个别谈一谈，摸摸底。张群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长。于是，黄琪翔出面约好了张群，然后再通知周恩来。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南京的黄琪翔公馆。这次国共双方要员的会谈，是中间人黄琪翔以私人的名义发出邀请，形式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黄琪翔的公馆，位于南京市中心的五台山，一个绿草青青的花园洋房。“黄公馆”的具体地址在何处？今已不详。黄琪翔夫妇当年在南京住过多处地方，如南京上海路永庆里十三号³，还有如今的门牌号为南京上海路11号-6的建筑，⁴可是，有证据显示，此处房子是郭秀仪于1948年购买的。这都不是黄琪翔夫妇当年居住的公馆，也有人说他们当时是借住在黄镇球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黄琪翔夫妇于1937年的住所，必定在南京五台山附近。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1947年外交部致信黄琪翔的地址为：上海路永庆里十三号黄公馆总司令剑灵转黄琪翔。见台湾“国史馆”“外交部”驻欧洲国家使领卷，典藏号020-100300-0141。

4 根据南京市政府网站显示的一份关于《2015年市政府提案第0581号：关于抢救黄琪翔故居的建议》的答复，南京市上海路11号-6的建筑，就是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的故居。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团代表朱德（右一）、周恩来（右二）、叶剑英（左二）和国民党要员张群（左一），中间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的合影。地点在黄琪翔家草坪。

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期（1937年至1938年），黄琪翔将军应中共周恩来的请求，先后两次安排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人举行私下会谈，这是其一。

客人到了，共产党方面来的代表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叶挺，而国民党方面只有张群一人参加。他们先举行会谈，然后大家在一起吃饭，相聚甚欢。

吃完饭后，他们到黄家花园的草坪上合影留念，看上去大家都很开心。

215

这次国共要员会谈的时间，即这张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的确是个问题。

郭秀仪生前的回忆是“1937年春末”¹，应该有误，因为当时朱德等人还在苏区，直到8月9日方才应蒋介石之邀到南京参

¹ 《流金岁月》，p96。郭秀仪文章“往事拾遗”。

加国防会议。再查周恩来、叶剑英年表可知，他们会晤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8月10、11、12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而且极有可能是10日这一天。因为11、12日这两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都参加了重要的会议，工作十分繁忙。

但是，这张照片确实非常重要，它的难得之处是体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最直接的影像史料，也是体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影响力最大的历史照片，几乎所有介绍这一历史时期的展览、书籍均采用了这一图片。照片上，除了国共双方的代表之外，黄琪翔当时的身份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即“解委会”的负责人。

照片上唯独没有叶挺将军。郭秀仪回忆说，那是因为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叶挺本人。

1937年8月23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于是朱德成为“八路军”的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10月间，又把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二、淞沪会战

1937年9月，黄琪翔在南京接受军事委员会任命，出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他匆匆告别妻子郭秀仪，自己奔赴上海前线，参加了著名的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约80万军队参加战斗。战役持续三个月，起止时间为1937年8月13日至1937年11月12日。这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不宣而战，但又是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由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至此升级为全面的战争行为。

战争起因是一支驻沪的日军武装部队，于1937年8月9日侵入上海虹桥机场，冲入警戒线滋生事端。中方本是遵照蒋介石“和平未至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指示行事，但日军如此嚣张，中方驻军不得不加以干涉。于是日方以此为藉口，集中军舰开进，并派陆战队登陆上海，要求中方驻沪保安队撤退，被我方严词拒绝。8月13日，日方集合驻沪之陆军、海军陆战队约一万余人进袭上海中国保安队，遂发生震惊中外的淞沪战事。¹

¹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70。



战时的上海属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司令长官是顾祝同。在日军进袭上海的8月13日，中方派遣张治中部三个师向上海增援，张治中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黄琪翔回忆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派张治中为第八（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蒋的嫡系宋希濂、孙元良、王敬久等部队到上海作战。由于陈诚和唐生智、白崇禧等的建议，派我为该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此外还派了德国的法根豪森将军为该军顾问。”¹

法根豪森将军，即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1966），德国将军。1935年，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塞克特（1866—1936）回国后推荐法肯豪森继任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

¹ 黄琪翔《我的自述》。



淞沪会战爆发前的上海

蒋介石当即表示接受。从此，法肯豪森积极参与中国的最高机密筹划与各项战争准备工作，时间长达四年之久。¹

第九集团军战斗序列
(8月3日至9月23日)
总司令 张治中
副总司令 黄琪翔

219

1 法肯豪森，德文名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87、88、36师，全部投入战斗，这些德籍顾问所指导的国军部队训练有素，火力之强为国军之冠，重创日军。在“庙行大捷”中日军的精锐受挫，遗尸三四千具。日本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称上海保卫战为“德国战争”。1938年他接到德国的命令，不久后即返回德国，并许诺绝不会向日本方面透露任何有关中国的军事机密。回国后，他起初拒绝接受任何工作，免费当起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员，直到希特勒命令德国预备役军人复役为止。1940年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总督，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失败后，法肯豪森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二战结束后法肯豪森被盟军逮捕移交给比利时政府被叛12年徒刑，因其非纳粹分子，不久释放归德，曾出任中（中华民国）德文化经济协会名誉会长。1966年去世，享年88岁。

第 87 师师长 王敬久
刘安祺 第 259 团
沈发藻 第 261 团
第 88 师师长 孙元良
彭巩英 第 262 团
第 264 团
第 36 师师长 宋希濂
陈瑞河 第 106 团
彭戢光 第 108 团
第 61 师师长 钟松
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 杨虎
上海保安总团（吉章简）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2 团（胡启儒）
炮兵第 10 团（彭孟缉）
炮兵第 3 团（邵存诚）
战防炮营¹

作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和侍卫长的钱大钧在日记²中说，白崇禧于 9 月 2 日凌晨返回南京后，当即与程潜、何应钦、唐生智、黄绍竑等一起晋见蒋介石，决定缩短战线、更换身体虚弱的总司令张治中，并“赞成黄琪翔之前往”上海赴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在淞沪前线，黄琪翔于 9 月 2 日出任第九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张治中同时被调离，由朱绍良（1891—1963）接任总司令，黄琪翔作为朱绍良的助手。

此前 8 月 22 日晚，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以及第一师团的第一旅团于川沙、狮子林、宝山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犯。陈诚率部增援，并于 8 月 24 日开始反攻。由于上海地狭海薄，日军又以陆、海、空联合作战，发挥了极大的火力威力，我军反攻未能奏效。而日军的

1 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亲历记》，p351。

2 台湾中华出版公司 2015 年 7 月第一版《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p51。

增援部队也已上岸，其主力进攻罗店，至9月19日，罗店失陷。我军退守闸北、江湾、庙行、王庙、双草墩一线。

9月21日，为应对作战需要，中方前线部队又做调整：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编为左翼兵团，陈诚为总司令；第八、第十集团军为右翼兵团，张发奎为总司令并兼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这时黄琪翔改任右翼兵团副总司令，成为张发奎的副职。

此时，在黄琪翔的引荐下，一批“解委会”的党员干部如杨逸棠，李卓贤，裘朝慎，周德成，何自坚，杨清源等人也参加了战斗。¹

战事已经拉开了大幕，敌我双方浴血战斗之际，我军内部还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让所有人愤怒不已。

其一，身为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奉命去前线视察，照例要拜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可是冯玉祥不在他的长官部。第二次又去，冯玉祥还是不在长官部。白崇禧忍不住向副总司令顾祝同发问：“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两次不见？”顾祝同告诉白崇禧说：冯玉祥因为害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公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有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祝同处理。白崇禧在顾祝同的指点下，终于在宜兴张公洞里找到了冯玉祥。张公洞是石岩洞，的确很安全，里面可容纳一二千人。²这样胆小怕事的人怎么能担当战区的统帅呢？白崇禧回到南京，立即与何应钦商量，并经蒋介石同意后将冯玉祥调离了第三战区。³全国人民都在如此关注淞沪会战，将士们在前线用

1 2005年第8期《前进论坛》，方荣欣文章《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裘朝慎》。

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70。

3 因为冯玉祥是西北军的头面人物，堪称德高望重，所以要体面地调离他。在白崇禧的策划下，让冯玉祥去做了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下辖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部，以及韩复榘的部队，均是他的旧属。这一建议得到了蒋介石、何应钦的支持，于是白崇禧去与冯玉祥商量，冯玉祥很高兴。岂知，任命一发表，宋哲元、石友三和韩复榘等人均用密电向中央表示反对。最后，蒋介石表示“解铃还须系铃人”，并授意白崇禧转达其部下不信任之意，冯玉祥才辞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事见《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85。



222

黄琪翔氏在战区之影。原载 1937 年第 12 期《抗敌画报》。

命，而作为战区总司令长官却因为害怕空袭，不能坚守长官部，躲在百里之外的山洞里，成何体统！之后，第三战区的总司令由蒋介石亲自兼任。

其二，某次，蒋介石打电话到前线，希望右翼兵团总司令张

发奎去检查一下孙元良¹的部队。孙元良是蒋介石钟爱的学生，其率领的第八十八师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张发奎因战事太忙，让他的副总司令黄琪翔去执行命令。黄琪翔找了半天，才发现孙元良居然在公共租界百乐门舞厅里跳舞，当然十分恼火，就如实报告了张发奎。

张发奎一听也火了，直接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在电话里授权张发奎，说，“混账，毙了他！”²

张发奎没有那么做，因为他知道孙元良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号称“十三太保”之一。而且，幸亏没有“毙了他！”孙元良的部队后来的确打得很不错，他还因战功晋升为第七十二军中将军长，仍兼八十八师师长，后又得到了国民政府的云麾勋章。

针对淞沪会战，黄琪翔认为：蒋介石在最初的设想也只是想吓唬一下日军，以便在与日本人谈判时增加我方的资本，再达成某种协议，所以，中方并没有想真正打下去。黄琪翔说：“当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不过一个师团左右，张治中毫无办法应付，后战局越来越处于被动。虽蒋介石直接通过电话指挥，亦不能挽回败局。战事逐渐扩大了，蒋介石的和平计谋亦无从实现，于是便调集内地各军，包括蒋的嫡系和所谓杂牌军队前来上海参战，借此避免后方事变。指挥系统十分混乱。在上海作战两个多月中，日本的军力最多不过两三个师团，而蒋介石调赴上海的部队不下十多个军，三十多个师。最后还是被迫撤退。”³

随着战事不断扩大，中国军人不断地去慷慨殉国，可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指挥官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中方的军事优势也没有像预料中那么理想，而且显现出中国军队装备、军人素养及战术水平，明显处于劣势。虽然中国军人的人数确实数倍

¹ 孙元良（1904—2007），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曾任国民革命军88师师长、第22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5绥靖区司令官等职；1949年后去台湾，2007年在台北去世。其子孙祥钟，是台湾电影明星、艺名秦汉。

² 《张发奎口述自传》，p182。

³ 黄琪翔《我的自述》。

于日军，但战争的天平开始向日军倾斜。实际担任前敌总指挥的陈诚在其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悲叹：顾祝同在电话里跟陈诚说：“影响（我军）前方之重重困难及政治、（国民党）党务之腐败，而汉奸之多，及地方负责者之逃走，有无异在敌国作战，国家焉能得不亡之感。并对予曰：凡国家存亡总有倒霉者，即我辈之谓也！我以为政府平时毫无准备，战时脚忙手乱。此次临时令我与顾（祝同）来负此重责，事前毫无所闻，一切均无从着手，自难有妥当办法，一切困难危险，均意中事，与顾（祝同）实有同感。”¹

从四川调来的第四十三军，10月18日乘火车抵达上海后，随即投入上海西北的大场战斗。打了七天，到10月24日午夜后，阵地被第十八师接防，将士阵亡已近百分之九十，中低级干部几乎全部牺牲，只剩下不足六百人的残部，由萧毅肃将军带领撤往杭州整编休补。²

中国军人奋勇杀敌，慷慨赴死，也给予进攻的日军以重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一师团预备役上等兵荻岛静夫，时年27岁，参加了强渡“吴淞河”等前线战斗。与他们对岸作战的，正是张发奎、黄琪翔率领的中国右翼兵团。荻岛静夫所写的战地日记，记录了当时激烈的战况。

荻岛静夫所说的“吴淞河”，就是我们所说的吴淞江。它发源于太湖瓜泾口，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附近汇入黄浦江，全长125公里。古名“松江”，又因流域在古代吴国境内，故称之为“吴淞江”。苏州河是吴淞江进入上海市区段的俗称。

日军在此处强渡“吴淞河”，分别于10月3日晚上、10月4日午后和晚上9时，前后三次进攻，失败了二次，第三次才强渡成功。中国军队展开反攻，企图夺回阵地。

荻岛静夫写道：

1 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7月印行《陈诚先生日记》（一），p155。

2 萧慧麟著《萧毅肃上将轶事》，p22。

我第一回和队长一起渡河，队长战死，无可奈何，只得把他的遗体放在敌人的面前两天两夜，自己暂且退到后方……每个人背负上千发子弹，满怀殊死的决心沿着黑暗的交通壕向右边移动……早上五点半钟左右，恐怖的一夜就要亮开的时候，我们遭到了来自后方的射击。我认为这是河边的友军弄错了攻击的方向，于是一边打出了太阳旗，一边在战壕里大声呼喊友军。但是，弹丸还是照样飞射过来，太阳旗也遭到猛烈的袭击。

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于是从战壕里探出一点点头往后放看去，只见河边战壕里不停地向我们射击的那些人，头上的钢盔似乎是绿色的。虽然在渐渐明亮起来的曙色中还看不大清楚，但我突然意识到：“啊，是敌人！”这时，左边的军官也察觉到此情，于是大声呼喊“敌人！敌人！敌人在后边，转过身去射击！”随着这一声喊，就向敌人开火，重机枪也急速地向后方射击。在友军猛烈射击之下，敌军的射击势头有所减弱，这时能够清楚地看到敌方大约有五十来人。现在，天完全大亮，从双方战壕中发出拼命一般的射击仍在继续。

友军认为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兵力不足，可是敌军敢于突破不足一百米的警戒线从我们的后方迂回过来，这纯属荒谬的行动，还是因为他们是拼命的队伍？可是，日本军队竟然也显出被吓破胆子的样子！

……敌军把友军作为攻击的目标猛烈地射击，第三大队的一位小队长和几名士兵几下子就被他们弄死了……这时，冲锋的命令下达了。我们飞身出战壕，当即就是一阵猛射。

……我们的敌人成了一支完全的送死队，一个逃回去的人也没有，他们在吴淞河畔成了战败国的牺牲品。¹

侵华日军一个大队的标准编制是 1100 人，两个大队是 2000

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荻岛静夫日记》，p29 至 31。

余人，即使战时缺编严重，日军两个大队与“五十来人”的中国军人相比，当然是绝对优势，所以荻岛静夫认为中国军人的反攻是“纯属荒谬的行动”和“拼命的队伍”。但，这正是体现了参加淞沪会战中国军人舍生忘死的爱国精神！这些中国烈士们死得是何其壮烈！

到了淞沪会战的后期，陈诚出任前敌总司令，右翼军团的总指挥仍然是张发奎，左翼军团的总指挥已经换上了薛岳，但右翼军团所承受的压力显然大于左翼军团。

11月4日凌晨四点，陈诚赶到右翼军团指挥部所在地上海青浦东横乡，随即召开由朱绍良、张发奎、黄琪翔等右翼军高级将领参加的战前会议，决定由黄琪翔任第八集团军代总司令，香翰屏（1890—1978）任第九集团军代总司令。以苏州河为界，黄琪翔率部指挥沪南和苏州河以东的部队，香翰屏负责指挥苏州河以西的部队。由于我守军第六十二师此前已奉命调至苏州河南岸参战，防线已经无兵把守。11月5日拂晓，日本新组建的第十军在柳川平助指挥下，由二三十艘兵舰所组成的日军舰队，护送大量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集结，并在漕泾泾、金山咀、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等处登陆。¹

11月5日，临危受命的黄琪翔迅速进行军事布置，想趁敌人刚刚登陆尚未完成防御工事之机，展开反攻登陆之敌：令第二十六师由青浦开松江，沿黄浦江设立警戒；第六十一师往闵行设立警戒。以上二个师经过数次激战，每个师只剩下百余兵力，无力进攻，故只能担负警戒任务。命令第一〇七师、第一〇八师由白鹤港经青浦向金山县、松隐前进；第七十九师由嘉兴枫泾下车，即行占领国防工事，并派有力一部先行占领金山县；第六十二师折回，向漕泾、金山咀登陆之敌进攻；第六十三师除留下一部进入国防工事外，主力部队沿海边侧击登陆之敌。

但是，所有的进攻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攻失败。陈诚当

¹ 《陈诚先生日记》（一），p175。

时也在前线指挥，对战局的情况了然于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黄琪翔率领的第八集团军“此次未能歼灭登陆之（敌）并率动全局，（其原因）：一、部队太差。二、敌机活动使我各部均失联络。三、刘建绪未能令七十九师照规定占领金山县。”¹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失利，并非中国将士们不具备牺牲精神，也不仅仅是陈诚所说的以上这三条。造成如此被动挨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我们可用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观察历史：日本从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了征服中国的野心。日本大将丰臣秀吉（1537—1598）出征朝鲜，就是为了侵华。这是日本的传统野心，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九一八事变”。也就是说，日本忘我中华之心蓄谋已久，准备充足。

日本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实行的是征兵制，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现役兵38万，预备役兵73.8万人，第一补充兵役159.9万人，第二补充兵役90.5万人，各种兵役共计448.1万人。战斗兵属于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者共计199.7万人，此外皆是后勤兵役与补充兵役。这些人员都长期得到严格的训练。日本陆军有17个师团，海军各种舰艇190万吨，属于陆军的飞机1480架，属于海军的1220架。

中国仅有182个师，既无预备役，又无补充役，若中国战时部队有所伤亡，补充困难，如淞沪之役，士兵伤亡之数字达参与会战之兵力之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因备战仓促，故部队皆不足言补充，这是抗战中我不如敌人之处。²白崇禧说：“我在前线常看见未经训练而开赴战场之士兵，无论就作战技术或作战精神皆不能称之为战斗员，仅是备员而已。”³我军训练水平低下，远不如敌人，我军“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即使使用同一种武器，其命中率亦远逊于

1 《陈诚先生日记》（一），p176。

2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77。

3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78。

敌人。¹

再比如，中国军人装备之差，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主要因素。所谓中国当时最精锐的“样板师”，是指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宋希濂）第三十六师、（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他们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是中国装备最先进、训练最有素质的部队。其他的中国军队，有时名义上是一个军，其实只有一个师，人数加上军部直属的人也只有五千人，如川军（代军长萧毅肃）第四十三军，装备极差。因此，负责设计、策划及指挥者之一的白崇禧将军说：“国军装备不一，枪支配备或多或少，武器种类繁多；战术思想、战斗动作极不一致，或学德、日，或效英、美，而纷杂不一；编制有一军有二师编成者，有三师编成者，或一师有二旅者，或三团者不等；再加以地方色彩，个人主义弥漫于军队之中。”²

而日军一个陆军师的兵力、兵器之配备，即使与中国最精锐的“样板师”比较，差别仍然十分巨大：

日本一个师，人数是 21945 人；	
中方一个师，人数是 10923 人。	
日军马匹，5843 匹；	中方为 0。
日军步骑马枪，9476 支；	中方为 3831 支。
日军掷弹筒，576 具；	中方为 243 具。
日军轻机枪，541 挺；	中方为 274 挺。
日军重机枪，104 挺；	中方为 54 挺。
日军野山榴弹炮，64 门；	中方为 16 门。
日军迫击炮，44 门；	中方为 30 门。
日军坦克，24 辆；	中方为 0。
日军汽车，262 辆；	中方为 0。
日军载重货车，266 辆；	中方为 0。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82。

2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77。

日军马车（一匹马），555辆； 中方为0。¹

同时，日军还掌握着制空、制海权，陆、海、空联合与我军作战，配合强大的火力。

还有一点，那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令人齿寒。我们从淞沪会战前敌总司令陈诚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汉奸之多，及地方负责者之逃走，有无异在敌国作战，国家焉能得不亡之感。”地方官员们望风而逃，使得参加战斗的我军，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卫国作战，犹如进入陌生之境，得不到有效的支援和鼓励。更有一些中国败类，居然成为了日寇的汉奸特务，为日本人当耳目、为日机轰炸作地面指引……



229

1937年9月13日，充当日军特务的汉奸在上海被枪毙。来自美国战地记者海岚·里昂拍摄的汉奸们受刑后照片。据海岚·里昂的日记，另有4个中国汉奸在浦东中国炮台附近为日军飞机和战舰发信号，也被当场斩杀。

¹ 刘庭华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转载自萧慧麟著《萧毅肃上将轶事》p22。

就是在如此复杂而残酷的条件下，我们数十万军人只能用自己血肉之躯作盾牌，与训练有素的日军及其猛烈炮火相抗衡，导致了死伤惨重，尸骨遍野。这些可爱、可敬、可叹的英魂，成为守卫祖国的不屈英灵。而中国军民这种顽强抗敌之精神，也完全出乎日本事先的预料，打碎了日军本部预想要用三个月时间征服中国的狂妄叫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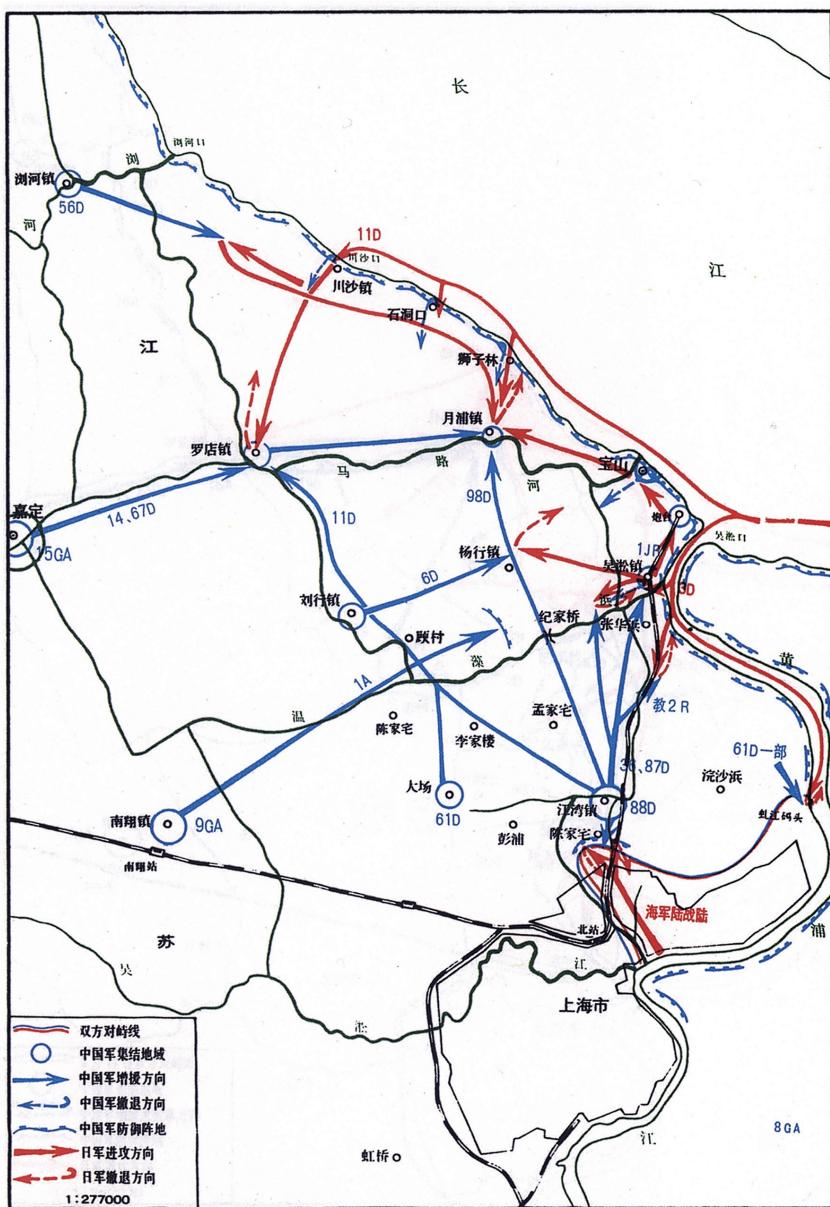
日军登陆成功后，日本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合编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统一指挥，日军大本营规定其作战地域为联结苏州——嘉兴一线以东，任务以挫伤中国之战斗意志，获得以结束战局为目地，与日本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中国军人。日军第六、第十八师团按照预先部署，分别向松江、沪杭铁路扑去。

我军反攻未见成效，反而被敌军反扑过来。面对溃散的部队，黄琪翔只能就地重组部队，号召将士们“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

当蒋介石得知日军登陆金山卫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淞沪战场前敌指挥官陈诚根据现实情况作出应变处置。陈诚急令右翼军的原东北军主力吴克仁第六十七军前往增援松江。而这个军刚从豫北调来，在松江附近未及集结完毕，即遭遇日军凶猛攻击，苦战3天3夜，未能退敌。

11月6日，“第八集团军副（代）总司令黄琪翔，奉前敌总司令陈（诚）之命，亦于本夜赶赴松江指挥第四三及六七两军，拒止敌之北进。”¹黄琪翔心急如焚，只率领作战参谋若干人赶往松江城，去指挥前线作战。方荣欣说：“日军利用其海、空军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黄琪翔闻知，星夜赶往松江，急忙抽调部分上海作战部队，驱逐登陆日军。由于势单力薄，未能成功，乃决定扼守黄浦江以阻止日军前进，以期保障松江，巩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仅率数名参谋人员在淞江城下指挥，

¹ 顾祝同《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时会档案》，现藏第二历史档案馆。



吴淞、浏河地区反登陆作战要图（1937年8月23日—9月10日）。

231

坚持两昼夜，终于失败。黄琪翔只得由小道撤出松江。”¹

11月8日夜，日军凭借强大火力从东、南、西三面突入松江城，守军死亡殆尽，军长吴克仁将军率残兵据守西门，最后在撤退途

¹ 2005年第8期《前进论坛》。方荣欣文章《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裘朝慎》。

中壮烈殉国，年仅 43 岁。¹第六十七军全军覆没，日军遂占松江。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部沿太湖东岸，经浙江、安徽直趋南京，主力则指向枫泾镇、嘉兴、平望。

与此同时，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师团长藤江惠辅的指挥下，又在江苏太仓境内的白茆口登陆成功，前锋直指京沪铁路和公路，形成合拢之势。9 日，沪杭铁路及公路被切断。而苏州河北岸的日军 6 个师团已于早前强渡苏州河后，迅速向两路登陆日军靠近，淞沪地区中国数十万大军顿陷危险境地，再不撤退将成瓮中之鳖，有被日军一网打尽的危险。

此时的南京统帅部和淞沪战场各个高级指挥部已经顾此失彼，指挥系统紊乱，是撤是守，争执不下。蒋介石不得已于 11 月 8 日晚，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所有部队至此开始撤出上海战斗，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至嘉兴以西的地区。

由于撤退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大撤退演变成全面大溃退。日军飞机在天上对地面进行扫射、轰炸，日军地面部队又穷追不舍，逐一攻占上海各镇。撤退中的中方各部队完全没有章法，陷入极度慌乱中。蒋介石遂改任张发奎指挥左翼及中央军来收拾残局，而他们的处境已经是腹背受敌。

黄琪翔身在青浦，仍在从容指挥，战至最后一刻，自己才与身边的部下，一起脱下军装，趁乱化装突围，成功逃出日军魔掌。黄琪翔还在青浦指挥撤退的时候，陈诚已经于当日凌晨二时，冲出日军包围圈，退至苏州。

11 月 17 日，张发奎已经料定大势已去，于是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右翼军总司令职务，让黄琪翔正式出任第八集团军代理总司令。电文如下：

（南京）委员长蒋（密铣电）：呈请准予辞去右翼军
总司令一职，谅邀垂察。窃职尚领有第八、第九两集团军

¹ 吴克仁将军殉国后，国人不知详情，加之日本情报部门释放虚假消息，以致许多人误以为吴克仁将军叛国投敌，使吴将军亡灵蒙受不白之冤多年。

总司令虚衔、查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已奉派副总司令黄琪翔代理、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亦已奉派副总司令香翰屏代理总司令。(他俩)均资深望重，堪以真除。敬请准予辞去，如何？¹

关于黄琪翔撤退时的情况，郭禹九回忆说：“那天下午。黄总(即黄琪翔代总司令)写条子叫我去特务营调四条盒子枪。我取回后，他叫我交给副官，嗣后我见到(裘)朝慎同志。他在离黄总不远的河边(苏沪一带农村通船的小河沟)，总部每人带着轻便行李都上了这两条小船。朝慎同志说：你们在这里待命。我们就押运这两条(小船)行李走。我看离河边约二百米的大路上。大部队都如潮水一样涌下来了，我赶快跑回向黄总报告。黄总在地图上看了又看，又和部队电话联系。梁科长拿了一条子枪，就跑向大路，我也跟着跑去。梁科长举起枪拦着部队，高声叫着说：

‘部队不许退！就在路上停止待命。我是黄总司令派来的。部队里有长官没有？’所谓部队长是指营、团长以上的带兵官。当时也没有人答应。部队就在大路上站着停了半点钟(半个小时)，就又向下涌走了。天黑了，黄总和各方面联系不上，就决定总部撤退。预料走不到一起了。黄总说：‘你们到苏州找我。’事实上，各路大军到苏州以后都没有停下来。数日以后，我和周承德在南京下关车站乘上开往城内国民党政府站的火车。快要开车的时候，总部的人带着行李到站了。他们高兴地叫我。我取了行李，大家都上了车。我问他们：裘朝慎同志呢？大家都说不知道！以后听说，梁科长脸上被敌人刺了一刀。裘朝慎同志始终下落不明。”²

裘朝慎是黄琪翔的副官。³ 他是在淞沪会战撤退时牺牲的。当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439。

2 2005年第8期《前进论坛》。方荣欣文章《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裘朝慎》。

3 裘朝慎(1907—1937)福建省光泽县人，曾任光泽县国民党党部宣传主任，系农工党党员早期党员。裘朝慎在黄琪翔的领导下于1933年参加了“福建事变”，也参加了1937年的上海“淞沪会战”。黄琪翔在福建人民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任时，裘朝慎就开始担任黄琪翔的秘书。“福建事变”失败后，在广州负责第三党的工作。淞沪会战时担任黄琪翔的副官。裘朝慎是方荣欣的表舅，也是方荣欣参加第三党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方荣欣先生担任过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名誉副主席。

时，总部的人是分开撤退的，裘朝慎从上海乘民船向江苏退却，途中遇到了当地的保乡长。“当时由于日本人占领，那些保乡长也都是些汉奸。他们看裘朝慎等人不象一般的平民。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裘朝慎一行抓了去。当时随同裘朝慎一起的还有章伯钧的一位管家，是广东人。他向保乡长解释说自己是商人，是做小买卖的，身上还带有一些钱。那些汉奸看他像是个小商人，没有怀疑之处，就将他身上的钱全部搜去后，把他给放了。那些汉奸看裘朝慎很文气，不像是买卖人。在收查他们的时候又从裘朝慎身上搜出一些文件，所以不由分说就把裘朝慎拉走给杀害了。”¹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松沪战役报告书，档案号七八七-7460第41页至45页，记述了黄琪翔撤退的经过：“11月10日至20日。自10日后因苏州河南岸部队向西撤退，一时各方面联络断绝。杭州湾方面登陆之敌情况不甚明了，是日晨，松江附近我军部队因伤亡过重无兵增援已成溃退之势，秩序紊乱无法指挥，敌更向四面包围，黄副总司令琪翔于重围中竟率少数卫弁冒险而出，11日夜抵嘉兴，至此各部队均失去联络。”

黄琪翔是整个淞沪会战中最后撤出的中国军队高级指挥官之一，就在日军扎紧口袋的最后一刻，他成功地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他在淞沪会战中沉勇的表现，获得了舆论的赞扬。²

黄琪翔脱险后，撤退到浙江嘉兴，终于追上了他的长官张发奎。

张发奎见到黄琪翔，始知他是化装逃上一艘小舢舨，才得以侥幸逃脱，固然很高兴。尤其是看到黄琪翔很帅气的胡髭，在突

1 2005年第8期《前进论坛》。方荣欣文章《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裘朝慎》。

2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快活林》刊登了一篇通讯“漂亮将军黄琪翔！”文中写到：“八一三事件发生时，黄（琪翔）在上海统率大军抗日，张发奎率兵死守浦东，黄氏即为其副。浦东数役，悲壮之至，其时黄已为前敌副总指挥，身先士卒。是以日寇在金山卫偷袭登陆，包围我军，黄氏所在司令部亦被包围，步步进逼，千钧一发，黄氏几陷敌手，后化妆农夫逃出重围。由此黄氏作战精神，与其漂亮仪表不同，完全铁军化矣。”

围时已经剃掉了，还脱了军装，就笑着“说他好像割须弃袍的曹操。”¹

张发奎为什么要笑话黄琪翔剃胡髭呢？因为黄琪翔曾经建议张发奎也像自己一样留胡髭，这样看上去会比较威武，现而今，却连黄琪翔自己也剃掉了胡髭！

黄琪翔与张发奎会合后，继续指挥部队在浙江长兴附近与敌激战。11月24日凌晨2点半，张发奎、黄琪翔用无线电向蒋介石汇报：

（急，南京）委员长蒋、副司令长官顾、前敌总司令陈（密）：本日未刻，第七军周军长²电话报称：本日拂晓，敌以炮、空协同步兵向我右翼金盖山阵地猛攻，我刘团伤亡过重，被敌击溃；十一时许，敌复以步、炮、空协同攻城，我李团伤重不支，向后溃退。现已令李团在仁王山占领第一线，收容阵地；郭团在王母老龙山占领第二线，收容阵地、掩护（友军）。请川军速占长兴附近阵地，拜请转各长官为祷。³

11月25日，张发奎、黄琪翔继续向南京报告战况：

我七军现在白龙山、王母山一带与敌激战中。本日敌机轰炸吴兴城甚烈。午刻，敌便衣队袭击我七军军部；又，刘司令长官本日子刻命令唐军团长以146师到安吉后，即经小溪镇、和平镇向妙西市前进，支援我七军；144师大部协同146师攻击吴兴之敌，一部于长兴附近构筑工事；148师占领荆湾市虹溪镇之线；145师、147师在泗安附近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185。

2 第七军时任军长为周祖晃。周祖晃（1891—1959），字敬生，中将。广西临桂县渡头宿棠村人。早年考入桂林陆军小学，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湘军何键、唐生智部任连、营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1936年后任第七军副军长、军长。1949年被任命为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委员、军政督导团团长。12月，周祖晃率所属部队近5000名官兵接受解放军改编。1959年在南宁病逝。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439。

为总预备队。¹

战斗到 11 月 27 日午后，“夏旅长阵亡，李团全部损失，张团损失大半，陈团只剩数十人”²，第七军军部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张发奎、黄琪翔赶紧派军官去了解情况，在大云寺附近才知道第七军被击溃的确切消息。到了晚上 11 点，终于与军长周祖晃本人通了话。周祖晃报告说，第七军被击溃后，已无法挽回败局。张发奎、黄琪翔这才在 28 日经蒋介石批准后，率领残部向安徽广德撤退，又经过徽州，然后奉命奔武汉方向去了。这一时期的电文，均以张发奎、黄琪翔联名签署发出。

关于淞沪会战之惨烈，何应钦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军消耗竟达八十五个师之众，伤亡官兵三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人。”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民党军伤亡 30 余万人比较准确。阵亡的中将军长 1 人、少将十余人、团长 28 人。由于中方海军的“沉船战术”泄密，中央海军全军覆灭。

而据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考虑到日军在追击战和攻占南京作战中伤亡不大，由此估算在淞沪会战中日军约战死 2 万人，受伤约 4 万人，合计约 6 万人。此役中国军人伤亡 33 万多人，为日军损失的 5.5 倍。

淞沪会战的积极意义，是打破了日本人的梦想。早在 1937 年 7 月 17 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确定侵华战争的两步战略，第一步是解决华北问题；第二步则是攻打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摧毁南京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在取得初步军事优势后，狂妄的日军叫嚣道：“争取 10 天占上海，3 周陷南京，1 个月逼近武汉，3 个月内亡中国。”事实上，日本的侵华计划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中国军民的迎头痛击。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 7439。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 7439。

三、军委会政治部

1938年1月10日，陈诚奉命组建军委会政治部的时候，最初在人选上没有考虑到中共的周恩来。“陈诚送呈（蒋介石）机密（乙）第1342号，请先委定政治部人员如左：”

黄琪翔为副部长

张厉生为秘书长

范汉杰为第一厅厅长

贺衷寒为第二厅厅长康泽为副厅长

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

杜时霞为总务厅厅长

柳克述为秘书处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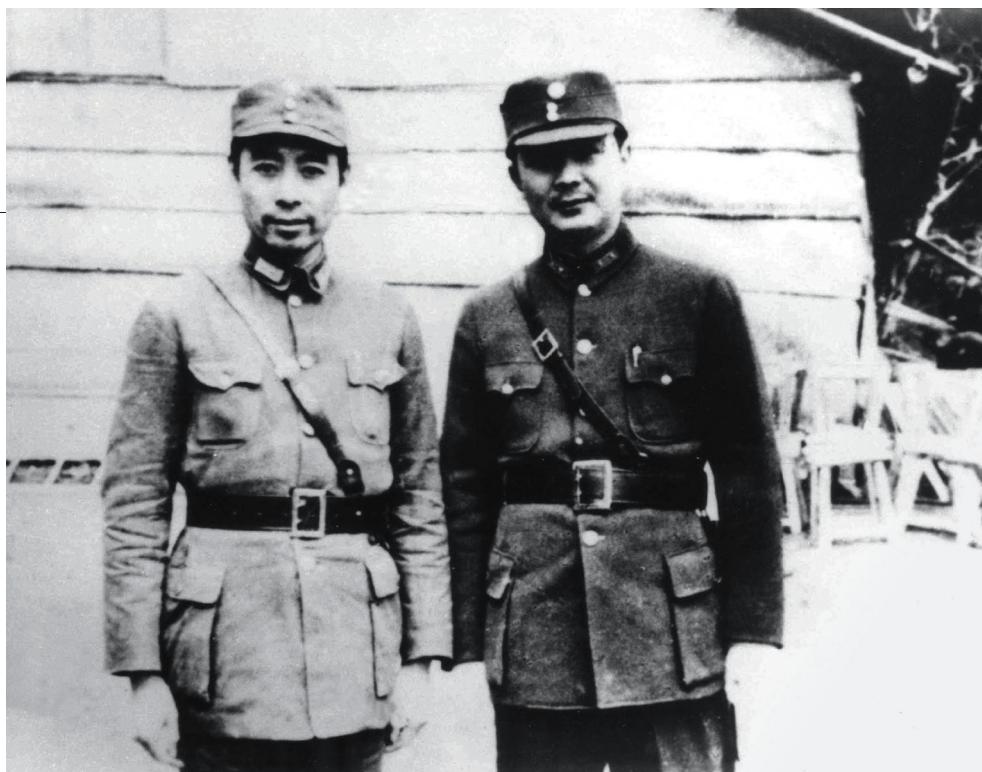
蒋介石审查这份报告时，将康泽改为第二厅厅长。¹而最后宣布的名单则又有改动，加入了周恩来为副部长，贺衷寒出任第一厅厅长，范汉杰未调入。

237

2月6日，黄琪翔走马上任，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政治部部长陈诚身兼多职，很少能有时间来政治部上班，甚至连一些重要会议需要陈诚讲话，也委托黄琪翔作为他的代表去

¹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102-00017-005。



1938年初，周恩来与黄琪翔在武汉合影。

演讲。而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在共产党内，也很少来政治部上班，所以黄琪翔成为政治部的实际主持人。

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加抗日斗争，作为政治部主要负责人黄琪翔，因此整天在武汉参加各种会议、各种活动，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很高。

1938年3月，武汉各界举办轰轰烈烈的抗敌运动大会，就是由政治部主办、黄琪翔主持。3月10日，政治部在卫戍部礼堂召开武汉各界人士参加的“运动大会”筹备会，黄琪翔为会议主席，确定在3月13日举办“新运日”活动，其内容为整肃市容、开展大扫除，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意义；3月14日举办“抗敌日”，进行兵役、节约、防空、生产、工役等项宣传；3月15日举办“建国日”，内容为“拥护主席，抚慰难民，慰劳伤兵，国民经济建



1938年4月1日，黄琪翔（右一）、周恩来（右二）与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杜国庠（左二）、唐棣华（左三）合影。

设运动。”¹

黄琪翔把满腔热情投入到政治部工作之中，总以为自己不论到哪个岗位，都可以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他说：“我参加政治部工作，原来抱着一种愿望，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重新合作，共同抗战。因此在政治部成立的时候，蒋介石要求我重新加入国民党，重新登记，我也答应照办了。自从在福建人民运动中宣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解散以后，我自以为已不属于任何党派，现在国民党既然实行抗日，又和共产党合作，我觉得重新参加也没什么不可，因此就参加了。”²

事实上，黄琪翔重新加入国民党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决定。据《章伯钧生平》文：“蒋介石企图在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的领导层中进行分化，乃亲自下条子指名要黄琪翔恢复国民党党籍。黄琪翔立即将此事告诉章伯钧等，共商对策，章伯钧等主张接受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以利于促进团结抗战，并开展组织工作。”而黄琪翔写作《我的自述》时在“文革”，是为隐情的说法。

1938年4月6日，蒋介石亲自批准黄琪翔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手令：“准黄琪翔、卢作孚、戴笠三人入党，发给党证，

1 1938年3月11日《申报》。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1938年黄琪翔在欢迎世界学联大会上讲话。

并即发表该三员训练委员会委员可也。中、六日。”¹这是黄琪翔第二次加入国民党。

可是，重新加入国民党之后的黄琪翔，发现自己工作起来仍然十分吃力，简直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主要原因是部长陈诚的任职过多——当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兼任政治部部长，另外还兼任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训团主任委员、三青团书记长和中训团教育长等职，因此陈诚根本无暇顾及政治部的工作。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完全由黄琪翔负责，表面上看，黄琪翔大权在握，其实很难办事。不做事，心不甘；想做事，又做不成。他变得烦闷不堪。究其原因，就是政治部内的情况太复杂，派别林立。彼此心存芥蒂，必然影响到工作。

陈诚对政治部的状况也很不满意。他曾说：“余离部月余，部务仍无甚改进，人事、经理尤未完全整顿妥洽，此实由于部内人员埋首案牍，而于各地实地困难问题，茫然无知，上下如此隔阂，

¹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57-003。

工作安得进展。条例规章无论如何周备，充其极亦不过闭门造车而已。”¹

时任军委会政治部一厅上校科长的沈沛霖回忆说：“一九三八年二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于武昌，以陈诚为部长，第三党人黄琪翔及中共党人周恩来分任副部长，下设四厅，其职司范围：第一厅（厅长贺衷寒）主管军队及军校政训，第二厅（厅长康泽）主管战地民众组训，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主管文化宣传，第四厅主管总务（朱代杰为负责人），另有一秘书处（处长柳克述），负责电讯文书及部与各厅之上下行文工作。”²

黄琪翔说：“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长，我亦为副部长之一，此外还网罗各方知名人士组成设计委员会。但其中负实际责任的是国民党cc派首脑之一张励生（1900—1971）任秘书长；‘蓝衣社’头目贺衷寒（1900—1972）任一厅厅长，主管军队政治部工作人员的训练、任命等项工作；特务头子康泽（1904—1967）任二厅厅长，主管情报人员的训练、任命等项工作，实际上都是反共工作。郭沫若的第三厅主要网罗些当时的文化人，组织些文艺部队在军队中和大城市中活动。”³而贺衷寒和康泽等人，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属于“十三太保”之列，自觉后台很硬，也对副部长黄琪翔很漠视。黄琪翔处境很孤独。他说：“当时虽然大敌在前，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的反共政策，这在政治部的各项具体工作中，都体现出来。我对此表示不能接受。”⁴

另一位副部长周恩来，也很少来政治部上班，因为他的主要工作在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

沈沛霖曾去拜访过他法国留学时期的同学周恩来，所以在

1 《陈诚先生日记》（一）p252。

2 《沈沛霖回忆录》p168。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4 黄琪翔《我的自述》。

的回忆录里有清晰的描写。沈沛霖说：“我约了留法同学，也是南京中央军校教官同仁的叶法无（叶剑英堂叔），相偕同行。过江到了汉口，在旧日租界中街，找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该处为一幢四层建筑，原为日本人所办的大石洋行，但其斜对过即有一座属于军统系统的机关，其设于此地之目的可说是不言而喻。”¹周恩来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可见他往来武昌政治部与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之间，路途的确不近。

为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5月前来武汉。武汉各界群众共组织了三次欢迎大会，其中的一次集会地点位于汉口中山路，由汉口商会主持，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和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悉数参加。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有人企图捣乱，破坏现场秩序。

据郭秀仪回忆：那天，当周恩来走上讲台后，他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特别是平型关大捷的时候，一些捣乱分子在台下开始吹口哨或发出唏嘘声。周恩来从容不迫，表现得十分冷静。

陈诚颇有大局意识，示意黄琪翔出面制止。黄琪翔于是大步流星走到周恩来身边，高声呵斥捣乱分子道：“台下捣乱的是什么人？现在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时刻，你们怎么敢在这里捣乱？不愿意听的，请马上都给我出去！”

由于黄琪翔及时出面制止，起到了威慑作用，使得周恩来的讲话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²

黄琪翔虽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但在政治上仍更接近于共产党人，自然与周恩来感情深厚，在工作中一直尊重周恩来的意见，所以每当政治部处理国共两党的摩擦事件时，黄琪翔的“罪名”就是偏向共产党人；而他主持公道的一些言论，常被别人打了小报告，于是成了他向国民党“发牢骚”的证据。事实上，他也的

1 《沈沛霖回忆录》p170。

2 郭秀仪生前曾分别对其外孙于峰和本书作者，讲述过这则故事。

确如此。久而久之，黄琪翔与这些人的矛盾日益加深，甚至到了格格不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陈诚每次见他，反而提醒黄琪翔要注意团结问题。这叫黄琪翔感到十分为难——还包含着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处处与黄琪翔作对的政治部秘书长张励生，也是陈诚的密友，在外人眼里，张励生和黄琪翔都是陈诚的人。

有一次，湖北咸宁县政府抓捕一位中共党员，罪名是他在咸宁境内从事民运工作。政治部秘书长张励生批示要“严办”。秘书处将公文依例呈送黄琪翔。黄琪翔一看，觉得有问题，立即把文件内容转告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和他一起去找张励生，批驳张励生“这是违反国共合作原则的。”这件事，当然会有人向陈诚和蒋介石报告。

黄琪翔除在工作上配合共产党之外，在生活上也予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以照顾。郭秀仪回忆说：“当时琪翔每天都去政治部上班，他对恩来同志非常尊重，私人感情也很好。他对政治部设计委员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也都团结无间，工作上给予方便。琪翔指示当时任总务厅出纳科员的黄心维同志，每月一定要把周部副部长和邓颖超委员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工资登门送去。”¹

许多国民党人在国共合作时期仍然敌视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说：国共合作是“共党口号，利用领袖（指蒋介石）争取民众，利用我们（指国民党）的招牌，做他们（指共产党）的工作。”顾祝同就是持如此观点。针对周恩来提出共产党军队出西路的计划，顾祝同打电话给陈诚，对共产党提出要求：“一、不能有欺诈行为。二、不能在（国民党）党政军内活动。三、不能到处设办事处。四、训练干部须先请备案。”陈诚则从大局出发，对共产党保持了克制态度。他提出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一、不利用。二、不怯懦。三、要团结。四、要实干。”陈诚在其日记中谈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说“现在扣留共产党员有罪而不敢办者，无罪而不敢放者”，他想“派大公无私并铁面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97。郭秀仪文章《真挚友情，永世难忘》。



陈诚（左三）、白崇禧（左二）、
黄琪翔（左一）在一起。

长江，进至安徽池河东岸的藕塘、明光一线；日军第十师团从山东青城、济阳间南渡黄河，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线。中国军队开始筹备徐州会战。徐州会战的作战方案是白崇禧等制定的，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以前有关黄琪翔的资料中说：就在白崇禧准备徐州会战作战方案时，他来到武汉，悄悄找到黄琪翔将军，提出欲见中共领导人的设想。于是黄琪翔找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安排他们双方在自己私宅里相见。这样，白崇禧就与周恩来和叶剑英举行会谈。周恩来明确提出，徐州会战应采取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的方针。白崇禧颇以为然。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在指挥徐州会战，白崇禧被派去协助，在血战台儿庄的战役中使用了这些战术。²

但是，根据参加会谈的当事人谢和赓证实，这些资料有误。

无私者，前往依法处理。”¹陈诚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黄琪翔是能够接受的。

这期间，黄琪翔应周恩来之托，建议白崇禧秘密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会谈。这次会谈不寻常，因为白崇禧从未提及这次会面，而这次会谈的意义又很重要。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谈的背景：早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军第十三师团北渡

1 《陈诚先生日记》（一），p189、p222、p228。

2 《黄琪翔传》p98。

周恩来、叶剑英与白崇禧的这次秘密会谈，是由中共方面首先提出请求，然后邀请黄琪翔出面帮忙安排落实。会谈具体时间是1938年3月10日晚上。地点是位于武汉熊廷弼公园附近的黄琪翔私宅。程思远也证实，这次会面的地点在“蛇山下熊廷弼路私邸”。¹程思远此时的职务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办公室秘书。

当事人谢和赓为何人？谢和赓（1912—2006）本是白崇禧夫人的亲戚，抗战爆发后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时，谢和赓就是他的中校机要秘书。其实，谢和赓早在1933年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密”，代号“八一”。谢和赓也是当时大红大紫的名演员王莹的丈夫。

1938年间，中共对白崇禧极为关注，这是因为白崇禧提出了著名的军事指导思想已被蒋介石采用，这就是所谓“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战略方针。所以，中共要求自己安插在白崇禧身边的特工人员谢和赓、刘仲容要“及时将李宗仁与白崇禧之间的情报传递给党”。

谢和赓回忆说：“自从南京失陷，李宗仁到达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几乎每天都拨长途电话与白崇禧谈前方和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他们通话时，有一个人所鲜知的特点：就是一谈到秘密的事情时便用广东话，甚至用桂林家乡的土话来交谈，而且凡是有重大关系的人名和组织名，都是用他俩约定好的代名词交谈。（这是由机要参谋刘维周和我奉白的命令共同拟好呈阅使用的。）举例说，李、白曾用赵小姐作蒋介石的代名，钱先生作中共的代名，孙先生作黄埔系太保们的代名，李娘作汪精卫的代名……他们交谈时，多用刘维周在白的身边记录；有时，由我在白的身边记录。刘维周总是把他的记录推给我一并整理，然后由他保存，以便备查或办理李、白商谈决定的事情。”²这些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16，程思远文章《深切怀念黄琪翔同志》。

2 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1991年7月自印单行本，p7。原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7辑。

情报当然会迅速传递给中共的情报机关。

中共也通过“特密”将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和主张及时让白崇禧阅读，试图影响他。谢和赓说：“我谈谈白崇禧，我深知他对我的党（中共）公开发表的任何文件、书刊等，都是力求先睹为快的。我和刘仲容在他身边，根据他的要求，也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指示，都尽快把我党公开的出版读物呈白阅读。举例说：《论持久战》一书，在报刊一发表，还未印单行本时，我便将它呈阅，及至一出单行本，我便得了两本放在他的大办公桌上，第二天，我便发现，白将该书内的一些段落、词句用红蓝铅笔认真地划开了！他用红蓝笔点点圈圈的地方，我马上在我的一本《论持久战》中依样画葫芦地照抄照划进去。我又马上将这本依照白崇禧‘点划圈批’的《论持久战》交给（刘）仲容迅速呈给周、叶两位了。因此，有人说：周、叶两人曾把《论持久战》赠给白崇禧，还向白解释书的内容！这真是太不了解真情了。读者想想有我和（刘）仲容在白身边‘紧跟’工作，还须我党的领袖亲自送《论持久战》的单行本给白吗？”¹

中共非常清楚白崇禧的情况，所以希望直接与白崇禧对话，可是，白崇禧对中共的结怨很深，也一直对共产党的主张有很深的成见，不肯与中共作深入交往。同时，他也很担心自己与中共的交往，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猜疑。这时，中共就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人，替他们之间搭起一个会谈的桥梁。这个人就是黄琪翔将军。

谢和赓说：“1938年3月10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白崇禧会谈，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向白（崇禧）建议举行的。”²跟随白崇禧参加会谈的有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斐、副军长刘士毅、高参刘仁，以及机要秘书谢和赓。由于谢和赓的母亲也姓刘，于

¹ 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1991年7月自印单行本，p14。原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7辑。

² 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1991年7月自印单行本，p17。原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7辑。

是谢和赓戏作诗云：“四刘随白会周叶，内幕知情有半刘。”

会谈的背景是在台儿庄大战前夕，白崇禧即将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谢和赓说：“白崇禧在会谈中，与周恩来侃侃而谈到长期抗战的展望时，一再提到他在南京失陷前，便向委座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周、叶、黄（琪翔）对此表示欣赏。因此，使我在此联想到近几年有人说，白崇禧这两句话是阅读了毛主席《论持久战》（1938年五六月在延安向干部作的讲演）后才提出的。这里，我想告诉读者，白崇禧这两句话是核阅了我12000多字的《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领》的建议书后，命我拟稿打报告介绍这建议书给蒋介石时，在批文上要我写在报告里的。在我到汉口首次会见周（恩来）汇报我的‘万言书’时，他对白这两句战略的句子也很欣赏。当然蒋介石对白的这两句话，也很欣赏。还有，据我知道，李、白从未下过通令，要桂系的军队研读《论持久战》，李、白两位对国共合作的看法，对我党的政治影响，阶级观念还是很清醒的，他们绝不会这样‘放心’这样‘天真’。”“会谈中，更谈到新四军需要何应钦兼部长的军政部拨给一定数量的炸药、手榴弹、轻机枪和其他军用品如军用水壶、棉被、军鞋等。会后，黄琪翔开列了一个补给新四军军物的详细单子送白（崇禧）转交军政部；但据我后来与周、白两人谈到此事，都说何应钦并没有照办。”¹

在会谈中，“白（崇禧）告诉周、叶、黄三位，他已在汉口提出要成立国民党军队的游击训练班，可能将要把南岳作为训练基地，而以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军官为主要受训的对象。白向周说，如果将来国民党军队训练游击战术，就要向委座建议邀请八路军教官前往执教。周表示：我党一定会协助。”²

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周恩来年谱》载：周恩来“和叶剑

¹ 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1991年7月自印单行本，p12。原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7辑。

² 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1991年7月自印单行本，p13。原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7辑。

英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¹

谢和赓非常中肯地评价了黄琪翔在这次国共秘密会谈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周、白的会谈，完全是黄琪翔将军爱护（中共）党执行党的统战任务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恳切地要向白表示我党真诚地支持桂系打好这一关系重大的战役，这正是我党主动向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各地方军政势力进行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件大事。”²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期，黄琪翔将军应中共的请求，先后两次安排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人举行私下的秘密会谈。第一次是在1937年3月，他在南京自己的家里，安排张群与周恩来等人的私下会谈。一年之后，黄琪翔又安排了周恩来等人与白崇禧的私下会谈。

白崇禧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谈，是背着蒋介石秘密举行的，一直没有公开。白崇禧在回忆录中亲自回答记录者的提问时说：“武汉撤退时与周恩来不期而遇，我说，‘谢谢你们不派人到广西来。’他说：‘都像你们那样就用不着去了！’我说：‘谢谢！’共产党员与我没有什么来往。”³白崇禧在《口述自传》中说得更为详细。从武汉撤退时，白崇禧乘坐的德国吉普车出了故障，他下车等待排除故障。“不久，周恩来乘汽车随后赶至，他一见是我，随即

1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周恩来年谱》p202。

2 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p8。

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4）1989年6月第三版，《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p913。

下车当面相告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并坚邀我同车至长沙。当时我考虑再三，机件何时修好，并无把握，乃上车与他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法国留学，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¹

白崇禧《口述自传》时已经身在台湾，处境尴尬，因此顾虑颇多。在回忆录里，白崇禧是故意在回避 1938 年 3 月 10 日晚与中共中央领导周恩来等人的秘密会谈。

黄琪翔一贯不掩饰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善关系。1938 年 5 月 4 日青年节，黄琪翔在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发扬“五四”精神，巩固青年团结》²。他真诚号召全国青年，团结起来，要把“民族的生存高于一切！”

到了 1938 年的夏天，武汉大学的教授们都已经迁往西南，军委会后勤主管部门就把珞珈山山麓三座相邻楼房，即每栋房子均为一楼一底二层，分配给了黄琪翔夫妇、周恩来夫妇和郭沫若夫妇居住。

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其办学源头可追溯到清末 1893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32 年 3 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美丽校园。学校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中西合璧式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宛如人间仙境一般令人赏心悦目。

周恩来夫妇、黄琪翔夫妇和郭沫若夫妇等，当时居住的是武汉大学珞珈山前的所谓“十八栋”别墅式楼房。战前，这些楼房是大名鼎鼎的教授李四光、王世杰、皮宗石、周鲠生、袁昌英等人的家。教授们都随学校转移去了大后方，他们的家就腾了出来。

黄琪翔夫妇与周恩来、郭沫若成了邻居，几乎是朝夕相处。

他们在交往中，曾将家人照片相互赠予对方，互作留念。其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 3 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124。

2 1938 年 5 月 4 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中有一张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合影照，送给了郭秀仪。周恩来亲笔在照片上题字：“琪翔兄、秀仪妹惠存！”落款是“弟周恩来、颖超敬赠。”¹

黄琪翔说：“我在政治部虽然没有负什么实际责任，但我也接触到当时张厉生等在部内搞反共活动的事实，思想上受不了，因此和他们总是格格不入，陈诚看出了这种情形，便在武汉临近撤退之前，和我商量，说他不久也将离开政治部的岗位，建议把我调任白崇禧任部长的军训部当次长。我当然只好接受下来。1938年武汉撤退前，我改任军训部次长，调往桂林。”²

很显然，黄琪翔知道这不仅仅是陈诚个人的意见，肯定还贯彻蒋介石的意图，只好答应。于是在1938年7月间，黄琪翔被调离政治部，离开武汉前往桂林就职，也就不得不暂时同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作别。³

郭秀仪向邓颖超告别。邓颖超处事厚道，心胸宽广，为人至诚。她们姐妹间的友谊保持到终生。郭秀仪后来感慨说，“邓大姐不仅是我敬爱的大姐，而且是我的老师，我从她那里学习应该怎样做人做事。”

1938年7月27日，黄琪翔奉蒋介石的委派前往广州。8月1日，广州军事分校举办韩汉英出任分校主任的就职仪式，黄琪翔监誓。该校副主任本是黄镇球兼任，因黄镇球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于是令谢膺白代理，因此谢膺白就职仪式也由黄琪翔一并监誓。⁴

黄琪翔的行踪受到了日本特务的关注。隐藏在香港的日本特务早崎给东京拍发密报，结果被国民党情报部门截获。

早崎情报的内容是：

黄琪翔为视察军事训练及监誓德庆军官学校副主任韩

1 这张照片，一直是郭秀仪的心爱之物。解放后，黄琪翔郭秀仪定居在北京，在他们家的墙上，就悬挂着这张照片。1966年“文革”小将抄家时失踪，从此没了影踪。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黄琪翔传》，p100。

4 1938年7月31日《申报》第三版。

汉英就职，于七月廿七日来粤，八月一日离粤，命其亲信者政治部设计委员丘哲接见谈者如次：（一）蒋介石坚持亲英联俄及防共政策，与周恩来，因感其恩义，私交甚好，未加抑制，但与共产党部之合作，仅止于军事，允在陕甘等边境省内推行共产主义而已，并未准共产党扩张入位，亦未供给新式武器，而积极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组织，防止全国青年之赤化。（二）将此次之命与陈诚亲密之黄琪翔就（任）军事训练副部长，盖为监视白崇禧。蒋对李、白之猜疑颇深，现将广西军配置于信阳、郑州等地，而不使其度长江，参加武汉方面之防卫，乃防止其返广西，至于未起用李济深为华南军事主帅者，因为有李、白所利用之虞，或有使何应钦坐镇广东之可能。（另一说：李济深计划与蒋光鼐等由汉口逃往香港。）”¹

早崎密报说，黄琪翔出任军训部次长，是蒋介石派去监视白崇禧之类的话，完全是他自己的猜测，并非事实。

黄琪翔于8月1日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广州监誓，这是他在政治部时期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¹ 台湾“国史馆”存“蒋中正总统文物”之“敌方情报”，典藏号020-080200-052。

四、军训部次长

1938年7月16日，军委会宣布了黄琪翔为军训部次长的任命书¹。恰在此时，黄琪翔闻知日军两次卑鄙偷袭中国中航和欧亚民航的民用飞机，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极为愤怒。9月9日，黄琪翔提笔给蒋介石写建议书，建议我方应以牙还牙，给日本还以颜色。黄琪翔的建议书名为《报复日寇破坏我航运之建议》。²

黄琪翔在建议书中写道：“吾人为回答敌人残暴计，为打击敌人航运计，为威胁敌人交通计，应断然予敌人定期商轮以无情的轰击。”黄琪翔指出，前时日寇袭击我民航飞机，违反国际法，是“蓄意破坏我国航运，其目的必至完全封锁我领空及陆地交通而后止。美国方面，曾一度向日寇抗议，竟遭日寇拒绝，德国与日寇同盟关系，自亦不至严重之表示，故日寇此种疯狂行动，在国际上当不至产生严重之后果。”

252

为了报复日寇，黄琪翔提出实施轰击敌人定期商轮的建议，并指出将会得到以下有利的结果：

“一，可使外人视沿海航行为畏途，不敢搭载日本邮船。外人当明了肇生此种事端，实日机演出之暴行有以促成之，其责任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六一案卷号30。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02-069。

当由日寇担负；

二，敌人之商轮因遭受我空军袭击，不得不抽调一部分敌机沿海飞行及调遣海军随商轮航行，以资保护，是则事实上减弱了敌人海空军对我进攻之实力。”

黄琪翔提示说：“查上海（至）香港间之航线、日（本）之定期来往欧美各大邮船，其地点与时间不难确知，若我华南空军择定良好机会，出敌不意，突予袭击而炸沉之，诚属轻而易举之事。”

黄琪翔还提示，在袭击之前，我方应由航委会发言人出面，促请第三国人士注意敌人残害我航运的暴行，同时，我国联代表也要在国际上声明：如果国际不予制裁日寇的话，我国空军被迫用事实回答。

蒋介石在这份建议书上批示：“拟办。拟交钱（大钧）主任核议。”

1938年7月，黄琪翔夫妇带着警卫等随从自武汉赶来广西，向部长白崇禧报到。军训部驻地在广西省会城市桂林，而广西是白崇禧的老家。

黄琪翔说：“1938年到1940年间，我在桂林军训部次长任内约有两年之久。当时日本军已转移它的进攻重点。因为日军自1938年占领武汉以后，对国民党开始采取诱降政策，一时不再深入，故桂林得告安全。”¹

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是杰出的军事家，还兼任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等职。在国民党军队中，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是最大的地方势力，人称“李白”。在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有些惧怕白崇禧，称之为“战神”。毛泽东也曾说过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这些称谓，不论褒贬，都显示出白崇禧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

黄琪翔到任桂林时，白崇禧刚刚协助指挥了两大战役，取得

¹ 黄琪翔《我的自述》。

相当不错的战果。一是台儿庄战役，二是武汉会战。

台儿庄战役，又称台儿庄大捷。战役的起止时间，一般认为是从 1938 年 3 月 16 日开始至 4 月 15 日结束。战役由滕县战斗、临沂附近战斗、台儿庄战斗和中国军队的追击作战等部分组成。在历时 1 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 29 万人参战，日军参战人数约 5 万人。中方伤亡约 5 万余人，毙伤日军约 2 万余人。¹

台儿庄大捷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改变了国际视听，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武汉会战，起止时间为 1938 年 6 月至 10 月，是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 4 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 4 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其中在万家岭一带，日军 4 个团被全歼，史称“万家岭大捷”。中国空军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 62 架，炸毁日机 16 架，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与空军合作，炸沉日军舰艇 23 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在战略上，武汉会战取得成功，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黄琪翔出身于粤军，与白崇禧的桂系是中国南方的两大军事派系，既是老对手，也是老交情。彼此都摸透了对方的底细，各自心照不宣。

桂系的“李白”，再加上黄绍竑，仨人并称为桂系三巨头。在历史上，粤军和桂系打打杀杀了几十年，关系时好时坏，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利益。相比之下，黄琪翔与黄绍竑结下的怨恨最深，原因就是 1927 年的“张黄事件”，他差一点把黄绍竑抓为阶下囚。可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桂系三巨头之间，白崇禧与黄绍竑

¹ 日军自报伤亡人员 11984 人。

的矛盾也很深，系因白对黄绍竑投靠蒋介石甚为不满。关于这一点，黄琪翔是心知肚明的。

在桂系内部的争斗中，白崇禧最恨黄绍竑，总骂他是心狠手辣、阴险成性。当三巨头分伙投蒋以后，黄绍竑总在蒋介石面前捣鬼，讲“李白”的坏话。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说：“‘六一运动’¹时，黄绍竑竟一再向蒋献策，提出用中央空军轰炸南宁，白崇禧获悉后，对李宗仁、黄旭初、夏威、维义和我说：‘季宽（黄绍竑的字）狼心狗肺，只要有大官做，即使杀掉他的父兄，他也会干！’同时，黄也向蒋建议，把白（崇禧）调虎离山，孤立李宗仁。李、白曾在上海有个情报组织，设有秘密电台，是陈劭先负责的……获知黄绍竑向蒋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央要统一全国，非先统一广西不可；要统一广西，非把李、白分开不可；要把李、白分开，非把白调到中央不可。’就因为李、白知道了这个秘密，白对蒋和黄绍竑也是始终不放心的。白对黄的仇恨和具有的警惕性，与白对中共的仇恨和警惕性，虽然性质不同，但就白本人对政敌的心理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相等的。”²

这次黄琪翔调入军训部，白崇禧表示欢迎。

1938年11月4日，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的威望很高，是当时军政界极为仰慕的人物。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与同在日本的蔡锷将军友情很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蒋百里在军校步兵科的考试中获第一名，连日本人也甚为佩服。³1938年蒋百里出任陆军

1 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蒋介石以“全国统一”、加强“精诚团结”为名，要求两广取消设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结束半独立状态。粤系首脑陈济棠经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讨，于6月1日联合发动了以抗日为名的反蒋“六一事变”（又称六一运动、两广事变、西南事变），通电全国。5日，两广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6日，南京饬令西南（指两广）不得自由行动、破坏抗日政令军令的统一。9日，粤桂军下动员令，出兵湖南。蒋介石急调两个军控制衡阳，阻粤、桂军北上，随即又调动几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3面进逼广西。经几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罢兵息战。蒋介石同意广西维持现状，李、白则发表通电称：“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

2 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p9。

3 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1版，陶菊隐《蒋百里传》，p10。

大学代理校长，不幸在任内去世。

早在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针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蒋百里在此书扉页上题词：“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要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日本）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来说，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蒋介石一直很尊重蒋百里。当年北伐军刚占领南京，恰巧蒋百里也在那儿，蒋介石在百忙中亲自去看望他，而就在此前北伐军进攻湖南时，蒋百里其实是吴佩孚的总参谋长。

193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1892—1975）：“蒋百里先生逝世，至堪悼惜。本会当特予优礼其丧事，可依照公葬仪式行之，即由省政府主办。本会派黄次长琪翔前来协理。特电希查。中正办。”¹

蒋百里是保定军校的首任校长，而黄琪翔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然算是蒋百里的学生。黄琪翔此时任职军训部的驻地在广西，所以蒋介石派黄琪翔去协理蒋百里先生的丧事，是十分恰当的安排。

1939年元旦，白崇禧在桂林举办新年阅兵活动，并向桂林群众团拜，他主动邀请黄琪翔出席。团拜活动在桂林大体育场举行，其中最隆重的一项仪式是阅兵，参加阅兵的部队和群众共一万五千多人。白崇禧、黄旭初、黄琪翔、夏威、林蔚文、曹浩森等均登上主席台。主检阅人当然是白崇禧。“白（崇禧）等骑

¹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013-113。

马绕场检阅一过。受阅部队计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学生军团与正规军，皆英武可敬。白氏于阅兵后对群众训话，历时一小时半始毕。”¹

军训部是一个类似军事学术研究的单位，一般被人视为清水衙门。白崇禧回忆说：“军训部的前身是训练总监部。（在日本）陆军部长、训练部长、参谋总长是日本制度的三长官，势力很大，我们仿照皮毛，把日本的操典和典范令都搬来，可是精神没有搬来。我们的训练总监，先后是何应钦、李济深、唐生智，后来是我。唐生智很少去训练总监部办公，不用说开会，他把这个机关当作是应酬他的一个职位，自己不重视，别人自然也看不起，所以训练总监部被认为是一个冷衙门，俗语说吃豆腐的机关，意指吃不起肉，穷的意思。”²

自从白崇禧上任军训部部长以后，他开始重视军事理论和战术思想的研究，许多学有专长的军事将领聚集于此，也算是人才济济。如次长刘士毅（1886—1982），是日本炮工学校及帝国大学造兵科的毕业生，学具专长。当时军训部的主要人员构成如下：

部长：白崇禧；

次长：黄琪翔（先）、刘士毅（后）；

步兵监：阮肇昌；

骑兵监：门炳岳；

炮兵监：刘翰东（留日学炮兵）；

士兵监：林柏森（士官学校毕业）；

辎重兵监：李国良（士官学校毕业）；

通讯兵监：华振麟；

机械兵监：徐庭瑶；

国民兵监：杜心如；

军学编译处：杨言昌（士官学校毕业）；

主任参事：徐国镇（保定、陆大）、徐文明（保定）。³

1 1939年1月2日《申报》第二版。

2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365。

3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538。

蒋介石在长沙、南岳的军事会议上多次表示，为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指挥水平，等待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进行整编的同时，要开展军事训练和教育事项，并且指定这项工作由白崇禧的军训部主持。白崇禧认为“此事关系甚为重大”，于是开始制定《战时整编部队教育纲要》，由黄琪翔等组织编撰。

1939年4月间，黄琪翔奉命前往湖南等地，视察部队整训以及军事学校的教育情况。据白崇禧提交给蒋介石的报告，可知黄琪翔此次沿线视察了驻零陵之工校、军二分校、军官总队、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以及驻衡阳、衡山、长沙之第六军所属各师团。黄琪翔“对于整训时应行改进与注意事项，经分别予以口头、书面指示”。¹

黄琪翔在军训部当次长，时间长达近两年，这是他在八年抗战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部门。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军事专家召开学术研讨会，其余时间去部队指导和检查军事训练情况，做出评估。白崇禧在六十年代回忆军训部的工作时说：“得各次长以下各同仁的努力，我又提倡人事权衡以训练成绩为依据，再加上我到处校阅及演讲，（军训部）渐渐受到重视。”²那时身在台湾的白崇禧，在回忆录里几乎没有提及已经“投共”的黄琪翔。但在这里，他隐晦地说到军训部各次长的努力，说明他对黄琪翔在军训部的工作成效是满意的。

可是，前线的战士已经在用命血战，后方的部队又在不停地调遣，很少有时间专门搞训练。黄琪翔只能常常去给打败仗的部队作训话。最著名的一次是给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讲话。

1938年冬，日军偷袭广东，在惠阳县的澳头、淡水登陆。余汉谋的守卫部队缺乏戒备，仓促应战，结果兵败如山倒，日军只用了十天的时间，就占领了广州。广东战区负责人、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和广州市长曾养甫，受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15-119。

2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365。

到了人民群众的指责和唾骂。当时流行这样的话：“汉谋无谋，吴铁无城，曾养无甫（谱）”

为了扭转败局，余汉谋部于1939年春，在翁源南浦主办了一个“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请军训部次长黄琪翔去训话。

在讲话前，黄琪翔通过时任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主任秘书陈卓凡，以及一些第三党的同志如陈柏麟、张育康、谢维汉、黄若天等收集情况，掌握了第十二集团军军官的真实思想，然后在1939年6月初的某天，黄琪翔来为这些军官开讲。¹

黄琪翔的军事演讲，极具吸引力，所有军官都在屏声息气认真倾听。他首先讲了抗战形势，讲了日军的真实状况，讲了中国军队为什么与日军遭遇时一触即溃的客观原因。他认为，中国军队与日军单兵比较，差距是明显的。总体上讲，中国军人在军事素养、训练以及装备三个方面，远比日军要差。他提出，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了解敌军的长处不是为了惧怕他，而是要研究如何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他。军人为国捐躯是本分，但，战士的死，一定要有价值，决不能白白去送死，只有在研究了敌人的特点并与敌拼死中才能战胜敌人，赢得我军的不死。黄琪翔也痛骂了中国军队中一些军官畏难苟安和贪图享乐的思想，说，这样的军人上战场，如何能打败优势的敌人！

黄琪翔的讲话，不用讲稿，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态度又恳切动人，所以他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现场鸦雀无声。余汉谋将军也始终站立在讲台上，目光平视，态度诚恳地听黄琪翔训话，这让其他的军官们痛感自己的军队作战没有作为是多么可耻，也足见余汉谋对黄琪翔讲话的重视。²

余汉谋将军，本是黄琪翔在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黄琪翔在北伐任师长时，余汉谋是其属下的团长，此时他俩已经平级。余汉谋中将时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还兼

¹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谢维汉文章《回忆黄琪翔同志二三事》，p71。

² 《黄琪翔传》p102。

任“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的团长。

“黄琪翔在视察期间，还深入军官补训团的课堂，了解教官讲课的情况，并根据观察所得作了一些指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视察部队训练外，他对广东前线的军事、行政工作，也极为关心。他在南浦期间，曾了解潮汕方面的情况，与陈卓凡等商量，研究谁是出任前线迪曲军政领导的适当人选，准备向当局举荐，以利于发动群众，扭转败局。这些事例，也说明他是随时随地都在为国操心。”¹

在桂林期间，李宗仁提议，希望黄琪翔也在桂林买块地用来盖房子，将来解甲归田时可以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回桂林养老。李宗仁的提议，得到了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的响应。原因很简单，因为桂林山水甲天下，美丽的桂林景致堪比人间天堂。

李宗仁告诉黄琪翔，自家附近还有一块好地，应该把它买下来。于是在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穿针引线之下，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真把那块地买了下来，还连同周围的20多亩土地。虽然不是市中心，这里确是桂林风景最好的地段之一。

郭秀仪开始忙碌起来。她派人挖鱼塘，池塘中种植了法国睡莲。她还邀请美国留学回来的著名建筑师林乐义（1916—1988）设计建造小洋房，并在楼房周围遍种果树和花木，加上围墙，成为一处典型的花园洋房。

建成后的黄琪翔公馆，位于桂林市桃花江边的甲山脚下，毗邻李宗仁的公馆。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小洋房的主楼为石、砖、木结构，占地约200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外墙以青砖和大理石料相间，窗式亦中亦西，红洋瓦盖顶。楼内铺设木地板，设有西式取暖壁炉，整栋建筑呈现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

紧贴洋房楼外，还建有一座石灰岩砌就的警卫室。警卫室坚固又紧凑，三面墙上均有枪孔，可以向外射击，凸显出防御功能，

¹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谢维汉文章《回忆黄琪翔同志二三事》，p72。

也能透露出洋房主人的军旅身份。离开主楼不远的东北角，还有一排“7”字形的平房，那是厨房和下人用房。¹

黄琪翔的表弟刘凌云曾在桂林黄宅住了三个月，他是这样描写桂林黄公馆的：“琪表哥和琪表嫂的公馆坐落于桂林城东北方的甲山村，是一栋精致的小洋房，深藏在一座青翠冈峦中，小桥流水，巨石嶙峋，别有洞天。”²我们不难想象，这是一栋充满诗情画意的别墅建筑。

丈夫们在外忙着战事，将军妻子有了更多的悠闲时间。李宗仁太太郭德洁（1906—1966）、白崇禧妻子马佩璋（1903—1962），平时也大都生活在桂林，与郭秀仪往来频繁。

马佩璋是桂林本地人，1903年生于书香门第，肄业于桂林女子师范。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妻子在家里说话也有份量，白崇禧对她很尊重。

马佩璋与郭秀仪的关系友善。郭秀仪知道白崇禧夫妇都是回民，而且白崇禧还笃信伊斯兰教，可是，郭秀仪见马佩璋平时的穿戴跟汉族一样，妇女们一起聊天也很随意。

白崇禧、马佩璋夫妇共育有10个子女（7子3女）。分别为：长子白先道、次子白先德、三子白先诚、四子白先忠、五子白先勇、六子白先刚、七子白先敬、长女白先智、次女白先慧、三女白先明。³白崇禧生活很拮据。杨受琼证实，白崇禧当时只领取副总参谋长的薪水，从不用军训部的钱。⁴可是，抗战时，从老家跑出来的家属和亲人一百多人都需要白崇禧的照顾，这一点连蒋介石也知道。白崇禧在军训部任职，时间长达八年。

¹ 改革开放后，为建桂林丽景度假酒店，开发商已经拆除了黄琪翔公馆警卫室以及“7”字形的一排平房，主楼也被改装为房产商办公用房。

² 《流金岁月》，p212。刘凌云文章《永远的琪表哥琪表嫂》。

³ 1986年白崇禧的六子白先刚自台北来北京拜会郭秀仪。一听他是白崇禧的小六儿，郭秀仪拍着双手开心大笑，说，“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⁴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364。

1938年11月，刚处理完长沙大火事件¹的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的地点在古镇西侧白龙潭上的圣经学校。这个会议史称“衡山会议”，会议时间是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前后召开过四次“衡山会议”，这是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第三和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200余人出席。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应邀出席。

黄琪翔作为军训部次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蒋介石给将领们打气，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时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敌周旋，使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会议上，蒋介石还列数了部队中的许多问题。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出现士兵逃亡的现象；统帅部的命令在一些部队得不到贯彻执行；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他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学韩复榘那样不听招呼，像长沙大火那样乱捅漏子！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当韩复榘第二！一

¹ 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蒋介石密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立即召见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但在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1938年11月20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1939年6月14日，黃琪翔的妹妹黃景新与张发奎将军的弟弟张勇斌（前排中间）举行婚礼。后排左起：张月英、黃琪翔夫人郭秀仪、张发奎夫人刘景容、黃琪翔母亲刘桂五、张发奎、黃琪翔。

席话说得大家汗毛直竖。

大家明白：打了败仗也许不会要命，但不听委座的指挥可真的会要命。韩复榘被执法的事，谁人不知？“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韩复榘亲自在第一线指挥抗战，打了夜袭桑园车站、血战德州、坚守临邑、济阳遭遇战、徒骇河之战、济南战役、夜袭大汶口等战役。却因为他不听委员长的命令，还与蒋介石多次发生矛盾，指责中央不支援、不发军饷、炮兵旅被调走……结果在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以“失地误国罪”被判处死刑，时年48岁。

五、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23日，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到半年时间，日本侵略军攻占我国华北、华东大片国土。

黄琪翔说：“上海战役完全失败，我随陈诚的总司令部由上海西撤，经过安徽、湖北，直至是年冬到达武汉后，撤消了这个总司令部。”还说：“南京政府撤至武汉后，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邀请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加。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我为副部长。”¹黄琪翔是在1937年的年底到武汉，他的妻子郭秀仪同时撤退到了武汉。

由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一度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要员云集于此，指挥对日抗战，武汉就成为全国抗战临时指挥中枢。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来到武汉后，住进了有名的汉口德明饭店。

德明饭店的门牌号当时是“四民路185号”，它的主体建筑至今还在。现在的地址叫汉口胜利街245号，饭店已改名为“江汉饭店”。它是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典型的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建于1919年，由法国商人圣保罗投资兴建。圣保罗也译沈保禄。

¹ 黄琪翔《我的自述》。



265

1938年，宋美龄（左）与郭秀仪合影于武汉。

设计师是法籍犹太人史德生夫妇。

英国作家詹姆斯·迈克马努斯的小说《黄石的孩子》原著中，有一个篇章写的是中国汉口，还专门写了德明饭店：“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城市……总会因为战地记者的驻扎而涌现一批著名

酒店，那是记者们在一起交流、喝酒、相爱或者背叛对方的场所。在西贡有著名的洲际酒店的酒吧，在索尔兹伯里有奎尔俱乐部，在贝鲁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国的汉口则有美国海军的俱乐部和其附近的德明饭店……史沫特莱就是海军俱乐部和德明饭店媒体喝酒、聚会的核心人物……”¹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入住德明饭店期间，民国政府的许多要员也都住在这里，如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等。但黄琪翔与这些人没有多少来往，只是他们的夫人们之间有些接触而已。

经过1937年大半年的深入接触，陈诚发现黄琪翔的工作作风踏实细致，尤其在淞沪会战中，黄琪翔临危不惧，协调部队能力出众，诚为可信，于是把他纳入自己的权利班子，总以正副职配对，成为自己的主要副职。在八年抗战中，黄琪翔的几次重要工作调动，都与陈诚任职有关，做陈诚的副手，这就是主要原因。蒋介石也清楚这一点，认为黄琪翔是陈诚的人，似乎也不再计较黄琪翔的反蒋历史背景。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成立政治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陈诚兼任部长，任命黄琪翔为副部长。除黄琪翔之外，另一位副部长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联合政府内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

蒋介石选定陈诚、黄琪翔和周恩来三人担任这个新组建的政治部领导，蕴含着他的政治智慧。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自然要主导政治部工作，而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代表，黄琪翔是“解委会”的代表，这样至少在形式上体现了联合抗战的形象。

此时，蒋介石已采用白崇禧的抗战理念，即“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日作战策略，抗日战争转入持久战已经成为现实。大家都明白，山地战斗将必不可少。当时的国民党高级

¹ 小说后来改变成同名电影《黄石的孩子》，由中国、澳大利亚、德国联合拍摄。罗杰·斯波蒂伍德执导，乔纳森·莱斯·梅耶斯、周润发、拉达·米契尔和杨紫琼等联袂出演。影片于2008年4月在中国内地上映。

将领太太们，大都是随军的，而黄琪翔将军的妻子郭秀仪，虽然在德国已经学会了驾驶汽车的本领，显然不够，于是在黄琪翔的热情支持下，郭秀仪在汉口开始学习骑马。黄琪翔本人很清楚，一旦战事需要，他必定还要奔赴战场，而依照妻子的个性，她也会去前线。

郭秀仪回忆说：“我们在汉口的德明饭店住了一段时间。琪翔为我请来了苏联教练，学习骑马，使我尔后在抗日前线能够以马代步。”¹ 郭秀仪的骑马教练是一位苏联人，准确地说，是白俄罗斯人。

日军的侵略战争已经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灾难，千万难民流离失所。而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处境尤为悲惨，他们或是死于敌人的炮火下，或是倒毙在饥饿贫病的逃难途中。还有传闻说，有一批中国儿童被日军掠走，送往台湾、朝鲜以及日本，施以奴化教育，甚至有的被抽取鲜血，输给日军伤兵。

1938年1月20日，《妇女生活》发表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先生所写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文章，呼吁“爱国爱民族的同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完成这个保育中国幼年主人的任务，为我们阵亡将士，死难的父老兄弟姊妹和儿女报这血海似的冤仇！使他们虽未得享受自由解放于生前，但能安慰于壮烈牺牲之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正义而善良的呼声，打动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心。身在武汉的各界妇女率先行动起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便应运而生。

1月24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备会如期召开，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被推举为筹备会的主任委员，另外又推举8位筹备会委员，郭秀仪是其中之一。² 郭秀仪因此成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创始人之一。

郭秀仪参加这个战时慈善组织，是因为邓颖超的推荐。郭秀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147。郭秀仪文章《追求光明，不断进步》。

²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129。郭秀仪文章《我与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会》。



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合影。左起：李德全、冯弗伐、邓颖超、张蔼真、陈纪彝、安娥、刘清扬、郭秀仪、谢兰郁。

仪回忆说：“邓（颖超）大姐告诉我，准备联系妇女界人士商量并发起成立一个团体来办这件事。我向大姐表示，我很愿意参加和做一些具体工作。”她还回忆说：淞沪会战后，她随丈夫黄琪翔将军“在从上海绕道嘉兴、徽州到武汉的途中，一路都看见往后方逃亡的难民，尤其是一些失去了家和父母、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以及因伤病倒毙在路旁的孩子的尸体，使我们看了心里十分难过。”¹郭秀仪决心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

268

保育会筹备会议于1月24日召开的时候，宋美龄并没有参加。会后，考虑到这个组织的重要性，邓颖超找李德全商议，建议李德全让出会长的位置，邀请宋美龄出面主持保育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向宋美龄说明，保育会可作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的直属单位，并在这一组织下开展活动。“中国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129。郭秀仪文章《我与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会》。

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的会长，就是第一夫人宋美龄。李德全完全赞同邓颖超的主张。随后，邓颖超委托史良、沈兹九、刘清扬三人面见宋美龄，邀请宋美龄出任会长。¹

宋美龄当时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抗战，她无私无畏，亲临前线，慰劳战士。1937年10月8日，是淞沪前线战斗最激烈之际，也是国民党双十节的前夕，前线的战士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后方来了一辆运输卡车，而且他们惊愕地发现从卡车上走下来一位“穿着卡其布紧身衣和马裤，上身外罩一件纹皮外褂，一头梳理得很整齐的秀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她就是‘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会长宋美龄。”大家都在为夫人的安全而担心。这时，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把这间农舍震得摇摇欲坠。宋美龄镇静地说：“我们不能像你们这样在前线作战，所以，只好做点慰劳的工作。”宋美龄这次来前沿阵地，随车带来妇女慰劳总会捐赠的1000件棉衣，500条军毯和2000卷纱布，还带来了一些可口的糖和苹果。

宋美龄不仅具有舍身忘我的工作精神，而且极具亲和力和号召力。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能讲流利的上海话、广东话，也能讲普通话，并经常发表动人心弦的演讲和文章，这使她的影响力超过了当时的任何一位女性。邓颖超的主张完全是正确和明智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不能缺少像宋美龄这样一位妇女运动的领袖。当然，宋美龄也乐意接受这一邀请，因为保育会不仅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重点工程，更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至此归属“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它的全称是“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称“保育会”。

3月10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界限路圣罗以女子中学隆重举行，妇女界、中外来宾等7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这一天，宋美龄身穿黑色丝绒旗袍，仪态大方。她见到邓颖超，执

¹ 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佟静著《宋美龄大传》，p350。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前排左起：黄卓群、吕晓道、陈纪彝、沈兹九、徐镜平、钱用和、陈逸云。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后排左起：孟庆树、刘清扬、唐国桢、沈慧莲、曹孟君、郭秀仪、史良、邓颖超。

礼甚恭，始终称邓颖超为“邓先生”，并表示国民党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一向谦逊的邓颖超，则称宋美龄为“蒋夫人”，并很得体地建议说：“不仅要以抗战精神抢救难童，还要将他们培养成为建设祖国的人才。”

宋美龄在大会上致词，她说道：“今天大家所要讨论的儿童保育问题，就是我们妇女界战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她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拯救难童义不容辞的责任。会议选出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在内56名妇女界人士为理事。在保育会成立的当天，就收到陈济棠捐款5000元，张发奎、谷良民、陈立夫以夫妇的名义各捐款1000元。蒋介石夫妇、冯玉祥夫妇、宋子文等各捐款100元，全部捐款总

计超过了 18000 元。¹

3月13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17名常务理事：宋美龄、李德全、黄卓群、邓颖超、史良、曹孟君、沈兹九、安娥、孟庆树、张蔼真、陈纪彝、郭秀仪、唐国桢、舒颜昭、任培道、徐瑞、陈逸云；5名候补常务理事：徐镜平、刘清扬、庄静、吕晓道、朱纶。

在讨论理事会设立的各组织机构人选时，原先拟定组织委员会主任候选人是邓颖超，副主任是国民党社会部妇女科副主任陈逸云。陈逸云（1908—1969）不买账，在会上力争要国民党员独占组织、宣传、保育三个委员会要职，宣称自己“有几十年组织工作经验”，其真实意图是要让国民党执掌实权，排挤代表中共的邓颖超和其他一些进步人士。陈逸云是国民党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参加过军统特务工作的训练。² 邓颖超则显得非常大度，当即表示自己不要任何名位。她说：“我不要任何名义。只要工作需要，我一定努力去做。”

宋美龄看到陈逸云在会上公然“抢位子”和自我标榜的表演，不觉皱眉。她是一个被西方民主思想浸润过的人，其修养出众。宋美龄歉疚地笑着说：“邓先生不计名位、一心为抢救难童服务的精神，令人钦佩。大家还是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吧。”³ 宋美龄的话，不仅把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陈逸云的气焰控制住了，也让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最后，理事会形成了以下各组织机构领导名单。

战时儿童保育会下设一个秘书处，6个专门委员会：

秘书处，主任张蔼真、副主任陈纪彝；

设计委员会，主任史良、副主任任培道；

组织委员会，主任陈逸云、副主任庄静；

宣传委员会，主任沈兹九、副主任徐闿瑞；

¹ 1938年3月11日《申报》。

² 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宋美龄大传》，p371。

³ 《宋美龄大传》，p351。



战时儿童保育会三周年在开会。宋美龄（左二）、李德全（左一）、郭秀仪（右一）。

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副主任唐国桢；

输送委员会，主任黄卓群、副主任刘清扬；

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德全、副主任郭秀仪。

我们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时年 27 岁的郭秀仪，是最年轻的战时儿童保育会领导人，作为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副职，十分瞩目。

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扩大国内外影响，保育会还聘请 286 位名誉理事，其中包括国共双方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如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孔祥熙、宋子文、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黄琪翔、郭沫若、陶行知、茅盾、老舍、蔡元培、晏阳初、胡适、陈嘉庚、胡文虎、斯诺、史沫特莱、司徒雷登、鹿地亘等，体现了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宋美龄领导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著名女记者子冈在《蒋夫人印象记》中写道：宋美龄“在抗战中接近许多姐妹，她们的工作使她兴奋，她恨不得使这许多姐妹个个成为一部发动

机，去推动广大的落后妇女群众来参加抗战工作。”史良在《自述》中也说：“如果抛开政治见解，我对宋美龄个人的印象是好的，她能干、大方，说话、做事得体。”这说明宋美龄在许多亲近她的女同胞眼里，享有崇高的威望。

郭秀仪就是在这年认识宋美龄的，在宋美龄和邓颖超的鼓舞下，把自己满腔热忱都投入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之中。

事实上，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郭秀仪已经如同公益明星一样，十分耀眼。在当时大多数媒体的相关报道中，郭秀仪的名字紧随委员长蒋夫人、副委员长冯（玉祥）夫人之后，位列第三，其他理事的名字或者一笔带过，或者索性不提。这大概是因为郭秀仪的美丽、年轻以及充满朝气的活力感染了整个社会，而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个崭新而夺目的形象来鼓舞和慰藉人心。如当时的主流媒体《申报》报道说：“关于难童的保育与教育，现在有三个机关，一个是难童教育委员会，一个是难民儿童教养团，另一个规模最大的，便是蒋夫人、冯夫人、黄琪翔夫人郭秀仪等主持的难民儿童保育会。”¹

此间，邓颖超亲自安排罗叔章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均县抢救难童，给她一封宋美龄亲笔写的委任状和介绍信。罗叔章（1898—1992）赶到均县，带着男女老幼 600 多人，从均县溯流而上到陕南汉中，再沿着嘉陵江到达重庆，辗转行程两千多里，终于抵达目的地。这其中大部分难童，就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所收容的第一批难童。

1938 年 5 月 1 日，临时保育院正式成立，其位置在汉口同仁医院旧址。第一批从炮火中被抢救出来的五百名难童，参加了开幕典礼。“上午九时，第一临时保育院举行开幕典礼，冯夫人李德全、黄夫人郭秀仪、邓颖超、史良、曹孟君、张蔼真、唐国桢，和全体理事都联翩出席，来宾也到了很多。推冯夫人主席。”“从前方接来的五百多名难童，这是保育院第一次预收的数目，难童

¹ 1938 年 3 月 22 日《申报》第二版。

多半是从河南来的，其次是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江南等地，难童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五六岁，父母职业除少数营商外，俱因战事影响而致失业者。”¹随后，蒋介石、冯玉祥、周恩来、黄琪翔分别赶往临时保育院看望难童，并发表了讲话。

1938年4月11日，宋美龄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谨为难童请命》文章，说：“我们大家倘回想到做孩子时候的情景，父母怎样爱护我们，家庭团聚在一起是怎样的安全欢乐，在学校读书又是得到怎样的智慧和乐趣，现在再看看这群难童，谁不应该抢着去救济他们，救他们跳出水深火热的苦难，帮助他们变成有作为的国民，将来也担负起捍卫国家、复兴国家的一部分责任呢？现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在进行募款运动……现在，我们请求同胞们，每一个人量力认定几个儿童的保育费，我们最初的目标想保育两万个儿童，将来经费扩大，保育儿童的数目当然也就跟着扩大了。”

按照当时物价测算，每个难童每年生活费约需60元。保育会成立后，在武汉掀起了颇有声势的为拯救难童募捐活动。这是募捐活动最著名的一次。

1938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日子，武汉三镇为抗战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公益捐款活动。据当日中央社报道：“七日为武汉三镇民众献金之第一日，汉口方面，献金台有四处：（一）中山路水塔由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女士主持开幕礼，黄副部长琪翔代表政治部全体同仁献上一万元支票一张。（二）世界戏院前之献金台亦同时揭幕，附近市民均纷纷上台贡献，影星黎莉莉女士将彼与罗静予结婚之纪念戒指亦捐入柜内。（三）江汉关方面由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主持揭幕，首由陈芷町献上一千元，献金者五千多人，共一万八千余元。（四）总理像前之献金台，由黄仁森代表蒋委员长与蒋夫人前来奉献，用红色包袱包着，用铅笔写明数目，共一万九千四百五十一元一角四分。”²

1 1938年5月2日《申报》第二版。

2 1938年7月9日《申报》第二版。



在武汉中山路水塔献金台上，由黄琪翔夫人郭秀仪（中）主持及宣导。
中央社提供。

关于献金台的报道，各家报纸大多组织专题报道，均把郭秀仪主持之设在汉口中山路水塔的献金台作为第一视点。《申报》发表《武汉献金第一日》的长篇通讯，文内第一节“中山路水塔”即写道：“脚下有一个献金台，当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女士拉直了嗓子，说完了开幕词，并亲自递进了五十元后，全场的群众，都拥着上台输将了。接着是黄副部长琪翔代表政治部全体同仁，又献上了一万元的一张支票，这样又陆续的由民众自动的上台来捐助了。这里有工人，有老太太，小孩与妇女，而最使人兴奋得几至泣下的是一位六十岁的北平流亡来的老者。他叫傅部周，是靠着贩卖长生堂的无极丹来度日的，接连来了三次，捐助了一角九分，说这是他今天卖了无极丹所得的纯益，他尚且还希望再卖了几包再来捐助。还有一条大汉，送卅八把大刀，他说：给弟兄们去杀鬼子。十四师的龚天武团长，也伴着太太献了他俩的结婚戒

指。下午有一位交了一英镑与十元的港纸两张，他是办国民参政论坛的李农君。总计到下午六时止，有四千多人，两万余元，情况是真的空前热烈。”¹

郭秀仪听说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先生（1916—1992）要去美国，就急中生智请他帮忙到国外去捐款。郭秀仪回忆说，“后来我将捐册交给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请他到国外募捐，也捐了不少钱回来。”²

郭秀仪除了向社会募捐外，还把自己积蓄捐献出来，并负担了442名难童的长年生活费用。当时，郭秀仪的募款额位居第三，认养的难童人数仅次于宋美龄和李德全。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个人经募及资助难童数目表：

宋美龄女士：英金10英镑，美金15元，现款26389.63，资助难童2459人。

李德全女士：现款2503元，资助难童511人。

郭秀仪女士：现款20986元，资助难童442人。

张郁真女士：现款280元，资助难童93人。

安娥女士：现款231元，资助难童10人。

朱宗搢女士：现款1513元，资助难童44人。

黄卓群女士：现款9000元，资助难童60人。

梁培树女士：现款1050元，资助难童31人。

刘清扬女士：现款466元，资助难童15人。

沈兹九女士：资助难童10人。

曹孟君女士：资助难童2人……³

在这次大规模的营救难童活动中，郭秀仪竭尽所能，忘我工作，赢得了“难童妈妈”的美名。

关于保育院的珍闻，还有一则，就是宋美龄还曾养育了以后

1 1938年7月8日《申报》第二版。

2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68。郭秀仪写文章《忘事拾遗》。

3 以上资料来源《流金岁月》，p120。郭秀仪文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忆旧》。

成为新中国总理的李鹏先生。

这是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于1998年5月透露的，她说：“蒋夫人在抗战时期曾经养育过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李鹏。”当时的报道说：“过去曾被视为是禁忌的史实也因为两岸的开放交流被解开，辜严倬云说是李鹏向蒋夫人致意的信件揭露了这段因缘。”宋美龄负担了多位难童，“迁台时蒋夫人带着其中100多位子弟到台湾安置，其余还有约300多孤儿仍跟着宋庆龄及邓颖超留在大陆，多年来两岸隔离即失去联系，但两岸恢复交流后就开始陆续有人自大陆写信要求妇联会转交给主任委员蒋夫人，他们都是当年受蒋夫人照顾的孤儿，其中包括李鹏在内。辜严倬云说，他们在信中表露的孺慕及感恩之情让人读来更是感动。”¹

保育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抢救战区难童，并把抢救出来的难童送到武汉。到1938年9月中旬的半年中，武汉已经收容难童9070人。经保育会帮助转移至后方的难童，则人数更多。

1938年秋，武汉战事吃紧，保育会迁往重庆。以后一些省份相继建立了10多个保育分会。其中，宋庆龄、何香凝负责香港分会；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负责广西分会；龙云夫人负责云南分会；张治中夫人负责湖南分会；邓颖超、蔡畅、丁玲负责陕甘宁边区分会……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设立44个儿童保育院，收容难童3万余名。²

难童进入保育院后，就被称为保育生，他们的命运便开始改变。保育院首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保育生健康成长，不单是养活他们，更要施以教育，使每一个孩子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成为建造新中国的劳动者。保育生们除了要上正规的文化课程，各保育院都很重视对他们进行生产劳动的教育。

保育院开展劳作教育的根本原因：第一是由于一部分儿童已

1 《民生报》1998年5月21日综合新闻版。

2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122。郭秀仪文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忆旧》。

经到了可以劳动的年龄，而他们大半是劳动大众的子女，懂得而且习惯劳作。第二，保育院的现实环境与经济困难需要开辟出一条新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第三，是试行了实用教育原则。于是，十岁以上的儿童，大都参加了一种或几种的劳作，贡献出自己所能贡献的力量。同时，在劳作中，他们也获得了更丰富更切实的技能。

到1940年4月15日宜昌失陷前夕，宜昌接运站共抢救出的各地难童达1.5万余人。此外，该会组织步行内迁的难童人数也不少。整个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成为抗战时期各难童救济团体中成效最突出者，它总共救助的难童在3万人以上。

郭秀仪回忆说：“在那段日子里，我工作非常紧张，常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但我内心感到很充实，很欣慰。在民族危急、国家存亡之际，我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一些老大姐看到我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很心疼我，给予我赞许和鼓励，平时亲昵地叫我‘小妹妹’。”¹

宋美龄内心非常喜爱郭秀仪，因为这个小妹妹不仅活泼可爱，聪明能干，更可贵的是她真心诚意地从事这项伟大的运动，没有一星半点私心杂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这么简单透明，所以宋美龄在工作上也很倚重郭秀仪。

此后，宋美龄还常带她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单独邀请她到总流行辕，和他们夫妇一起吃饭。这是一种特殊的礼遇。

郭秀仪为保育院难童奔波的同时，她的夫君黄琪翔正在为军委会政治部的工作而操劳，夫妻俩因此常常不能在一起吃饭。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121。郭秀仪文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忆旧》。

六、宋美龄与郭秀仪

1938年11月的南岳会议间歇，蒋介石特意找到黄琪翔，突然询问：“你的妻子现在哪里？”黄琪翔感到莫名的茫然。蒋介石解释说，因为夫人宋美龄要去慰问伤兵，想请郭秀仪一同参加。

蒋介石亲自出面给下属打招呼，邀其夫人郭秀仪参加劳军活动，这一举动实在罕见。显然，这是宋美龄的主意。按照惯例，邀请郭秀仪参加慈善活动，只需委员长行营的副官处电话通知即可，无须蒋介石亲自过问。

黄琪翔立即给远在桂林的郭秀仪打电话，让她赶紧来南岳，陪同宋美龄去慰问伤兵。

黄琪翔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矛盾。他并不反感蒋介石个人，甚至，还很尊重他。蒋介石成为党国领袖后，的确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蒋介石“平时，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甚至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这是很了不起的，哪个统治者能做到这一步？”¹

他和蒋介石的矛盾集中在政治观点上。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且，他多次组织、参与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是这些军事活动中的核心成员，因此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曾经达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五八辑，p181。

到了殊死斗争的地步。

蒋介石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人，有心狠手辣的一面，比如枪杀“临委会”领导人邓演达就引起了社会公愤。也有他大肚能容的一面，比如，历史上与蒋介石作对的很多著名人物，真正被其处死者，并非是大多数。特别是，现在的环境不同了，已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而蒋介石又是全民抗战的统帅，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人，所以，作为军人的黄琪翔，必须服从蒋介石的领导。

在黄琪翔内心，还是真心佩服中国共产党。因为在这个黑暗的中国，它是唯一能真正看到国家未来希望的政党。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友善。可是，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中，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显而易见。所以黄琪翔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力量时，就需要拿出政治谋略和手段，来平衡这种关系。

黄琪翔夫人郭秀仪是他的事业伴侣。由夫人郭秀仪出面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便显得十分自然，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和警觉，有利于自己开展工作，这就是常人所谓的“夫人外交”。

郭秀仪赶到衡阳后，军委会议已结束，黄琪翔返回桂林军训部工作。妻子郭秀仪就住进蒋介石临时行营，与宋美龄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宋美龄除了邀请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外，还邀请了因“长沙纵火案”而被“革职留任”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1915—2011）。

此前，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有个下属单位叫乡村工作队，在11月初抵达衡山。11月8日，队员们集中在衡山钟鼓楼开会，结果遭遇敌机轰炸，队长吕纯、队员胡鸣福等女士当场殉难，副队长余海心女士失掉了一只手。宋美龄不胜哀痛，亲往衡山慰问。

郭秀仪赶到衡阳时，乡村工作队的活动已结束。按照宋美龄的要求，郭秀仪和张素我住进行营。吃饭时，她俩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起同桌用餐。一个桌子，只他们四个人吃饭，很安静。蒋介石说浙江话，宋美龄和郭秀仪说上海话。浙江与上海地理相

近，彼此方言大都能够听懂。

郭秀仪回忆说：“蒋介石总是很客气，不仅时常问黄琪翔的生活情况，还亲自为我布菜。”¹

宋美龄出门去慰劳伤兵，都是请郭秀仪同坐一辆车，由宋美龄副官替她们拿大衣、开车门。

有一次，她们在路上看到一队队新兵在行进，垂头丧气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一队队俘虏兵。这些新兵，其实就是壮丁，他们的双手被捆绑着。宋美龄十分气愤，命令停车，叫她的副官去质问带队的军官，为什么要捆绑这些将要去为国打仗的新兵？军官报告说，是害怕壮丁们逃跑。

宋美龄很是感慨，对车内的郭秀仪说：“让这些不是志愿的人去当兵打仗，怎么能打胜仗！”

郭秀仪当然不便、不能、也不敢吱声，去接她的话茬。

其实，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抵抗日军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处境十分艰难。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1918—2000）写道：“原来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全靠上下蒙哄、对外掩饰才胆敢以苦肉计和空城计的姿态对日全面作战。战前蒋委员长所掌握的三十个德式装备师不及一年即损害殆尽。据日本大本营一个大佐的估计，国军总数一度低至九十万。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队及征调农民，素质也每况愈下。”²抗战爆发后，中国士兵伤亡惨重，又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兵源缺口很大，于是出现了强迫农民子弟当兵参军的现象。这是现实。

不仅士兵素质差，装备更差。黄仁宇还指出：“我们一个师通常只有六千人左右，并且行军时埋锅造饭煮水挑柴全系农村习惯。日军的一个师团经常有一万二千人至一万四千人，配备特种兵后可能多至二万人。双方火力尤其无可比拟。最近我才看到湖口、马当要塞失陷的纪录。当时过早失陷，据说咎由支援的步兵。

1 《清风见兰》p148。

2 中华书局2015年版黄仁宇著《我相信中国的前途》，p200。

可是事前检阅该部队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机轮迫炮全系废铁，步轮堪用者不及半数’”。¹国民党军队从兵员素质、装备乃至指挥系统，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宋美龄是位理想主义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毕竟有限。

当天晚上吃饭时，蒋介石关切地问宋美龄，伤兵们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棉衣穿？

宋美龄很不客气地说了路上所见壮丁们被捆绑的事，还说，“今天我们去慰问的伤兵是有棉衣穿的，不知道明天这些棉衣又要给谁穿！”宋美龄对国民党部队中欺上瞒下、漠不关心士兵的做法感到气愤。²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回答很不满意，但因为郭秀仪、张素我在场，他的高位和威严不便将自己夫妻间的不睦，让外人窥见，就不再多说什么，板着脸，不说话。

敏感的郭秀仪如坐针毡，左右为难，只能屏声息气。她感觉自己夹在领袖夫妻之间实在尴尬，连吃饭也拘谨，事后就悄悄请宋美龄副官转告，说自己以后去与其他人一起吃饭，不再打扰蒋夫人。宋美龄听后，笑说，“这个小囡妮还羞答答呢”，就随她去了。“小囡妮”是上海方言，是指小姑娘的意思。

宋美龄为此发起了为抗日战士筹募棉衣运动。“妇慰会”总会拨用捐款购买衣料，派妇女服务队队员集体赶制棉背心1万件。宋美龄考虑到湖南是中国的产棉大省，于是动员湖南妇女就地取材，为士兵们缝制40万件棉大衣和40万双鞋子，以供应湖南、江西等地的军队之需。其他省份士兵们的棉衣和棉鞋，均由“妇慰会”总会提供原料，由各省妇女协会负责去组织缝制，这些努力，使得前线部队缺衣少穿的问题，得到了某些缓解。宋美龄鼓励和鞭策她的同事说：“如果不把我们二万万多妇女动员起来，是我

1 中华书局2015年版黄仁宇著《我相信中国的前途》，p200。

2 《流金岁月》，p148。



1939年10月28日，宋美龄（前排右）带领郭秀仪（左）、张素我（中）在劳军的途中。中央社摄于衡阳码头。

们少数知识妇女的耻辱，我们应该做的事太多了！”¹

283

宋美龄去战地医院慰劳伤兵，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宋美龄来到战地医院的时候，总是身穿天兰色的医护服，挽起发髻，紧束衣袖口，显得十分干练。她来到病房，不需要人们介绍她是谁？所有人都会起立向她致敬，即使躺着不能起

¹ 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宋美龄大传》，p375。

身的伤兵，也会远远地在枕头上向她敬礼。她总是微笑着，向伤兵们点头、挥手，以此作为答礼。她轻轻走过每一张病床，在战士的枕边放下类似一块毛巾、一个罐头和一包糖果。有时，她也会坐在床边，与伤兵攀谈，询问伤情，聊聊家常。她还会亲自动手，替伤兵换药，用碘酒擦拭伤口，重新包扎。根据资料记载，宋美龄慰问伤兵时，亲自去替伤兵换药包扎伤口的人数，一般总在六七人之间。

“妇慰会”总会决定，赠给湖南各医院的抗战伤兵，每人法币2元，肥皂一块，牙刷一把，红烧肉一碗。宋美龄来到医院，亲自跑去食堂，要亲口尝一尝红烧肉的滋味，可谓对伤兵的关怀体贴入微。

跟随宋美龄前往慰问的其他名媛们，大体上亦如此。她们也都身穿天兰色的医护服，肩上背着救护袋，脸上带着春风一般的微笑，去为伤兵们换药、唱歌、谈心，有时还要为伤兵们代写家书。因为许多战士没有读过书，不会写字。

郭秀仪来到伤兵床前，总是微笑着为战士们分发慰问品。她拉着战士们的手，和他们聊起家常。他们在一起讲述各自兄弟姐妹们的往事，鼓励伤兵们战胜伤痛。

这一次在衡阳，郭秀仪陪同蒋夫人宋美龄去劳军的时间总共一周。这些天里，她们朝夕同行，相处得十分默契而愉快。

1938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桂林设置行营，统筹南方抗日事宜。此后，宋美龄经常带领郭秀仪等人去慰劳伤兵。

郭秀仪在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说：“前些天，在深夜三点，蒋夫人在重庆作了一次向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讲，完了之后，等到天才发亮，即便踏上了万里的征途，到了桂林，随即偕我和几个女友携同大批慰问品，亲赴湘桂各伤兵医院慰劳。”¹“在整整五天的时间，沿途冒着征途的颠簸，日机的空袭，历了不少辛劳与危险，乘火车、汽车、轿子，每天从早上七时至晚八时，全

¹ 1940年1月14日《星岛日报》。



1939年10月28日，宋美龄带领郭秀仪等前往慰劳抗战军人的途中。

没有休息的时间，面包和干粮，多在路途中进食，蒋夫人和各位女友都甘之如饴，蒋夫人并且还像慈母般时来照顾我们。”“我随蒋夫人工作很多次，这次使我益发兴奋，现在我们总司令部奉令组织战地工作队，我很希望而欢迎那热心救亡工作的女同胞和我一路（同）参加工作，使我们妇女们都得尽了救国的天职。”“我觉得蒋委员长领导着我们全国的同胞作抗战建国的工作，我们的女同胞却占了全民的半数，也应该感动，随蒋夫人的领导，各尽自己的天职、能力，以参加这艰巨的任务才是。只要我们有机会，不，全要我们自己去找寻机会，随时随地都要去参加这种工作，

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工作的大好机会了。”郭秀仪在口述中把蒋夫人宋美龄描述成“慈母”，这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当时国统区人民就是以这种眼光看待宋美龄的。

以上这篇专访郭秀仪的文章，发表时间为1940年1月14日，此时黄琪翔已离开军训部次长的岗位、前往第五战区工作了。

郭秀仪在全国妇女界抗战救国的运动之中，声名鹊起。这篇文章是这样评价郭秀仪的：“黄夫人自当抗战以来，在沪、汉、桂各地，均曾领导各地妇女努力救亡工作，如在汉口时曾亲自主持某号献金台，得款最多，又如募集征衣，救护伤兵，抢救及保育难儿等等运动，莫不卓著成绩。蒋夫人对之，极为重视，此次蒋委员长令各个集团军分别组织战地工作队，即以黄夫人为某集团军之工作队队长，黄夫人行将随同黄总司令赴前线组织工作队开始工作。为国事而现身战地矣。”¹

郭秀仪与李汉魂将军（1894—1987）的妻子吴菊芳相识也是在1938年的桂林。按照吴菊芳老家广东曲江地区的习俗，郭秀仪与吴菊芳俩人互称大嫂。

早在1938年的冬天，吴菊芳要从广东曲江去重庆，需要到桂林转飞机，于是在中途等待转机时，她就住在丈夫李汉魂的老战友黄琪翔家里。

吴菊芳曾任广东省“新文化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的主要负责人，深受宋美龄的器重。宋美龄多次致信吴菊芳，称赞她“为国尽筹，抢救被难妇孺，慰劳抗战将士……艰苦英勇之牺牲精神”。²

郭秀仪与吴菊芳一见如故，总有说不完的话。吴菊芳回忆说：“到了桂林，我就住在她家。有一次我们围炉长谈。黄琪翔去办公，我们还继续说话。等黄琪翔晚上回来，我们还坐在那里没有说完。谈得高兴，索性把机票退了。就这样，一聊就聊了十几个钟头。

1 1940年1月14日《星岛日报》。

2 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宋美龄大传》，p398。

广东人煲粥聊天，可以煲出好几锅（比喻聊天的时间很长）。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她和宋美龄、李德全等一起做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我则搞广东教养院。大家都忙于救济抗日难童的事业。有时蒋夫人在重庆召开会议，我们才有机会见面。”¹

在风景如画的桂林，黄琪翔是屈指可数的军界高官，可是他从来不摆什么官架子，待人接物，平易近人，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就在此际开始与他建立了深厚友谊。

黄药眠回忆说：“1938年，黄琪翔被调到白崇禧下面做军训部次长，而我则在桂林同范长江等同志搞国际新闻社。为了多发展一些社会关系，托异母兄黄枯桐介绍我同黄琪翔认识了。黄在桂林期间，我平均每一两个月总要到他家去闲聊一次，这时我对他的印象是：他为人平易，没有什么官僚架子，也没有一般武人的粗鲁表现。他由住地到桂林城买东西，要走几里路，都是自己步行前去。他的生活方式是西化的，但他的为人则带有我们梅县人的耿介的性格，说话直率，不像在国民党上层官场中混了许久的人物。大概过了一年左右，他没有通知我就离开桂林，到第五战区去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了。后来知道他在宜枣战役中还算打得比较出色。”²

1943年春天，母亲刘桂五十分思念儿子黄琪翔，想来探望。但是，广东梅县到广西桂林千里之遥，远隔重山峻岭，需要经过粤北的韶关、湖南的衡阳等地，即使在和平时期，坐汽车也需要一周时间。黄琪翔夫妇自然放心不下。恰好此时，黄琪翔的表弟刘凌云高中毕业，考进了重庆大学，去学校报到也要路经桂林，于是在黄琪翔的表弟刘凌云陪同下，母亲刘桂五乘坐的汽车，白天躲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晚上行驶，花费了两周时间，吃尽苦头，终于抵达桂林。

郭秀仪生性善良，喜爱动物，在桂林时期，她养了两条名犬。

1 《流金岁月》，p195。李吴菊芳文章《关于郭秀仪的两三事》。

2 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1981年第三期，黄药眠文章《我知道黄琪翔同志的二三事》。



黄琪翔的母亲刘桂五与郭秀仪在桂林合影。照片前面的大犬就是金毛猎犬。

表弟刘凌云说：“翔表嫂和家人都喜爱宠物，那时家中养有两只名犬，一大一小。小的是灰白色贵宾犬，名叫多莉，活泼讨喜；大的是金黄色毛儿猎犬，却傻的可爱，家人都叫它傻大姐，有时候会耍性子不听话，做错事时家人略施惩罚，但不得鞭打。有次抱它上厨房屋顶，因狗有惧高症，它怕得直哆嗦，瞪着大眼左右环顾，最后盯上我，希望我去搭救解围。”

母亲刘桂五后来又到桂林，黄琪翔此时已经在云南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他利用战前休假，曾专程坐飞机赶来桂林，与母亲作了短暂的相聚，随后便携妻子去了云南前线。此后，他

们再没回过桂林，那两只名犬便滞留在桂林，再也没能见到它们的主人，最后也不知所终。

七、枣宜会战前夕

1939年秋，陈诚出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驻军在湖南邵阳，准备参加长沙保卫战。国民政府军委会新组建第二十六集团军，下辖李默庵第一军和第四军，调任黄琪翔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驻地也在湖南邵阳。

1939年12月1日，黄琪翔在桂林给蒋介石发报，报告自己已将“桂林（工作）交接完毕”。¹黄琪翔兴冲冲赶到邵阳，为迎击敌人进攻长沙作战前准备。然而，就在黄琪翔到任后不久，他又接到了新任命，将他从第九战区调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任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接到新调令后，黄琪翔立即率领自己的班底，离开了邵阳。他们“由湖南邵阳启程，乘汽车经贵阳到重庆，改乘船只沿长江东下，到湖北沙市登岸，又乘汽车北上襄樊。这就是总部的驻在地。（第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扎在襄樊的西郊一个村庄。”²

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广西的莫树杰第八十四军和刘和鼎的三十九军。他的部队并没有满额。莫树杰（1898—1985）的第八十四军，下辖三个师，即钟毅的173师，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106-288。

2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廖沫沙《同黄琪翔先生在前线的时候》，p13。

张光玮的174师，凌压西的第189师。刘和鼎（1894—1969）的第三十九军，是个公认的杂牌军，而且只有一个师，即厉鼎璋的第56师。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整个加起来，就是这四个战斗师。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1892—1985）此时请假，于是李宗仁令黄琪翔代管第二十二集团军，而第二十二集团军下辖的是川军，即孙震兼军长的第四十一军和陈鼎勋第四十五军。

黄琪翔到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时在1939年的冬天。¹第十一集团军副司令是刘和鼎，参谋长是唐星（1892—1964），陈卓凡是特派员，周范文为秘书主任，黄琪翔的秘书是朱洁夫。那时，我军参加反扫荡的冬季攻势已经到了尾声，部队随后进入整休阶段。

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就在湖北襄樊。此前，第五战区长官部就驻扎在这里。在黄琪翔到来之前，第五战区长官部已迁至老河口。

襄樊城，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汉江中游的平原腹地。汉水穿城而过，分出南北两岸的襄阳、樊城，隔江相望。历史上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隆中，距襄阳城西约20里，相传就是诸葛亮在公元197至207年躬耕隐居十年的地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隆中的描述是，“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鹤相亲，松篁交翠。”刘备在此曾经“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诞生了历史名篇《隆中对》。因此，这儿也被世人称为智者的摇篮，三分天下的策源地。

此处的随县、枣阳一带，是华中的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称为“随枣走廊”。随县的东面是大别山、桐柏山，西靠大洪山，直抵汉水。枣阳南邻随县，东联南阳盆地，西接汉水，北邻襄阳。所以它前接武汉，后通襄宜，特别是两山夹川的地形，注定是军家必争之地。更要命的是，1938年6月至10月间，武汉会战结束，

¹ 据《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此书未见版权页，由其后人收藏。据廖沫沙回忆，此书稿由他带往桂林交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驻桂林办事处出版的，p2。黄琪翔对八十四军直属部队的训话中，说他自己是在1939年的冬天到任。

结果武汉沦陷。至此随县、枣阳一带已经成为御敌的最后防线。如果日军突破随县、枣阳一线，将直逼陪都重庆，后果不堪设想。而我军第五战区的部队，大多参加了武汉会战，从前线撤退到此，再行布防。

1939年至1940年间，这里爆发过两次重要的中日会战，即随枣会战和第二次随枣会战，其中，第二次随枣会战又称枣宜会战。在黄琪翔到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之前，1939年5月展开的随枣会战已经结束，而枣宜会战还没有开始。

随枣会战的爆发，源于日军企图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因此组织力量向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发动名为“扫荡”的进攻。1939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第四旅团等，向随县、枣阳地区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和江防守军进行防御，并实行反击。战至5月23日，第五战区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我军击毙敌军1.3万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但是，在随枣会战中，第八十四军发生了一件十分丢人的事件，即原第189师566旅旅长李宝琏和副官刘勉叛国投敌，让全军为此蒙羞。

黄琪翔到任不久，迎来了1940年的元旦。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¹（1892—1950）在田汉夫人安娥（1905—1976）的陪同下，来到第十一集团军采访，于是黄琪翔在樊城设宴招待她们，当时作陪的还有廖沫沙先生。廖沫沙（1907—1990）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少校秘书。

廖沫沙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少校秘书，属于借调，这里面有一段掌故。

廖沫沙在其《同黄琪翔先生在前线的时候》一文中回忆说：“我

¹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尘封70年的密函，证明史沫特莱应是苏联派到中国的间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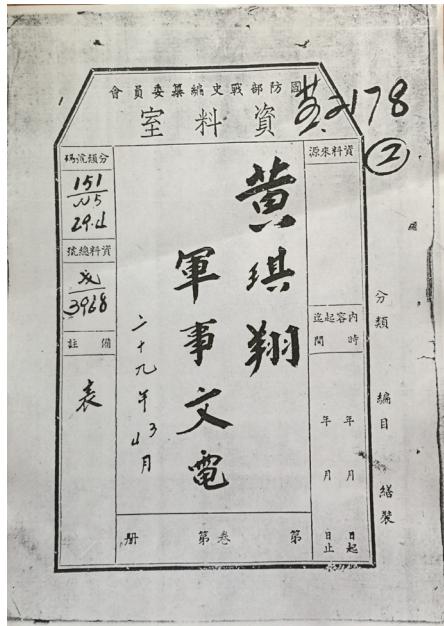
当时在广西桂林《救亡日报》社编发新闻稿兼写社论、时评。”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了欧洲战争。此时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名篇发表不久，廖沫沙便将自己平时研读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鲁登道夫《总体战》书中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再加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将它们结合起来，开始撰写时评。廖沫沙说：“我就运用这点知识来分析两大战场，估计其发展前途。”廖沫沙所说的两大战场，即欧洲战场和中国战场。

廖沫沙说：“这样几篇评论文章，竟然被黄琪翔将军看上了，他以为我是一个懂军事的记者。凑巧的是他当时正在筹组一个新的抗日集团军总司令部，收罗文武两方面的人才。他向他帐下的秘书朱洁夫打听到写这些军事评论的人是《救亡日报》的编辑，而且是个左派分子，他就委托周（范文）、朱（洁夫）两人，特意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拜访李克农同志，请他向《救亡日报》借调我跟他上前线去工作。这样，我就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中共）党组织调我到黄琪翔将军的新总部，任少校秘书。”实际上，廖沫沙在1930年就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廖沫沙就这样被借调到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工作。廖沫沙说：“就在1940年3、4月，黄（琪翔）总司令出巡他所统帅的前线部队，我是跟随他出巡的唯一文职秘书，这大概是他有意安排我上前线去观察一番。黄总司令的巡视，即到了军、师驻地，要视察前线阵地。他所到之处，都仔细观察。我记得他视察前线阵地时，每到一地，都用望远镜观察敌军动静。我因此也常得到身旁军官的照顾，把望远镜递给我，让我观察敌军阵地，看到敌军的往来活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身临前线，第一次用望远镜观察敌军。这期间正是两军停火对峙，所以我们能从容视察阵地。”¹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第五战区档案中，我们找到了

¹ 《黄琪翔传》，p10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五战区档案之“黄琪翔军事文电”。

月 14 日之“综合情报”、2 月 15 日之“敌情与判断”、2 月 16 日之“鄂中情报”、3 月 6 日“情报”、3 月 7 日“情报”……4 月 29 日之“情报”。

黄琪翔在 2 月 7 日的敌情报告中云：“据报，（一）随县附近各据点敌似已于冬日换防完毕，其指挥官换全佳大队长；（二）孙家岩、徐家店一带之敌，近互有调动；（三）东西坪附近，冬日有敌步骑兵七百余、炮四门，敌酋加藤；（四）近日敌赶筑淅河至龙王庙公路。随县正面之敌，似为（日军）第三师团第五旅团部。”

2 月 16 日，黄琪翔在其“鄂中情报”中称：“（一）兴隆店（余家店西南十余里）到步（兵）约八九百，骑（兵）二百余。传（说）系由应城开来，状极狼狈，现在该处赶筑工事，似为战后整理；（二）应山敌，自微日陆续增加，现有步兵三千余，骑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黄琪翔军事文电》档案一卷，共计 23 件。¹这些电文全部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电呈重庆军委会的军事文件，时间在 1940 年的 2、3、4 月间，即枣宜会战的前夕，其内容包括敌军情报、战斗部署和战况报告，可以让我们了解枣宜会战前夕真实的战地情况。

这些档案清楚地证明，黄琪翔非常重视对敌情的侦察和研判。卷宗中有 1940 年 2 月 7 日之“情报”、2

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五战区档案，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 4504、4505。密电的发件人为黄琪翔，收件人为军令部长徐貌，或蒋委员长。

兵五六百，野山、重炮十余门，战车（坦克）十八辆，飞机十八架，有向我二次进犯说。”

4月16日，黄琪翔在“综合情报”中说：“（一）半月来，正面敌军运输频繁，其行动似较前积极；（二）计，随县敌约一千一百余，炮四门。伪一官马神田浙河原驻川吴田丰部，六百余。真日敌步（兵）约二千，骑（兵）三百余，炮五六门，由马坪开至分驻老官庙、天王堂一带，野战仓库在王氏庙及其附近。马坪现敌千余，元日有战车（坦克）数十辆，自应山向马坪移动。安陆原驻宇岛大津部未动支微等日、由汉经花园陆续开来敌步（兵）五六千，系市吉联队及原田指挥官所兼联队等部，分驻各地后，安陆仍有敌三四，闻属山协师团长指挥应山。连日由花园经广水增来敌二千余。应山现有敌四五千。郝家店四百余，拉夫筑路甚忙。各敌对我方道路情形查询甚详。应（山）北杨家冲娘娘庙附近，敌曾向我阵地扰乱射击。花园现有敌约二千，陈家店敌六百余，广水市仍有千四百余，佳日抽调附近各处敌约三千。（三）分增各处敌多由湘开来……”

由上述的情报分析，早在2月16日前后，也就是随枣会战结束不久，日军就开始为枣宜会战做准备。且在第十一集团军与日军对阵期间，零星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

2月11日，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下属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与敌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黄琪翔向重庆转呈了是役的战况，云：“（1）由跛子、夏家河方面来犯之敌各二百余，我两处守兵各一连，与敌激战。至晚，反复争夺三四次。我受伤官长七员，士兵卅三，阵亡士兵八十。敌亦伤亡百五十余。卒因我伤亡过重，遂转移自由山斗家坡一带与敌保持接触；（2）三四师（附五八师三三五团）方面。微夜，（敌）鱼炮攻，先后由马坪渡河，联合兵种之敌千余。其一部进犯同心寨，经我守兵击退，毙敌廿余。我伤亡士兵八名，其主力在马坪袁家、孔家、油山等处之敌，以集中火力掩护之下，向我三三团在岗上及兹粑一带负责监视任务之第一营猛烈进犯。该营与敌血战一昼夜，肉搏十余次，计伤亡营长以下官长十员，

兵百三十八人。敌亦伤亡二百余。复用优越炮火继续猛犯，复由三四师一九团二营增援反攻，击毁给养车十余辆，毙敌四十余。我伤亡士兵廿一名。敌一部窜独山，其大部及给养被我阻击。刻在桃家湾与我对战中。”¹

1940年3月，枣宜会战的形势趋于明朗。黄琪翔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来检阅、视察他的部队，并与部队驻地的当地政府建立联系，进行战前的动员和准备。

3月1日，黄琪翔或应严重先生（1892—1944）之邀，来到枣阳县县城，发表《对枣阳县政人员及保甲长训话》。严重先生，字立三，是黄琪翔北伐时期的老战友，时任湖北民政厅厅长，因湖北省主席陈诚离鄂，由严重代理省主席。黄琪翔在讲话中，引述蒋介石的原话，讲明了抗日战争的意义。他说：“蒋委员长告诫我们，他说这次抗战‘是上为祖宗保光荣，下为后代创造幸福。现在我们这一代的同胞，如果畏难苟安，妄想侥幸求免，那么我们偷安一日，就会招致民族万年的羞辱，陷我们世代子孙于奴隶牛马无穷的痛苦。’他并且说明‘我全国的军民，要自救，要救我们的子孙，要保全我们的民族，就得把握住这重要的时机，再不能有一刻的因循，贻百世无穷的悔恨。’”²他在讲话中还特意提请当地民众要讲卫生，先从洗脸开始。他说：“我看见城（枣阳县县城）里的人虽然有把面孔洗干净的，但乡下人就简直没有几个是洗脸的，这样的不清洁、这样的不知道卫生，人的力量再也生长不起来，中国人再多也不见得会有什么了不得。所以我要求各位回去后，要实行一种清洁运动。因为这不只是关系个人的卫生，并且影响整个民族的健康教育。外国人说中国人都有眼病，或多或少都患有沙眼，我一向是不相信的，但是我今天从乡下直到城里，看见路边的小孩，每一个都害着眼病，看见这种情形，真使人要落泪。其次乡下无论是住的地方，（还是）厨房、厕所，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五战区档案，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4504。

2 《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p90。

没有一处是讲究清洁的，没有一处不混乱肮脏。”¹ 他对当地民众的关切和疼爱，可以从这点点滴滴中见得。

3月14日，黄琪翔前往莫树杰任军长的第八十四军，检阅军直属部队，向官佐发表了《负责重于服从，训练重于作战》讲话；

3月15日，黄琪翔视察第八十四军的第173师，师长是钟毅将军。他向官佐发表《认识敌情，发扬旺盛的企图心》的讲话；

3月17日，黄琪翔视察第174师，师长是张光玮将军。他向官佐发表《正确地知己知彼》的训话；

3月20日，黄琪翔视察四十五军的“长期破坏队”，发表《长期破坏队的任务》的训话；

3月21日，黄琪翔检阅陈鼎勋任军长的四十五军第125师；

3月22日，黄琪翔检阅四十五军第123师，对官兵发表了《不要自满，不要疏忽》的训话；

3月25日，黄琪翔检阅刘和鼎为军长的第三十九军，对官佐发表《整训期中的重点教育》训话。

黄琪翔亲自下部队讲话，不厌其烦地宣讲爱国主义精神和军人责任的同时，几乎每次都要从实战的角度，冷静而客观地谈到敌军的优缺点，并与我军作对等的军事比较。因为他是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大都谈的是纯军事问题，是军事技术。有时，他对本国军队的批评，相等尖锐，让人脸红，却说的又是事实。

黄琪翔说：“虽然敌人在政治上战略上犯了种种错误，是它的最大弱点，但我们还须估计到它的长处。从纯军事的见地上，敌人迄今仍保有它的某些优越的条件，简言之，敌人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敌人的训练比我们精良；敌人的战斗技能比我们优胜，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² “我们和敌人打仗已经三年了，但是我们考察起来，不如敌人的地方，断不止装备一项。我们瞄准射击不如敌人；攻击不如敌人；构筑工事不如敌人……一切战斗

1 《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p98。

2 《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p2。

技术不如敌人，甚至连体力都不如敌人。我们常听人说，远距离的战斗，因为敌人有强烈的火炮，我们赶不上敌人，但是近战的时候，敌人都不如我们……实际上并不是这回事：无论是投掷手榴弹也好，刺枪（拼刺刀）也好，我们同样抵不过敌人。我们往往三个人杀不死一个敌人，六个人也杀不了一个敌人。在某些战役中两方面的部队人数和伤亡数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为什么我们的部队会这样不如人呢？一句话：是我们的训练不如人。”¹

谈到射击的问题，黄琪翔说：“射击……的第一个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战斗力，射击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收到这种手段应有的效果。我们稍一计算，从抗战到现在，假使一支枪只发射三百颗子弹，事实上并不止这个数目——那么我们全国两百多万军队发射了六万万颗子弹；一颗子弹打中一个敌人，我们就应当打死或打伤六万万个敌人了……现在敌人伤亡的实数不过才一百四五十万人，就是说，我们的射击连四百分之一的效果都没有！”

针对我军在战场上出现的问题，黄琪翔对症下药，对他的士兵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无目标不射击，就是看不见敌人的时候决不发射。二、不在有效射程以内、（不）经过精确地瞄准后不射击。就是眼睛虽然看得见的人，但是估计枪弹射击不能达到、或达到而没有命中可能的时候，不射击。大家都知道，步枪的射程是两千米突，但是……有限射程只有六百到一千米突的距离，就是说，只有敌人到了距我们六百或一千米突的地方。我们瞄准开枪才能打到他。三、夜间射击，更要特别注意。我们为了避免敌人的重火器和飞机轰炸，所以时常采取夜袭，就是所谓摸营……我们在夜间射击，不论是袭击敌人也好，防御敌人也好，不到最近的距离，不到有把握的命中点，我们绝对不要射击。”²

特别有创建的是，黄琪翔还谈到了他的“磁铁战术”。这一

1 《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p9。

2 《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p12。

战术，是建立在与敌人展开持久战和消耗战为前提的，我军就像是磁铁一样紧紧贴着敌军，让敌人打不着、甩不掉，一旦出现机会，就狠狠给他致命一刀。他说：“因为敌人与我们相持愈久，就愈暴露出它的弱点……伴随它（敌人）的内外在诸矛盾的发展，而愈深化。我们能善于利用它的弱点，寻找它的短处，来发挥我们一些优越的条件。”“以磁铁战术吸引它的‘泥脚’，把握住转败为胜的契机。”¹

黄琪翔视察部队的时候，少校秘书廖沫沙随侍左右，将他的讲话全文记录下来，然后由黄琪翔本人亲自整理，收入行囊。

黄琪翔夫人郭秀仪也随军到了湖北襄樊，担任第十一集团军妇女工作队队长。在各集团军中建立妇女工作队，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因此妇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也由上一级机关任命。妇女工作队的工作，主要是组织随军家属和当地社会上的妇女，成立文工团和救护队，进行犒军活动。军队要开拔去前线，郭秀仪就带领工作队的妇女们站在道路的两边，欢送并鼓励战士们精忠报国，奋勇杀敌。

襄樊医院也是妇女工作队重点服务的单位，郭秀仪带领她们经常去医院与伤兵唠家常，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抚慰。许多军官的家属是知识女性，义务帮助那些没有文化的伤兵们代写家书，因此她们很受伤兵们的欢迎。

妇女工作队还在襄樊开设了一个医务所，专门救助那些烈士遗孤和社会难民，给他们治病送药，还给他们送吃的。这些费用，也都由郭秀仪自己去募集而来。²

黄琪翔外出视察，有时他的司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郭秀仪。那时日军还没有发动全线进攻。郭秀仪后来回忆说，“我只要有时间，就陪着黄琪翔出去，我当司机。黄琪翔坐在副驾驶

1 《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p1。

2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180。郭秀仪文章《爱国团结，振兴中华》。郭秀仪说：“我们妇女工作队还在第十一集团军驻地襄樊设立了一个医务所，为伤员和当地群众赠医施药，所需费用均由我募捐筹集。”

座上，参谋长唐星和警卫们坐在后座上。”所以大家都很敬佩她，特别是当地的妇女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欣赏她，在背后神秘地说：“这个总司令的太太可不得了。一个女人家不仅会开车，会打枪，还会说外国话！”

有一次，黄琪翔看到郭秀仪藏在随身小包里的那支勃朗宁手枪，就是在意大利购买的那支灵巧手枪，问：“你带着它干吗？”

那时，枣宜会战还没有打响，作为战区副总司令和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身边不缺警卫和勤务人员，所以他以为妻子没必要随身携带武器。

郭秀仪说：“如果遇到意外，我可以用它来帮助自己解脱。”郭秀仪所说的解脱，意思就是拒绝被俘，就是自戕，以身殉国。在民国，丈夫给妻子赠手枪是一种时尚之举。当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时候，孙中山赠送妻子手枪时还附带 20 发子弹，并说：“19 发给敌人，一发留给自己。”

黄琪翔一脸沉默，没有答话。

枣宜会战爆发前的一个月，即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汪伪傀儡政权，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和平建国十大政纲》。4 月 2 日，第五战区在老河口长官部召开军以上高级将领会议，李宗仁率黄琪翔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声明，痛斥：“汪精卫媚敌祸国，罪恶贯盈，”“不承认汪伪组织对外一切活动”，并决心“外锄狂寇，内剪巨奸”！¹黄琪翔自 1927 年发生所谓“张黄事变”之后，就已经与汪精卫集团彻底决裂，如今在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后，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汪精卫的汉奸路线，宣誓与之不共戴天。

事实上，在日军入侵之后，一些身在沦陷区里所谓的名人，就已经堕落为汉奸，甚至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直接操纵下，于 1938 年 3 月 28 日，在南京还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定北洋政府时期的《卿云歌》为伪国歌。

¹ 台湾“国史馆”存“外交部”档案，编号 020-010114-0008，卷名《不承认汪伪组织对于外一切活动案》。

随着日军的猛烈进攻，一些拥兵自重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为保存自己的实力，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叛国投敌，却开始私下与日本人勾勾搭搭，甚至连“山西王”阎锡山亦如此，曾在克难坡与日军中将谈和，还合影为证。白崇禧说：“阎锡山就差一点投降日本人了！”日军为了迫使阎锡山尽快投降，将他与日军中将合影的照片空投西安，这件事才为世人所知。“阎对中央说：‘我和日本人谈和，先打共产党，后打日本人。’蒋（介石）先生派人去对他说：‘你不能投降，如果你投降了，我先打你，后打日本人，再打共产党。’阎受了威胁，不得不迟疑一下，还好不久珍珠港事变爆发，抗战前途有了转机，阎便不与日本人谈和平了。”¹

黄琪翔则爱憎分明地公开发表文章，说：“敌人目前对我运用政治战的唯一策略，是利用汪派汉奸的活动，企图使南北傀儡合班，建立一个统一的伪组织，以淆惑国际的视听。一面更以汪逆伪造三民主义，伪造国民党的鬼魅伎俩，便於招降纳叛，制造摩擦，分裂团结，达其‘不战而屈’政略。我们抗战当中，不但要对敌人诱骗分化的阴谋，应加以特别的警惕。同时还要集中火力打击汪派汉奸，拥护领袖的国策，彻底肃清汪派腐蚀所奸遣的一切毒素，以保证民族解放战争顺利和发展。”²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军民拥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投降，真心抗战，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1940年4月13日，国民政府宣布命令：黄琪翔叙阶陆军中将。³

远在1927年，黄琪翔就已经升任第四军军长，还代理过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早就是陆军中将军衔，怎么过了13年后的1940年，他还要叙阶陆军中将呢？

301

这是因为国民革命军在1935年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按照新规定，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有严格的区分。职务军衔是临时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530。

2 黄琪翔文章《集中火力打击汪派汉奸》。

3 1940年4月24日《申报》第二版。

性的，而正式军衔必须由中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根据其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评判后，再行铨叙厅正式叙任，并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程序严肃。

黄琪翔在 1927 年因“张黄事变”、1933 年又参加反蒋的福建事变，两次失败后均远走德国，实际上他已离开了国民党军队，直到 1936 年底他才返国参加抗战，算是真正归队。他虽然曾在淞沪会战中任第八集团军代总司令，还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军训部次长，军衔都是中将，但一直没有正式铨叙中将军衔，所以到 1940 年 4 月 13 日，黄琪翔才被正式铨叙为陆军中将军衔。

八、枣宜会战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爆发。

前文已简介了第一次随枣会战，时间是1939年5月间。那时黄琪翔还在军训部次长任上，他没有参战。这里所说的是第二次随枣会战，史称枣宜会战，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正面战场所发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战斗区域与第一次随枣会战是同一地区，时隔正好一年。随县在第一次随枣会战中的1939年5月7日被日军占领，一直是沦陷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被光复。

在枣宜会战中，日军进攻部队由1939年9月成立的所谓“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兼第十三军司令官西尾寿造（1881—1960）上将为总指挥，原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1885—1948）为总参谋长，先后集合六、七个师团的精锐兵力，其战略目的是企图赢得枣宜会战后，威逼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重庆，进迫国民政府和谈。负责枣宜会战的日军已更换指挥官，由日本陆军中将园部和一郎接替了冈村宁次，日军参战兵力48个大队，近11万人。¹

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我方的部署，大致是：

¹ 另据刘永国著《随枣会战》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版，p145。载：“这时的日军第11军辖7个师团、3个旅团，还有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队，如狼似虎20万众。”

(一) 以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守襄花公路正面；
(二) 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 以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西岸；(四)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¹

李宗仁的介绍较为简略，实际上枣宜会战的中方军队部署分为左、中、右三个主要战线，其迎敌的部队主要是：

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率领的第八十四军、第三十九军等部队；

左翼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统帅的第三十军、第六十八军等部队；

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统帅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五军、第七十七军。他们被布置在随枣、当阳、荆门一带。右翼集团军至中央集团军的战线全长约 120 公里，背靠桐柏、大洪两大山脉。长江南岸及宜昌，归属第六战区指挥，由郭忏将军率领江防军防守。²此外，机动兵团总司令为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下辖张轸第十三军、王仲廉第八十五军。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请假），下辖第四十一军（孙震兼军长）、陈鼎勋第四十五军。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下辖李仙洲第九十二军（李仙洲兼军长）。

以上就是枣宜会战中我方参战的所有部队。黄琪翔不仅担任第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而且还身兼第二十二集团军的代总司令。

《黄琪翔军事文电》档案中保存一份原始电文，是黄琪翔报告蒋介石之我军部署情况：“委座（江申令一亨）电，奉悉。遵即部署（1）右翼军仍旧；（2）中央军着改为左翼军（附第一游击队曹文彬部）除原守备地外，并接替由万家店经玉皇顶、九里山线新防地。右（翼军）与左（翼军）集团切取连（联）系；（3）预备军暂在现地候命；（4）两翼军作战地境仍旧；（5）莫、

¹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0 年），p145。李宗仁文章《欧战爆发后之枣宜战役》。

² 《黄琪翔传》p108。



1940年4月15日，第五战区主要将领在老河口长官部合影。将领们在此参加枣宜会战的军事会议。左起：吴仲直、高永年、刘汝明、王鸿韶、郭忏、汤恩伯、孙连仲、李宗仁、张自忠、黄琪翔、韦永成。

李两军交移防地务确按换防守则行之。”¹

黄琪翔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其核心任务是在高城至随县以西，阻击日军的正面进攻。李宗仁只提到“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事实上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下辖的还有一个军，即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李宗仁称赞桂系部队是“精锐”，值得品味，疑是李宗仁自美之词。因为莫树杰将军（1898—1985）的第八十四军是桂系部队，也是李宗仁的老部队。莫树杰将军此时也是刚到任，率领第八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随枣会战的老军长是覃连芳将军。覃连芳被撤职，主要原因是由属下第189师566旅旅长李宝琏和副官刘勉叛国投敌，他作为长官被追责。

实在不敢恭维桂系军队，因为它口碑历来很差。这些部队大都由杂牌军拼凑而来，平时在地方上耀武扬威，实际上他们的部队不仅装备很差，且纪律涣散，惯于营私舞弊，盗卖军粮走私鸦片，

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五战区档案，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4504。系黄琪翔于1940年3月8日呈报蒋介石的原始电文，证明蒋介石直接参与指挥枣宜会战。

大饱私囊。连他们自己的老首长、桂系第二号人物白崇禧都斥之为“两枝变为四枝枪”。¹桂系军人喜欢说大话，战斗前信誓旦旦，一接火就跑，声誉可谓狼狈。陈诚曾在总结第五战区大别山失败的原因时说：桂系“干部个个（班长以上）有钱，班长以上均有临时家庭，该部军长张义纯并有‘只要敌人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之语，今已验矣——桂系万恶、万恶。”²白崇禧所说的“两枝变为四枝枪”，即指他们装备一支枪，裤裆里带着一支枪（生殖器），抽大烟的烟枪，还要为他们的妓女再准备一支烟枪。

但在枣宜会战中，这些战斗能力较差的桂系军队，确实尽到了自己的所能，打得顽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盾牌，奋勇冲锋。黄琪翔部下辖的桂军，在整个战役结束时伤亡惨重，殉国者无数。

此前，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采用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迅速占领了波兰。日军受到启示，也采取地空一体化的作战新模式，即步兵、骑兵、炮兵、空军和坦克的联合进攻。日军进攻有一套程序，先是侦察兵升起高空气球，进行空中侦察，然后骑兵开始地面侦察，来确定我方的火力位置。他们地面进攻开始时，先行强大炮火及空中飞机摧毁我方战壕和炮兵阵地，炮火延伸后，日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才冲入我军阵地。

我方没有坦克，也没有反坦克武器，只能在阵地上构建陡坡，当敌军坦克冲上人工陡坡时，战士们便冒着枪林弹雨跃出掩体，用手榴弹予以摧毁，所以牺牲极大。

黄琪翔部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将军回忆说：“（5月1日）战斗一开始，在敌机械化部队不断冲击和敌机轮番轰炸的恶战中，伤亡惨重，几次发生了动摇。我严令全军，非有命令，即使到最后一人，也不能擅自撤离阵地，违者军法从事。他们坚持在阵地上与敌搏斗了两昼夜，曾一度击溃敌人的进攻。有的

¹ 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7月印行，《陈诚先生日记》（一），p399。

² 《陈诚先生日记》（一），p411。



1940年以来，日军数次进攻我鄂北鄂西，与中国军队展开对攻，枣阳成为战事的中心。这是中国军队正在反攻枣阳城。此图选自1948年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的《二次大战照片精华》。

士兵见到敌军坦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气愤不过，便跳出战壕，爬上敌坦克，往车里投掷手榴弹。当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到我战壕边，我们无法用火力制止，或因弹药用尽时，便在阵地上同敌人进行白刃战，虽伤亡很大，仍不退后一步。战斗进行到第三天（5月4日），敌人由于经过两天的猛烈攻击，未能突破我阵地，便改变了攻击路线与攻击目标，专从山地向我大竹山、滚山两重要据点进行地空联合猛袭，战壕全被夷平，防守大竹山的一个营伤亡过半，守滚山的一个营伤亡殆尽，终以劣势装备无法阻挡，被迫于当晚撤入第二线阵地（净明铺至厉山一带）。”¹

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向正面战线发起攻势，利用炮火摧毁了前线守军的战壕，日军借助坦克的威猛，随即突破了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正面防御阵地。黄琪翔命令奋起反击，堵住了

¹ 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0年）p151。莫树杰文章《枣宜会战纪实》。

缺口。

5月5日，第五战区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开始游击作战，侧击京钟、襄花两路日军；左集团军孙连仲指挥第1游击纵队，向西南侧击襄花路日军；右集团军张自忠部仍以一部固守襄河西岸，主力在襄河以东地区，与中央集团军协同围歼由钟祥北上的日军；黄琪翔的中央集团军在原阵地上阻击、迟滞日军的西进。随后，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的刘和鼎第三十九军被迫向西南方转移，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往西北转移，去全力防守枣阳。

5月6日，黄琪翔中央集团军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在枣阳城郊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宣布防守枣阳的作战命令，末了还宣布：仗打好了，每个士兵“嘉奖一枚袁大头！”¹

5月7日，日军变阵，留下一部对黄琪翔的正面部队作为佯攻，吸引我军主力，而日军主力开始两翼包抄，猛攻由许绍宗代总司令的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不支，败下阵来，退入大洪山核心。日军第三师团趁机占领唐河，日军第十三师团北进至王集、第三十九师团进抵随阳店，对枣阳的莫树杰第八十四军构成合围之势。李宗仁急忙下令黄琪翔部撤退。李宗仁说：“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沟，拟与北部会师。我即令黄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围。”²黄琪翔观察到各路日军之间空隙较大，便率领守军逐次抵抗后，在日军包围圈尚未合拢时，成功向外线突围。

黄琪翔奉命撤出枣阳时，独自走到自己办公室的黑板前，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此语出自岳飞，表达他收复国土的一片赤诚之心，悲愤之情。

5月8日，日军占领枣阳，宣称汉水左（东）岸作战之目的已经完成。其实，他们并未实现捕捉第五战区主力加以消灭的企图。而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已经在四周集中了23个师兵力，于是他动员将士们振作精神，克服疲劳，准备趁敌疲惫之机，与

1 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版刘永国著《随枣会战》，p110。

2 《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0年），p146。李宗仁文章《欧战爆发后之枣宜战役》。

日军强行决战。

黄琪翔率部后撤时，曾命令莫树杰第八十四军钟毅将军的第173师负责殿后，其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由于战斗激烈，撤退不及，第173师遭到日军的猛烈围攻。5月8日，该师师长钟毅将军右胸饮弹后身负重伤，坚持战斗，最后举枪自尽，全师将士也大部战死殉国。这些忠烈殉国的将士，全系桂系部队。第十一集团军也因此受到重创。

白崇禧说：“173师奉命掩护全军退却，于唐河苍台镇遭敌几万（人）包围，因众寡悬殊，所部伤亡殆尽，钟师长见无法突出重围，遂于29年（1940年）5月9日下午3时举枪自戕，壮烈殉国，享年41岁。”¹

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对此役失利愤恨不已。他说：“此役由于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没有派部队出击占领随县，在桐柏山南截断敌后，牵制敌人的强大攻势，敌人无后顾之忧，横冲直撞，致使我第八十四军被敌人反复包围歼击。当我军危急之际，汤恩伯的部队见死不救，岂不是想借日本人之刀而消灭他们之所谓非嫡系的杂牌军部队？”²

部队一旦退却时，极易发生紊乱，此役也未能幸免。同样是在8日傍晚，莫树杰的桂军到达邓县县城，正在造饭之际，突然听到城外有日制三八步枪的枪声，莫树杰连忙派战士上城楼组织还击，可是其他的桂系军人慌了手脚，拔腿就跑，根本就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秩序因此混乱，还把不少枪弹以及辎重装备全部丢弃。事后才知，这不过是一场误会。³其实来者是友军，系河南内乡别廷芳的抗日地方民团。可见陈诚曾骂桂系的部队“万恶！”

1 钟毅（1899—1940）是广西扶南县人，早年因家贫而辍学于广西第三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于广西韶关讲武堂，曾在陆军大学特训班受训。1926年参加北伐后晋升为团长，1938年任第173师师长。1938年5月8日下午，钟毅将军举枪自戕。5月19日重新殓装钟毅烈士后，其灵柩于1940年运至重庆时，白崇禧将军及各级要员都到北碚吊祭，尔后将灵柩运回广西，安葬在烈士的故乡。钟毅将军获民国政府明令褒奖，发放抚恤金5万元。烈士子女由广西省政府供给，至子女大学毕业。

2 南丹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莫树杰回忆录：风光漫忆》，1997年11月，p208。

3 《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0年）。莫树杰文章《枣宜会战纪实》。

万恶！”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敌机在空中盘旋，战场上已硝烟弥漫，而郭秀仪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妇女工作队，与士兵们一起去前线抢救伤员。有一次，郭秀仪去前线慰问时，隔着一条河，她清楚地看见日军骑兵在往来奔跑，甚至能听见敌军的喊叫声。这是在整个枣宜会战中，郭秀仪与敌军距离最近的一次遭遇，但大家都毫无惧色。¹

是时，日军派出骑兵大队2000人，组成精悍的突击部队。他们由排子河附近偷渡，向老河口东40余里方向突进，而老河口是第五战区李宗仁的长官部。日军的战术目的就是要偷袭第五战区李宗仁的长官部，捣毁我指挥机关。幸亏这一企图被我军及时发现，长官部的警卫团迅速展开阻击，并命令黄琪翔部队驰援。黄琪翔命令第189师增援，结果打死一批敌军战马和士兵后，敌骑兵大队见奇袭失败便夹起尾巴转向樊城，前去增援攻打樊城的日军。

日军在围攻樊城时，黄琪翔坐镇前线，直接指挥。时任第八十四军副军长兼第189师长的凌压西将军（1891—1969）回忆说：我“第一八九师星夜开到樊城时，天已大亮，黄琪翔即令直开唐白河前线协助友军拒止敌人渡唐白河，巩固襄、樊。当我继续率队到达战地时，已闻炮声隆隆，敌人与我友军正在隔河对战中，战况已相当激烈。”²

日军双钳战法，至此除了重创我第十一集团军莫树杰第八十四军外，并无其它重大战果可言。5月8日晚8时，日本第十一军命前线各师团在抵达唐河——白河一线后反转会原驻地，准备执行汉水西岸的包围战。日军就此撤离战斗，开始转移休整。

敌军想借机喘息，我军偏不让。5月8日晚11时，重庆统帅部向第五战区下达总攻令，欲乘敌未喘息之机，给予重创。此

1 中国文史出版社《流金岁月》，p180。郭秀仪文章《爱国团结，振兴中华》。

2 《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0年），p164。凌压西文章《记随北、枣阳、樊城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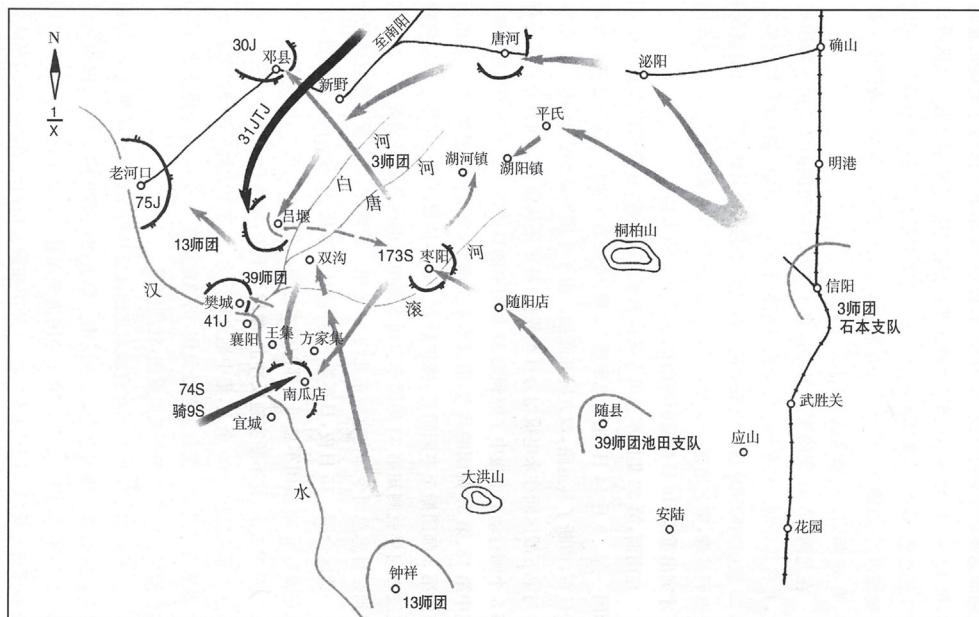
时，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六个师在北，池峰城第三十军与周鼎七十五军共六个师在西，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五个师在南，陈鼎勋第四十五军及郭忏第九十四军正尾追日军的五个师在东南，我军的态势已包围了日军。

当天夜里11点，黄琪翔让参谋长传达口授命令给凌压西将军，说第189师当前的任务是确保樊城，拱卫总司令部。无论如何都不能撤退，因为总司令（黄琪翔）就坐镇在樊城，在战斗紧张时，他会亲自到阵地巡视。

5月10日，正准备撤退的日军与自南方追进的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发生接火，日军认定这是击破中国军队的好机会，当即命第十三、三十九师团与池田支队南下，对我三十三集团军进行猛击，而以第三师团掩护其北翼。

5月12日，日军以两个师团猛击我三十三集团军的五个师，中国军队立陷苦战；在北边，中国六个军17个师则对孤立的日本第三师团自北、西、南三面进行包围攻击，日军第三师团也陷入苦战的泥潭。

5月13日，黄琪翔仍然坐镇在樊城指挥作战。他向统帅部蒋介石报告战况：“甲，我三十九军五六师重新攻克双沟后，敌步骑五六百（人）、战车六（辆）、装甲车五（辆）、炮六七（门），向双沟周围反攻，经奋勇击退。黄昏后，相持于黄家冈、赵家冈、周家冈一线。晨，敌增至二千余，战车廿七八辆，在猛烈炮火下向双沟防守部猛扑。敌我伤亡甚重。我方团长、李团附受伤，刻仍于双沟南北之激战。乙，七五军第六师于张家咀后，（在）刘家集、马家、吕堰镇、大甲家之线，与敌二千余激战……丙，四五军于占领快活岭、净明铺后，一二七师主力于以申家、高家、敖家之线激战中……丁，我李破坏队连日于应山南方陈家巷附近袭击颇有斩获，覃破坏队及第一游击纵队正由唐王店、吴山店各附近向枣阳挺进。戊，我襄樊守备部队指挥官谢庶常派出东扫荡营，于大布街及峪山等处，联络七四师与敌一度激战……我七五军左翼已与汤（恩伯）集团由朱家集南下部队于程家河附近取得



枣宜会战·枣阳地区战斗经过要图。

联络，合围态势已逐渐形成。”¹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始终与敌军处于胶着状态。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攻防互换。而我军的破坏队则在敌方侧背骚扰之。

日军第三师团在我军包围、攻击之下，情况出现紊乱，有招架不住的迹象。而日军指挥官园部和一郎依旧命令该师团往东南方的枣阳方向转移，企图以此作为诱饵引诱我军穷追。而我军自然没有上当，于是自行脱离交火。事实上，我军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已无力继续战斗下去了。

敌我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之际，李宗仁说：“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令张总司令自忠‘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²5月15日，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中将亲率1500名将士，在南瓜店将日军截为两断。双方激战后，近6000名日军围拢过来，将张自忠将军包

¹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200-00061-337。

² 《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0年），p146。李宗仁文章《欧战爆发后之枣宜战役》。

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激战到 16 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一昼夜发动 9 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5 月 16 日，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中午时分，他的左臂中弹，仍在坚持指挥作战。到了下午 2 时，张自忠只剩下数百名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 8 人。5 月 16 日下午 4 时，张自忠部全军覆没。这位民族英雄身中多弹战死沙场。去世前，他对身旁的卫士说：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关于张自忠将军牺牲的细节，日军三十师团步兵 231 联队长尾浦银次郎写过一本记录侵华战争的书，书名叫《辽远的战场》，1974 年在日本出版。书中写到：

第 4 分队的藤冈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猛然从血泊中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这个大身材军官不到 3 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自主地愣在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 3 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出现微微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¹

张自忠将军的殉国，是枣宜会战中最悲壮的时刻，举国为之哀痛。

黄琪翔下令所部将士及当地群众集会，沉痛悼念张自忠将军。

¹ 转录自刘永国著《随枣会战》，p144。

他登高讲话，难以抑制内心的悲痛，已是泣不成声。¹

深夜，负责驻守襄阳西北泥嘴一带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李宗进，认为战事非常紧张，催促黄琪翔赶快撤出指挥部。他在电话中说：“黄总司令，五战区已损失了一位张总司令，我们再也不能失去您呀！”²黄琪翔的司令部此时已移至樊城，接到李宗进参谋长的电话之后，黄琪翔撤出了樊城。樊城随即失陷。

枣宜会战中，中日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将士们如同在绞肉机上搏杀。以枣阳的攻守战为例，5月8日，黄琪翔被迫放弃枣阳，5月11日又再度收复枣阳，5月17日在日军的猛攻之下，枣阳再度失守。可见战斗之激烈，中方牺牲巨大。

枣宜会战进入第二阶段时，由于第五战区强行与日军决战失效后，部队伤亡甚重，已无力阻止日军攻势，而日军虽然也已十分疲惫，但战力仍相对完整，尚有再战之力。5月31日夜，日军第三、三十九师团强渡汉水发起攻势。当晚突破孙震第四十一军防线，次日进入襄阳，两个师团随即并列向南攻击前进，进入我三十三集团军背后，压迫中国军队调转作战方向，即由向东改为向北抵抗，中国军队仓促间陷入混乱，日军趁机猛击，将原属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各部予以各击破。6月8日，日军攻占江陵。6月12日攻占宜昌。

6月16日，日本陆军本部高层认为：占领了宜昌，有助于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应该促使中日和谈，所以日军在天皇的授意下停止了军事进攻。

重庆最高统帅部着眼于大局，为保存实力，也给中国军队下达命令：“兹为应付国际变化，保持国军战力，俾利整训之目的，第五战区应即停止对宜昌攻击……”枣宜会战于6月18日宣告结束。

枣宜会战中，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桂系军队的军

1 《黄琪翔传》，p109。

2 台北灵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0年8月初版，张军《陈诚1940—1943》，p45。



“克复枣阳”后，我军举行了升旗仪式。原载 1940 年新加坡《星光》。

Citizens in Tso-Yang held a formal ceremony in hoisting our National flag in front of the prefectoral office to celebrate the recapture of the town.



我军克复襄阳后的城头一景。原载 1940 年新加坡《星光》。

Chinese National flag waving above the buildings immediately after it was recaptured by Chinese army.

纪败坏，表现得极为恶劣，出现了强拉民夫，掳掠人民财产的事件。莫树杰军长回忆说：“在桐柏、泌阳、唐河、新野一带，就流传有个民谣：‘发、扬、光、大；奸、掳、烧、杀’。当时八十四军军部和各师臂章代号，军部为‘发’，一七三师是‘扬’字，一七四师是‘光’字，一八九师是‘大’字。据我所知，奸掳是

有的，烧杀则未发现。”¹军长莫树杰曾枪毙了一个欺压百姓的士兵，还把聚众赌博的官兵关了禁闭，但积重难返的桂军，仍然不能洗心革面。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黄琪翔悲愤不已，曾愤慨地说：

“若有当日（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当初日军攻占枣阳后，我各路大军奉命向襄花公路反击，于是日军又主动放弃枣阳城。汤恩伯率领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赶忙开进，至枣阳城尚有数十里的太平镇之前，汤恩伯就宣布第三十一集团军“克复枣阳”的捷报。其实，日军此时并没有撤出枣阳城，正在为撤退前作准备，将辎重物资以及占为仓库的民房进行焚烧。前头的侦察兵发现敌情后，立即报告汤恩伯，于是汤恩伯又连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继而灰溜溜地回师，²成为了一则笑话。最后，枣阳城是被黄琪翔的第八十四军收复的，那时已是一座空城。

枣宜会战，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团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这场作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表面上看，日军占领湖北宜昌，是我军的失败，但日军未能击溃中国第五战区的主力，所以没有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而且，日军本身也遭到重创。据日军统计，此役日军伤亡人数多达1.1万余人。

自此，中日双方军队在宜昌、当阳、江陵、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一线形成对峙，基本上回到枣宜会战开战以前的双方位置，日军未能占到多大的便宜。

但宜昌的失守，还是极大地震动了社会各界。日军为逼迫国民政府和谈，派出大量轰炸机轰炸陪都重庆，导致平民重大伤亡，引发了一时社会恐慌情绪。

为此，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新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上将奉重庆统帅部的命令，在宜昌北部的三斗坪召开师以上高级将领

1 《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0年）莫树杰“枣宜会战纪实”，p155。

2 见莫树杰“枣宜会战纪实”，p154。

会议，检讨枣宜战役的第六战区得失，并宣布奖惩命令：

第七十五军军长周鼎作战有功，升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第二十六军41师师长丁治磐作战有功，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

受处罚的有：为追究宜昌失守的责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长江上游江防司令、江北兵团司令郭忏中将撤职，交重庆军法处审判。¹

第十八军军长彭善，是失守宜昌的直接责任人，撤销军长职务；

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作战不利，擅自撤离战场，撤销军长职务。

7月，在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老河口，同样举行了枣宜战役检讨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主持，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参加。奖惩命令为：

第十一集团军作战不利，撤销番号，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调回重庆；

第四十一军122师师长王志远、第二军新33师师长张世希作战不利，撤职并交重庆军法处审判。

受奖励的则有，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等多名将领记功，第二军无名师因作战勇敢，恢复番号。²

显然，对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的惩罚命令只是象征性的。在枣宜战役初始阶段，第十一集团军负责正面防御，最先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而第八十四军伤亡严重，在突围过程中师长钟毅将军牺牲。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此承揽了领导责任。同时，1940年7月军队正好进行重新调整编制，列入战斗序列的部队共计268个步兵师、44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8个骑兵旅。黄琪翔同时又被宣布为预备集团军总司令。必须指出：黄琪翔所指挥

¹ 郭忏中将（1893—1950）被逮捕，并押往重庆接受军法审判。结果郭忏被处以五年有期徒刑，在北碚军人监狱服刑。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宜昌失守的责任主要在于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判断失误，临调部队时郭忏还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所以大家当时都认为郭忏是代人受过。战时郭忏的江防司令部属于第六战区序列。

² 刘永国著《随枣会战》，p215。

的部队都是杂牌军，虽然第二十二集团军名义上也归他指挥，但实际上也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¹

黄琪翔回忆说：“日军进攻湖北，即所谓（第二次）随枣战役。我指挥第十一集团军虽努力奋战，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但损失巨大，使广西军的实力大为减少。后来，蒋介石调整编制，便撤消了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并任我为预备集团军总司令，调回重庆。不久，又调任我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陈诚）驻恩施。”²

枣宜会战结束后，参战部队开始整编、补充。1940年7月，黄琪翔将自己在第十一集团军的讲话材料汇编成集，这就形成了《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这本共计九十九页的小册子，极为珍贵，是我们后人所能了解黄琪翔将军军事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仅见的作品。他在同年7月7日撰写的自序中，阐明了自己整理、出版这部书稿的意义是：“抗战进行了三年，我们在战场上获得了无限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拿来教训自己，警惕自己，作为我们军事改进的张（账）本，自然是极端需要的。”³

廖沫沙回忆说：“那次（枣宜）战役结束以后，大约已是七八月。一天周范文通知我：桂林《救亡日报》夏衍来电给黄总，催调我回桂林报社工作。黄总司令已经批准我走了。就这样，我向黄琪翔先生当面致谢，并告别、辞行。”廖沫沙走的时候，黄琪翔已把他自己在第十一集团军的讲话“亲自整理，编成了小册子，托我（廖沫沙）带回桂林，转交司令部驻桂林办事处出版。”⁴

廖沫沙走后，黄琪翔旋即被调往重庆，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然而，黄琪翔所不知道的是，此时蒋介石根据特务的情报，再次

1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p455。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时至今日，我们仅见《黄琪翔军事讲话·第一辑》，未见有“第二辑”，或许黄琪翔只出过这本“第一辑”。

4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廖沫沙《同黄琪翔先生在前线的时候》，p15。

对黄琪翔产生警觉，开始提防着黄琪翔及其第三党。

1940年9月9日，蒋介石秘密给陈诚手谕¹：

辞修吾弟勋鉴：第三党组织自上年复活以来，现在正在积极进行发展，而以第六战区长官部与第四战区、第七战区为基本对象。此决非任意无根之谈，望严密考察与取缔，如其部中有不先呈明而活动党外组织者，应以破坏纪律与图谋不轨论坐也。

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蒋介石的这份手谕显然是针对黄琪翔的，因为“解委会”内的最高军事将领就是黄琪翔。此时的陈诚，虽然依旧十分信任黄琪翔，但他也必须小心谨慎，于是把黄琪翔调到自己的身边，一方面自己可以“严加看管”，一方面也是向蒋介石做出回应的姿态。这就是黄琪翔自述“任我为预备集团军总司令，调回重庆。不久，又调任我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原因，只是他本人生前尚不清楚其中内幕。

枣宜会战结束后，黄琪翔调回陪都重庆。因为努力作战而没能得到嘉奖，心情抑郁，所以他已经做好了回乡探亲的准备。这一年，是黄琪翔母亲60大寿，而他的外祖母黄氏正好是90晋一大寿。客家人具有浓厚的故乡情结，黄琪翔感觉自己必须回乡去走一趟。

1940年冬天，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利用战争的间隙，回到广东梅县去探亲。这是新媳妇郭秀仪第一次来到了她的婆家。

319

黄琪翔的外婆黄氏，当时还健在，已经九十一高龄。

黄琪翔的表弟刘凌云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描写的：“他们回到家乡的第一天先住在自己的家里，和母亲及家人团聚。第二天一早赶到外婆家。当他们踏入我家门请安问好后，外婆就牵着琪

1 台湾“国史馆”《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8-010108-00003-022。

表嫂（郭秀仪）的手，仔细端详好一会儿，以慈祥而又认真的表情对着琪表哥说，‘阿琪呀！你真有福气，从哪里娶到这位美丽端庄又有教养的姑娘？我很喜欢。她定会伴你走过幸福的一生，恭喜你！’我相信祖母的话。他们听在耳中必喜在心里。至于舅舅（我爸）的表情又怎样？他叫我赶快把老花镜拿来戴上，也端详好一会儿，只见他老人家交织着喜悦而又懔然地睁大眼睛，连说三声‘好，好，好！’到底好在哪里？我们晚辈就不敢去问了。想来琪表哥早年失怙，对外婆的亲情特别深厚，爱屋及乌，琪表嫂当然是外婆心目中最宝贝的孙媳妇。”¹

刘凌云又说，“我第一次见到琪表嫂（郭秀仪）的感想，是既仰慕又嫉妒；仰慕的是她那雍容华贵的风度，嫉妒的是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到大都是乖孩子，可是从来没有得到俩位老人家一句嘉奖的话。”

为了庆祝外婆黄氏九十一岁寿诞，黄琪翔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匾额“萱阁延年”四字，挂在舅舅家里，因为外婆黄氏是跟着她的长子刘任昭、即黄琪翔舅舅一起生活的。表弟刘凌云说：林森主席题写的巨匾“悬挂在我们刘家三堂屋大厅上，好不风光。这是我们刘家至高无上的荣耀。”

为了祝贺黄琪翔外婆黄氏大寿，由第四战区总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发起征文启事，共同庆祝她的生日，以表彰她的抚孤贞德。

《张发奎征文启事》²曰：

刘寿母黄太夫人系黄琪翔将军之外王母，系出名门，蚤适应华先生随官粤西，勤修妇职，戚党称颂。先生捐馆桂林，太夫人率其遗孤，间关跋涉，度岭而东。抚养任昭及玉誉、桂五等，饮水思源，艰苦备尝。及子孙长成，太夫人顾而乐之，心滋慰之。晚年性耽幽静，善葆天和，虽年届期颐，而精神巩固，见之者仍谓如五六十岁时。每遇

1 《流金岁月》，p207。刘凌云文章《永远的琪表哥琪表嫂》。

2 《张发奎征文启事》原迹现存台湾刘凌云处。



1940年冬天，黃琪翔夫妇回到梅县故乡，与母亲刘桂五及妹妹黃景新、妹夫张勇斌合影。

春秋佳日，召集儿孙子妇，瓘居堂内，教以安贫习俭，勤操工作，族内子姓，继继绳绳，已俱望见颜色，乐闻绪论，争自濯磨，以为善士，尤以见太夫人德量感人之深，有康乐和亲之盛焉。今夏历七月，太夫人百龄开庆，衢歌巷祝，奔走相告，实为邦家之人瑞，匪一姓之休徵。（张）发奎等或谊托葭莩，或情联桑梓，欣逢盛事，同切瓘欣，愿籍寿人寿世之文，以作如岗如岭之颂，伏望大雅贤达，椽笔揄扬，俯赐宏词，俾光乡乘，不胜企祷。谨启。

除此之外，母亲刘桂五秉持老旧传统观念，希望黃琪翔晚年能叶落归根，命其在家置业，以显示黃家之荣华富贵的烟续。黃琪翔是大孝子，母命难违，于是他开始筹划，欲在故乡梅县水车墟建造一栋新楼“仪园”，以完成母亲的夙愿。

九、在第六战区的日子

1940年，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夫妻俩于年初离开第五战区前线，回到陪都重庆。不久，国民政府为拱卫重庆、屏障四川，重设第六战区——而此前，即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曾设第六战区，1940年4月撤销。

第二次设立的第六战区，陈诚兼任司令长官。1941年6月13日，黄琪翔被任命为战区副司令长官。该战区所辖部队有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江防军、第十八军等，防区为鄂西、湖北、湘西、川东等地，主要任务是防范日军的进攻。黄琪翔说：“当时第六战区的作战任务是防守长江，因日军不再深入，在两年中根本没有作过战。”¹

第六战区司令部驻地在湖北的恩施。恩施当时是湖北的省会。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来到了恩施。第六战区的司令部驻地，不光只湖北恩施一处，还有一处在四川黔江。作为战区副总司令长官的黄琪翔，要在两处来回跑。

这一时期，陈诚和黄琪翔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据陈诚日记可见，他们的交谈，看似陈诚在畅舒胸怀，谈人生、谈历史、谈现实、谈理想，几乎无所不谈，可仔细揣摩，又像是在“帮助和

¹ 黄琪翔《我的自述》。



1937年，陈诚、张发奎、黄琪翔等将领合影。

教育”黄琪翔。例如，陈诚在1942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与琪翔先生谈话：‘有个人之聪明才干，不能敌任何组织，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使天下无敌，因一般个人主义者，其目的完全在个人之地位，结果未有不失败也。’”7月8日，陈诚在四川黔江与黄琪翔谈话，说：“帝国主义之文化侵略，实在可怕，使一般知识阶级自认为中国人，实则在不知不觉中为其效劳而不自觉，等于本党一部分党员为共产党工作而不自知，又如清康熙之所谓圣谕之成功无疑也。于斌说的不错，外国文绝不会教中国人爱中国，因此中国之教育政策实须检讨也。”¹在陈诚看来，这个帝国指的就是苏联，而他所谓的“帝国主义”就是指的共产主义思想。

在四川黔江，第六战区还设立了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叫“湘谷转运管理处”，负责军粮的征集与转运工作。初期是陈诚本人兼任处长，不久后就由黄琪翔兼任处长之职，副处长是重庆派来

¹ 《陈诚先生日记》，p377。

的倪振亚。湘谷转运管理处下设五个分处，任务是负责征集军粮，因其他地区大都沦陷，所以他们征粮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川平原以及湘西地区。第六战区的征粮，力度很大，有点儿像抢购军粮，严重影响了市场，引起相邻地区的强烈不满，导致他们不停地向中央告状。重庆中央政府的粮食主管部门再不能装聋作哑，所以多次派员前来调查。

陈诚当然明白军粮是战争中极为重要的物资，须臾不可缺少，不能破坏市场平衡。但是，第六战区也有自己的难处。1940年至1942年间，湖北因发生了天灾，农业歉收，农作物产量低于一般水平，导致粮食紧缺。如陈诚在日记中说：1942年的“秭归今日收成，好者三成，次者仅一成”¹；相邻的河南也闹灾荒，大量难民涌进湖北，赈济灾民也成了湖北当局治安的大问题；再加上产粮最好的襄河地区，此时已经被日军占领，粮食运不出来。受此影响，部队官兵对此意见最大，因为“工人每月（收入）六百元，士兵仅十余元。”²士兵连饭都吃不上，部队还怎么打仗？这种情况导致部队军心不稳，抱怨声此起彼伏。

此时因宜昌失守而被判罪的郭忏将军已经出狱，由陈诚担保将功赎罪到第六战区工作。他本是中将，现在拿少校薪给，不能佩带军衔，一时间被第六战区长官部的人戏称为“当代年羹尧”。第六战区参谋长施北衡（1892—1963）正好被调任第七十五军当军长，陈诚便借机任命郭忏为代理参谋长之职。可是因为降职，郭忏家陷入困顿。

按照1941年元旦起实施的国民党军队暂订薪饷表，上将月薪320元，中将240元，少将180元；上校154元，中校124元，少校100元；上尉66元，中尉50元，少尉42元；准尉32元，上士14元，中士11元，下士9元，一等兵5.5元，二等兵4.5元，新兵4元。郭忏本是中将，月薪240元，因为被判刑，他现在拿

1 《陈诚先生日记》，p393。

2 《陈诚先生日记》，p397。

的是少校 100 元的工资，生活水平急遽下降。

1942 年 7 月 16 日，郭忏将军夫人携子来投奔丈夫。她去拜见陈诚时，谈到老家广东东江地区的生活窘况。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双慧（郭忏夫人）来谈生活问题，全家每日吃两次细（稀）饭、一次干饭，（广东）东江民众吃树叶、谷糠，因此大便闭塞而死者不知其数，华侨尤苦。双慧此次由家乡来沅陵，母子共六人，仅住两间小房子，小孩均睡地上（无床），亦可知今日军人一般之情形矣。”¹陈诚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第六战区的军粮问题解决好。

7 月 17 日，陈诚跑到四川黔江找到黄琪翔，商谈征购军粮的问题。这一晚，他就住在黄琪翔的寓所，两人聊到深夜。陈诚身体不好，而且有个习惯，就是长期住在会议室里。黄琪翔大概劝慰他要多注意身体。是日，陈诚在日记中写道：“一般均（认为）我之生活太差，尤其所住之会议室，冬冷夏热，有害健康，并影响做事。余岂不知余之生活太低，然较士兵及民众，实有天壤之别。在此时代，只求其心安理得，而食、衣、住实无所为（谓）也，而且一个人之地位与责任，应以国家民众之有办法为前提，而个人之享乐更谈不上。”²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陈诚的思想境界的确高人一头。戴笠对陈诚是这样的评价：他“是少数不要钱肯苦干的将领，应多亲近。”周恩来也曾高度赞誉陈诚，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

陈诚自 1938 年 6 月出任武汉卫戍司令，同时担任湖北省主席，一直到 1944 年 7 月卸任，其间只有 1939 年中不到一年时间是由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所以陈诚先后两次出任湖北省主席，主政湖北时间长达五年。陈诚坚持认为，战争期间必须“军事第一”，并说“我之欲解决军粮，虽为军，实为民。”他还说：“征购与救济为两事，因被征购者为大户，待救济者为穷民，故征购仍须贯彻，而救济则须早为准备。”³

1 《陈诚先生日记》，p380。

2 《陈诚先生日记》，p381。

3 《陈诚先生日记》，p398。

陈诚是抢购军粮的决策者，黄琪翔是落实者。第六战区决定“计划征购军粮谷九十万石，尽量配额各县；麦四十万石，以二十万留待明春，购二十万用抢购价抢购方式购足之（但能否购足，实无把握）。”此外，“代豫省购赈米三万石，并再拨款十万元，作为收容豫省灾民来鄂收容费用。”¹

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省财政厅归他管，黄琪翔要多少钱，他就想方设法给他凑多少。黄琪翔于是坐镇在四川黔江，命令他的部属四处去抢购粮食。他们怎么抢购？无非是高价购买。当时的物价水平是粮食一元一斤，他们出的价格高出市场的一倍，是两元一斤！他们不光抢国统区的粮，更要抢敌占区的粮。而敌占区的农民也极愿把粮食卖给自己的政府。黄琪翔立即派人深入敌后去抢购粮食。至1942年10月，已经从敌占区购买到12万斤，而且据派员反映，还能够继续在沦陷区购买粮食，问题是中日军队之间的警戒线不易通过。

许多人看到第六战区的做法眼红了，就以破坏市场监管为名，向中央提抗议。时任中央行政院粮食部部长的徐堪（1888—1969），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也是孔祥熙的助手，他在中央参政院开幕式上作报告，不讲情面，公开点名指责湖北省和第六战区，“谓第五战区军粮（筹集）无办法，完全是鄂省不负责，此种不顾人民死活，只知发国难财（以粮款七万、七万存川康银行）之官僚，负如此之重责，革命乎？反革命乎？”²措辞极为严厉，震动全国。蒋介石也坐不住了，出面痛责湖北省。

陈诚性格坚毅，不为所动，继续命令黄琪翔贯彻预定的抢粮方案。陈诚坚持认为：“如果粮食不能抢到，必致影响抗战前途。”为此，蒋介石曾于1942年10月7日专门召见陈诚，听取他对第六战区的情况汇报。蒋介石谈了“鄂东与粮食”问题，并嘱咐陈诚亲往鄂北一行，去与李宗仁沟通，以展示大局观念。经过蒋介

1 《陈诚先生日记》，p398。

2 《陈诚先生日记》，p393。

石一番苦心开导，陈诚也表示，回湖北后将裁剪机关后勤人员。

1942年11月3日，陈诚带领黄琪翔等第六战区的将领，来到第五战区总司令部驻地老河口，参加鄂北行政会。李宗仁亲自到码头迎接。陈诚在日记中写道：“李宗仁长官训示，对于鄂北军粮不太谅解，似认为非有无问题，是方法问题，并举例谓（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军队比现在多，并未发生粮荒，今日军队减少，何以军队反无隔宿之粮？”¹

陈诚解释说：1937年至1939年三年，湖北全省农业丰收，且襄河产粮尚未落敌手。自1940年起，由于气候和战乱的原因，湖北连年欠收，且沿襄河产粮之区已沦陷，现在的驻军虽然比过去要减少了一些，但需粮的状况非但未减反而在增加，原因是驻湖北的中央军政机关也增加了，的确也存在浪费现象。

陈诚在日记中写道：“深感高级人员以耳代目之可怕，尤其说如无粮可收钱，如无钱可收地，此种行为恐非革命军人所应为也。”²表达了他对李宗仁等高级官僚的不满。看来陈诚这次老河口之行，并不愉快。

在四川黔江，除了第六战区“湘谷转运管理处”之外，军委会“政治部军乐队”和《前卫日报》社也驻扎于此。这些隶属于中央部门的文职官员子弟也随父母来到这里。为了不让下一代因为战争而失去了学习的机会，黄琪翔在黔江创办了“中山小学”，文职官员子弟与附近农家子女都可以入学就读。

解放后担任黔江区教师进修学校的退休教师万思扬，本是附近的农家孩子，10岁时也曾在此就读。万思扬回忆说：“中山小学”分设两处，学生可以就近上学。这两个校区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冯家镇桂花村万涛故居前的小江坝和照耀村的桃子坪。我们桂花村读高小的同学都在桃子坪上学。学校的校长由黄（琪翔）副司令亲自任命的具有上校军衔的黄振球和《前卫日报》的王总

1 《陈诚先生日记》，p397。

2 《陈诚先生日记》，p397。

编担任。学校的教师由从政工队中挑选并面试合格的女士们担任。教师们对同学十分关心，教学认真负责，纪律训练极其严格。她们在同学和家长中均留下很好的印象。担任五年级导师的阮杏初女士，她的音容相貌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万思扬还说：“黄副司令长官对我们也很关心。我记得他多次在公路上碰到我们，总要停下车来，抚摸着我们的头，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教师对我们好不好，并且还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他虽然是一个身穿黄呢制服的高级军官，出现在我们面前却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老爷爷。”万思扬说：“这是我儿时生活中的一段十分美好的记忆。”¹

1942年底，一个意外的消息让黄琪翔十分震惊，那就是因“皖南事变”被俘的共产党人、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被关押长达二年之久后，此时刚被转移到恩施。

所谓“皖南事变”，是指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强令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等复电驳斥了这一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等按原定计划把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激战7昼夜，新四军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起，叶挺被俘羁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李村监狱7个

¹ 重庆市黔江区政协学习文史委2004年编印《黔江文史·民族教育专辑》(第二辑)，p171。万思扬文章《黄琪翔与中山小学》。

月。在监狱期间，叶挺与黄琪翔建立了联系。1941年3月27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叶挺经黄琪翔转来的信谈“皖南事变”情况。信中说，事变中被俘人员不到四千，伤亡约二千，其余均突围。¹但是，黄琪翔担任信使的角色，似乎只有这一次，此后未见他们之间联系的任何线索。

1941年8月间，叶挺被秘密转囚到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狱的盘石渡看守所，几天后又被秘密转押到广西桂林、四川重庆囚禁，然后于1942年底转移去了湖北恩施。

叶挺为什么会被关押到第六战区的恩施？其实是叶挺自己写信请求的。陈诚说：“昨晚（1942年12月3日）十时许，在委座官邸会报，散后，委座问余尚有什么要谈否？余将叶挺十一月二十七日呈委座报告转呈，当即奉批：‘准派至第六战区察看可也。’”²可见，叶挺被关押重庆后，陈诚曾于1942年11月见过他。叶挺提出自己要去湖北，陈诚借机将信当面转交给蒋介石。陈诚与叶挺早就相识，私交甚好。严重、叶挺和陈诚三人是曾经换过金兰贴的结拜三兄弟。

1942年12月4日，陈诚乘坐“同德”号兵舰准备回恩施，随后特务们把叶挺夫妇也送上了兵舰。当天晚上，周恩来、郭沫若也登上了“同德”号兵舰，与陈诚会晤。第二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偕叶挺夫妇乘同德兵舰，由渝动身回鄂，晚停万县。”³从陈诚的日记上可以确定，叶挺夫妇来到恩施的时间是1943年的元旦之前。

最初，叶挺被拘押在恩施是保密的，但陈诚去重庆面见蒋介石时由第六战区代理参谋长郭忏陪同，而郭忏回到恩施后，又把此事告诉了黄琪翔。黄琪翔获悉这个消息，立即带着夫人郭秀仪前去探望。

叶挺来到恩施，先被囚禁在城东门的“民享社招待所”，后

1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周恩来年谱1898—1979》p251。

2 《陈诚先生日记》，p402。

3 《陈诚先生日记》，p402。

来又搬到背靠梁子山、面临西门河的一栋民房里，就是现在的“叶挺将军囚居纪念馆”旧址。叶挺在此处一共住了两年的时间。叶挺夫人李秀文，子女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先后到此同住，经陈诚特许，其子女都得以在恩施上学读书。

叶挺比黄琪翔大两岁，黄琪翔平时用客家话叫叶挺是“亚哥”，叫李秀文是“亚嫂”。郭秀仪也跟着这么称呼。“亚”是客家话里的前缀语，相当于“阿”的意思。而叶挺叫黄琪翔的字，叫御行。老朋友相见，自然其乐融融。叶挺表面上身陷囚室，实际上他可以自由待客，囚室也形同虚设，这是陈诚的特别关照。不久后，叶挺被拘押在恩施也就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黄琪翔公务繁忙，去看望叶挺的次数毕竟有限。这样，经常去照料叶挺家生活的任务，就落在郭秀仪的肩上。郭秀仪回忆说：

“看守叶挺的那些特务们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第六战区副司令官黄琪翔的太太，没有人敢阻拦我。所以我出入非常方便。叶挺最喜欢吃客家菜，比如红曲肉、鱼丸子和酿豆腐，我就自己做好了给他们送去。他的年纪比琪翔大两岁，我就叫他亚哥。他非常高兴。和他一起被关押的叶挺夫人李秀文，还有他们的女儿叶扬眉，我都认识。”¹

叶挺被俘后，最初被单独关押。他的夫人李秀文时在广东。李秀文闻讯丈夫叶挺被囚禁后，经过多方奔走说情，特别是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才获准带着4、5岁大的女儿扬眉，从广东赶去重庆和叶挺一起生活。他们其他的孩子，都是后来跟着岳母一起去恩施与叶挺夫妇团聚的。

叶挺在恩施被拘押时期，得到了陈诚十分优厚的照顾。他的行动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制约，不像后来一些文章所说的叶挺被囚禁期间，如同监狱坐牢一般，事实上他与共产党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系。

1943年6月，周恩来派《新华日报》记者、中共党员陆诒作为“全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9月版，孙炜著《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p67。

国慰劳总会鄂西将士慰问团”随行记者前往恩施，并给陈诚捎带了亲笔信。6月25日，陈诚在招待所专门接见了陆治半小时。陆治回忆说：“陈诚将军单独接见时，亲切握手寒暄后，我即面交周恩来同志的亲笔信。他认真看信时，频频点头，不等我开口提出要求，就爽快地说：‘周公信上所谈的完全确实，希夷兄（叶挺）一家就住在恩施西郊，你要去访问他，这不成问题，我就派副官陪着你去。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有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绝无问题，请他宽心。’”¹随后，陈诚副官送他去见了叶挺。陆治与叶挺单独在一起四个小时，无人干扰。陆治送给叶挺5月份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最近几期《群众》杂志。

1943年8月7日，叶挺曾经拿着陈诚的信函去桂林看望张发奎将军。张发奎给了叶挺5000元钱和400斤米。可见，陈诚和张发奎都没有把叶挺当“囚犯”对待，不仅以礼相待，还给予他行动的自由。不料在10月，叶挺重新被第五宪兵团逮捕，又送回了恩施。1944年2月1日，张发奎在日记上记载：第四战区长官部要求蒋先生（蒋介石）发一笔钱救济叶挺的家眷。另外，长官部给了叶家一万元钱，并要求第五宪兵团团长刘炜好生照顾叶挺全家。在叶挺被重新押回恩施的时候，陈诚和黄琪翔夫妇已经离开恩施，前往云南了。

在恩施的时候，黄琪翔经常要去重庆出差办事，有时郭秀仪就陪同前往。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在重庆落脚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湘谷转运管理处”驻重庆的办事处；其二就是川军首领之一范绍增（1894—1977）的私人别墅，即有名的重庆范庄。范绍增在四川很出名，当地人都叫他“范哈儿”。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陪都，军政要员们汇聚于此。山城重庆的接待任务繁重，住房不够用，范绍增将军就腾出自己的范庄，

¹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文史丛书之二十四（2015年）《浦东抗日战争史料选编》，p402。陆治文章《抗战期间几次会见陈诚将军的经过》。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職員錄		三〇一年十二月	
級 階 級 級	職別 職別 職別 職別	姓 名 別 號 別 年齡	籍貫 學 歷 經
上將	夏督	陳誠辭修四五浙江	保定軍校八期
中將	劉參	王贊緒殆易五四四川	四川陸軍速成班
中將	夏督	吳奇偉桂生四一廣東	保定軍校六期
中將	夏督	黃琪翔毅行四四廣東	營團旅師長總司令
中將	夏督	郭懷勿吾四八浙江	師軍長總司令
中將	夏督	樊崧甫哲山四八浙江	師軍長總司令
中將	夏督	柳克述劍賓四八湖南	國旅長兼旅長至德縣長師
中將	夏督	徐江長沙湖南	軍長自公副總司令代總司令
中將	夏督	陳肇南美國倫敦大學政	國旅長兼旅長至德縣長
中將	夏督	徐紹楨法國巴黎	處長副處長至德縣長
中將	夏督	張瑞麟英國倫敦大學	書長
中將	夏督	周子雲英國倫敦大學	國正委員長旅館長副軍
中將	夏督	朱國基英國倫敦	委員長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职员录。

供这些要员们使用。许多人喜欢住南岸的范庄。因为重庆是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每到夏天，气候炎热，而南岸的范庄，绿树环绕，江风阵阵，又很安静，确实是消夏的好去处。据现有的

资料显示，在整个抗战期间，范庄接待过的要员很多，包括蒋介石夫妇、财政部长孔祥熙、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大多是举家进驻。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住重庆的时候，白天黄琪翔要外出办公，夫人郭秀仪就去找孔令俊（1919—1994）结伴游玩。孔令俊，又名孔令伟，即著名的“孔二小姐”，是原民国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的次女，因其长期在宋美龄身边生活，其地位特殊，又因为她长期以男性化的装束而著称一时。

那时已经到了1942年。宋美龄赴美国去募款，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宋美龄成功地赢得美国的同情，并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中国抗战。1943年，宋美龄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

在重庆，郭秀仪与电影明星胡蝶（1908—1989）等人相遇。胡蝶的美丽、快乐、聪慧，以及妇孺皆知的名气，使得大家都很乐意与她相处。

郭秀仪说：“谭祥和我很熟悉，1949年她随陈诚去了台湾。最初两年，我们过年的时候还互致贺年卡，不久后断了联系。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美国探亲，那时胡蝶在加拿大。我还给她打过电话，劝她回国来走走，玩玩。她很高兴。”

十、中国远征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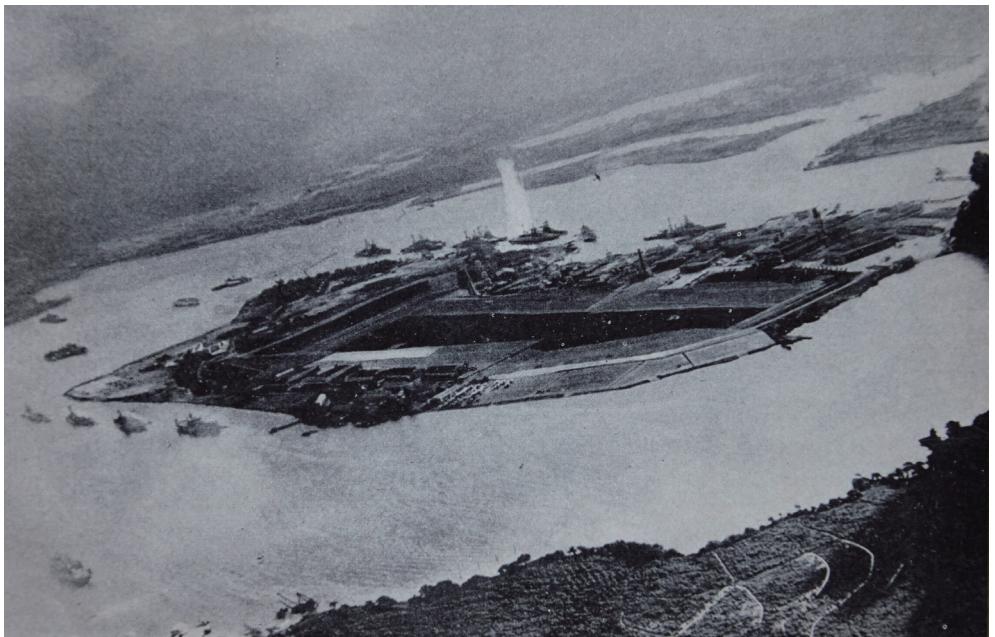
一个电话打进了远在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陈诚拿起了电话。这是1943年1月8日。

电话是林蔚打来的。林蔚（1889—1955）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告诉陈诚，委座有意让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这个消息当时是高度的机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背景：

1941年1月，军委会成立“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团长为商震，副团长即是林蔚。他们率团于同年2月出发，到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约三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次考察，为日后中国远征军出征缅、印打下了基础。

中国考察团出国之行，由英国政府邀请。英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老牌帝国，向来瞧不起中国人。可是他们一旦与希特勒德国开战，结果一败涂地，发生了1940年丢盔弃甲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丢尽颜面。而中国与日本开战，已经坚持了四年，日军已深陷泥潭，再也没有开战之初那种嚣张气焰，所以英国想拉中国入伙，建立英、中、缅的共同防御计划。因为日军已于1940年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直接威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英国殖民地。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7日凌晨7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照片系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最初阶段，最前方的日机已经开始对美国舰队实施攻击。

英国人历来太自私。陈诚担忧地说：“我国如果单独去打击缅甸，打了败仗，英国自不会帮忙；但如打了胜仗，则成为祸根，即英国或许因忌中国而联合日本。”¹

1941年12月1日，德军一路进攻到莫斯科城下，能够清晰看到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星之际，它的法西斯盟友日本终于按耐不住，认为苏联的惨败已在眼前，该是他们自己动手收拾美国的时候了，于是日本做出战略决策：对美国不宣而战。可是，如果日本当局再稍微沉着一些，它就会看到苏联并没有让德军攻进莫斯科城，而是展开了英勇的反攻，使得德军节节败退。日本当局对欧洲局势的误判，产生致命的恶果，加速了整个日本帝国的毁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新高潮。中国这才于1941年12月23日

¹ 《陈诚先生日记》，p409。

与英国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至此形成。1942年1月20日，日军进攻缅甸，1月31日占领毛淡棉。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第一路，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共10万余人入缅作战。3月6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先遣第200师抵达东吁接防。

3月8日，日军集结两个师团兵力占领仰光。“那时英国在缅甸只有两个训练不足、装备老旧的英印军第十七师和英缅第一师。例如英缅军第一师用来吓唬缅甸人的77—公里反坦克炮，竟是1918年奥地利造、每门只有炮弹一百二十发，没有补充，打完了炮弹就变成废品的博物馆型物品。”¹

中国人弄到一点美国军援很不容易。美国当时支持反法西斯阵营共470多亿美元，其中五分之三给英国，五分之一给苏联，五分之一给中国和法国。支持苏联的五分之一中就有1.2万余架飞机、1万辆坦克、14万辆汽车以其其他战争武器。²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

中国人缅作战的是最精锐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和甘丽初的第六军，一色全新的美式装备，其中第200师是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可是，中国人到了缅甸一看，完全没料到英、印、缅军的装备如此之差，更没有料到英国只想保印度而欲放弃缅甸，再加上，由于英国对印度、缅甸长期实行高压政策，当地民众居然把日军当成了救星，开始联合日军与英军作战。最可恨的是，英国人不仅看着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还企图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挡箭牌。在当地人的支持下，日军从地图上完全看不到的小道向中国部队突然进攻，驻守曼德勒的中国军队在英军悄悄撤退后，恐怕自己的后路被切断，也匆忙撤退，遭遇惨败，结果导致中国唯一机械化师的师长戴安澜（1904—1942）阵亡。

1942年3月，美国史迪威中将第5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

1 见《太平洋战争》，转载自《萧毅肃上将轶事》，p43。

2 团结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蒋介石大传》，p1152。

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并强烈要求中国派遣更多的军队入缅参战。美国政府表示：“为了帮助中国，美国宣布了五十架驱逐机和一万多万美元的对华援助。”¹而更重要的原因是：“1942年5月，日军自缅甸入侵我国滇西，占领腾冲、龙陵及怒江以西国土，致使我国唯一的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切断……故就当时全般（盘）情况而言，配合盟军作战收复滇西国土，打通滇缅公路，重开国际路线，是为我国最优先的任务。”²

1943年1月14日，林蔚再次来电，催促陈诚赶紧赴重庆，蒋委员长要正式宣布他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命令。于是，陈诚在15日午饭后从恩施动身，晚上住宿黔江。³陈诚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与黄琪翔“商远征军事”。可见，此时陈诚已决定要带着黄琪翔一起去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工作。

陈诚在黔江告别黄琪翔之后，坐汽车赶路，16日晚住南川，17日下午一时抵达重庆。晚上八点，蒋介石约他吃晚饭，谈他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想法，同时做了相关的工作指示。回到住处，陈诚给妻子谭祥去电话。“曼意电话问我，有无吃面？才想到今日是余生日。”陈诚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此后，陈诚在重庆几乎每天都要与蒋委员长、史迪威将军见面、开会、谈话，他们讨论的中心议题自然是有关中国远征军的组建问题。陈诚考虑中国远征军长官的人选是：黄琪翔出任副司令长官；郭忏任参谋长。陈诚在1943年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参谋长仍以郭忏充任，但郭未离战区前，可调黄琪翔为远征军副长官暂兼参谋长。”⁴另外，远征军设参谋团，团长为林蔚。这是内定的。因为一旦远征军入缅，联合盟军对日作战，事关中国军队的指挥、调动，都要由林蔚通过电台，向远在三千英里之外的蒋介石报告，待蒋同意后方能执行。这是规矩。

1 《萧毅肃上将轶事》，p41。

2 黄杰《滇西抗战纪实》。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1981年3月。

3 《陈诚先生日记》p410。

4 《陈诚先生日记》，p415。

至于谁来接替陈诚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考虑是“如孙（连仲）代六战区，则以周岩调五战区。”蒋介石嘱，等到孙连仲来到重庆后再定。

何应钦一直反对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他的主张是：如果中国远征军不主动进攻日军的话，则陈诚不必去缅甸，可从卫立煌、商震或张发奎之间挑选一人前往。因为陈诚是国内少见的军事大才，国内战场急需这样的高级将领；美国人则反对何应钦的主张，坚持要陈诚去上任。因为在美国人看来，陈诚做事干练，好合作，而且身居高位，能表示出中国政府对美合作的积极态度。史迪威更是称陈诚是中国高级将领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而蒋介石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开始有些摇摆不定。所以陈诚在重庆住了18天，还是定不下来，就有些烦闷了，急得他牙疼不止。

2月3日晚6点，林蔚来见陈诚。陈诚说：如果委座与何先生的意见还不能统一，我就先回恩施去，等到他们确定好了以后我再回来。林蔚个人也偏向让陈诚去远征军，所以在征求陈诚意见后“当即写下四项：一、司令长官先发表。二、罗（卓英）或仍保留原第一路司令或另调他职（粤主席）。三、六战区或吴代或以孙（连仲）调充。四、黄琪翔调远征军。”¹

2月5日是1943年的农历大年初一。两天之后，即在年初三（2月7日）的下午，蒋介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写下手令，确定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下午3点，这份命令即正式转达给了参谋总长何应钦、英国狄尔元帅和美国安乐德空军总司令。

2月9日晚8点，蒋介石约见陈诚，宣布如下任命：

- 一、（陈诚）仍兼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及鄂省府主席。
- 二、调孙连仲为六战区副长官，代理长官职务。
- 三、调黄琪翔为远征军副长官。
- 四、调施北衡为远征军参谋长。

¹ 《陈诚先生日记》p426。

- 五、调区寿年为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 六、调孔令恂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 七、决定（陈诚）先回（恩）施一行。
- 八、委座嘱于二十五号以前到达昆明，当即以孙（连仲）
调六战区代理长官职务转告孙。¹

遗憾的是，陈诚原打算让郭忏出任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的参谋长，但蒋介石不同意，于是让施北衡出任。这说明蒋介石因郭忏失守宜昌之事，一直对他耿耿于怀。可施伯衡也没能去成，最后确定萧毅肃将军担任此职。

2月10日下午3点，陈诚坐专机回到了恩施，“晚，约黄副长官琪翔及郭参谋长悔吾（郭忏）谈话，并告以任远征军经过及即准备赴滇人员。”²郭忏当然为此很失望，但又无可奈何。

2月14日晚，陈诚念念不忘尚在恩施被拘押的叶挺，特意约请黄琪翔、吴奇伟、郭忏、周岳（1895—1953）等一起和叶挺吃了一顿晚饭，算是暂别。³

吴奇伟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相当于接替了郭忏在枣宜会战时的职务。

叶挺提出，自己是否可以携家眷离开恩施，前往柳州暂住？陈诚不敢表态，答应去向委座求情。2月22日，蒋介石明确答复：不准叶挺离开恩施。陈诚亲自转达了委座的谕令，表示自己不能违抗委员长的命令，并加以劝慰。

此前，川军王缵绪部第六十七军军长余念慈（1889—1949）与粮食供应处主任陈楚良等人上下其手，盗卖军粮，中饱私囊，影响恶劣。案发后，王缵绪替余念慈求情，说余念慈是何应钦介绍来的人，须不看僧面看佛面，而且，何应钦也曾亲自给陈诚来电话，名义上是了解余念慈的案情，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陈诚不好办，

1 《陈诚先生日记》，p423。
2 《陈诚先生日记》，p424。
3 《陈诚先生日记》，p426。

结果就让余念慈逃过这一劫。

2月21日，第六战区粮食供应处主任陈楚良在恩施被执行枪决。陈诚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宣布粮食供应处主任陈楚良操纵粮食，执行枪决——具报大快人心。”¹

陈诚率领黄琪翔等人离开第六战区前，杀的贪官不止陈楚良一位。当时官场的风气太坏，将士们对此怨愤极大。他们说，我们在前线为国拼杀，他们在后方大搞贪污，太不公平。陈诚本质上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气愤不过，于是下令把监利县县长黄向荣、宜昌县县长武长青也“即予枪决”！

监利县县长黄向荣的罪名是用公款做棉花生意，省议员傅鹤琴向陈诚告发，于是被陈诚下令逮捕。省保安部的人与黄向荣关系不错，又念其初犯，且黄向荣用公款倒卖棉花也不是完全为了个人。当时地方财政实在紧张，黄向荣确有为县府谋福利的动机，所以不忍杀之。直到1943年初，陈诚要离开恩施时，省保安部才将拟判黄向荣十二年徒刑的报告送到陈诚办公桌上，以为陈诚大笔一挥“同意”，黄向荣的命就算是保住了。不料陈诚看到报告后大拍桌子，连声骂“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复：“即予枪决！”黄向荣触了霉头。就刑前，黄向荣掏出钢笔给妻子写下四句遗言：“杀我吓人，死不甘心。教我子孙，再莫做官。”随后，他也连声骂了“混蛋”。²

宜昌县县长武长青在换发鸦片牌照时，让商人先向县政府捐款，然后允许其先行无照经营。这种捐款，既有利于缓解县财政，官员们也确实从中捞到了好处。为此他请示过上级，即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1892—1979），获其同意。而且，武长青还是陈诚的同学。当时陈诚正在参加湖北省的县长会议，武长青在押恩施，法官请示如何处理？陈诚大怒：“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得迟疑。”据说武长青就刑前，也在大呼冤枉。吓得专员吴良

1 《陈诚先生日记》，p428。

2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43位战犯的后半生》。p46。

琛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去求签问卦，以求自安。¹

乱世用重典，这不是新鲜事。尤其在中国，各个时期被执政者冤杀、错杀者难记其数，况且，黄向荣、武长青们喊冤，对他们的处罚是否量刑过重？后人很难替他们再说些什么。他们的血和命，是被时代夺取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陈诚如此为廉政祭血，却没能为政府的建设起到多少作用。国民党的腐败已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3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口谕，陈诚将第六战区长官部交孙连仲代拆代行；湖北省政府交朱怀冰²代拆代行。这样，陈诚就与黄琪翔等人离开恩施，旋即抵达重庆。这时抗日战争已从战略相持开始转向战略进攻阶段。

黄琪翔回忆说：“1943年，因美军顾问史蒂威尔（史迪威）的建议，蒋介石组织远征军，准备进攻缅甸，并在印度的兰姆加（伽）地方设置训练机关，调训蒋介石嫡系军官，以便给予美式装备。蒋介石委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决定在昆明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³于是陈诚派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先行，自重庆飞赴昆明，先去昆明设营。

中国远征军分为两个建制，其一是1942年3月至8月，以卫立煌（未到任）、罗卓英（继任）为指挥官的中国驻印远征军，主要由美国远征军司令史迪威中将负责训练和指挥，正式的名称叫“中国驻印远征军第一路”；其二是1943年3月至1945年，以陈诚、黄琪翔指挥的中国滇西远征军，也叫作“中国远征军”。

来到昆明后，黄琪翔的首要任务是去寻找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的办公地址。他说：“由于云南是龙云占据多年的地盘，蒋介石

1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43位战犯的后半生》，p47。

2 朱怀冰（1892—1968），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毕业。作者曾经与朱怀冰之子朱邦复先生有过交往。听朱邦复先生介绍，乃父朱怀冰性格刚烈，在外做事任劳任怨，对待子女管束甚严，因此他们父子关系很紧张。朱怀冰于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等。1968年11月在台北病逝。朱邦复先生是电脑专家，为中文终端机、仓颉输入法、汉卡的发明人。由于其对中文电脑发展的诸多贡献，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华人誉其为“中文电脑之父”、“中文电脑疯子”。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生怕龙云不同意在他那里设立司令部，于是他就先派我到昆明去，和龙云商量，得到了他的同意，成立了长官部。我亦由第六战区的副长官，调充远征军的副长官。同时，美军将昆明作为空军基地，大量物资由印度运来，美军顾问也跟着前来，参加当时派驻云南的远征军部队杜聿明、宋希濂、钟彬等部工作。”¹

随同黄琪翔先行抵达昆明的随员，还有原第六战区长官部特务团（即警卫团）团长邱行湘。邱行湘回忆说：“陈诚急调副长官黄琪翔，并要我兼任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处长，赴重庆与黄琪翔同赴昆明设营。我们入滇设营，任务艰巨，首先是龙云不欢迎陈诚入滇，在滇蒋军对陈亦多顾虑。黄琪翔和我先去昆明，主要向龙云交涉长官部的驻地。做龙云的工作，首先必须与龙云的参谋长刘耀扬取得联系，争取龙的谅解。”

邱行湘还说：“为长官部驻地问题，我们提出三个方案，但都得不到龙的同意，最后，指定到滇缅边境的弥渡设营。弥渡虽远，倒有一个有利条件，这里原是曾养甫新建的滇缅铁路的督办公署。国内外电讯联系灵活。”

随后，陈诚和陈纳德一起飞抵昆明。机场上虽然欢迎者不乏其人，但真正从内心欢迎陈诚来云南的人，的确寥寥无几。因为谁都明白，云南是龙云的地盘。

昆明是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一年到头鲜花盛开。这里的民风非常淳朴，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过着自得其乐的日子。陈诚在昆明观察了两天，于3月5日利用早餐后的散步机会，和黄琪翔、柳克述等人谈了他自己的感受。陈诚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感此间环境之腐败与生活之舒适，最易使人堕落，嘱诸同仁速至前方准备作战，不可有汉高（祖）欲留关中之意。”²陈诚借此来训诫身边的高级将领，不可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陈诚本人内心来讲，他自己并不乐意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陈诚先生日记》，p434。

长官，但蒋介石让他去，他不得不去。陈诚在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报告中说：“当本年（1943年）一月间，本席（陈诚自称，下同）受命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时，曾一再向委员长陈述不能兼任之原因。如，第一，远征军行动之关系国际信誉极大，其责任远非其他战区可比；第二，各方对此多有怀疑，而一般意见亦难期一致；第三，本席能力有限，不能胜任。虽经一再坚辞，迄未邀允。乃于三月十二日奉命自重庆飞抵昆明。为欲明了前方实际情况，即赴滇西、滇南第一线实地视察，得知各部队均含有莫大的危机，什九如委员长手令之所指示。第一，就精神言，因滇境物价极高，官兵所受物质压迫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大，而各部队间之联系也较松弛。第二，就纪律言，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部队为多。第三，就战力言，一因各军之师管区远隔，兵源补充不易，而天候特殊，死亡特多；二因工价高涨，环境引诱，士兵潜逃颇众，遂使各部队战斗兵每连仅卅余名者，战力之可想而知。以上三点，固因事实上之困难，不能做过分之要求，但精神纪律关系军队命脉，本席认为必须遵照委员长手令，彻底负责纠正。旋于四月一日创办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调集各级干部，施与训练，以期振作精神，团结一致，恢复革命精神，达成远征使命。”¹

陈诚和黄琪翔抵达昆明后，他俩面对的第一个对手不是日军，而是有着“云南王”之称的云南军政大佬龙云。

龙云（1884—1962）是土生土长的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先后主政云南十七年，担任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以为云南是自己的地盘。长期以来，他与蒋介石相互戒备，属于面和心不合，因此蒋介石派了许多特务包围着他，生怕他与日本人勾勾搭搭。

陈诚对于龙云的情况自然明察秋毫，到了昆明之后，陈诚在多个公开的场合里，大谈特谈龙云主席对党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¹ 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之《陈长官在十二中全会报告词》。

称赞他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下终于把龙云哄开心了。

3月20日下午三点，龙云与陈诚举行会谈。陈诚在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今日下午三时，与龙云主任（时任昆明行营主任）晤谈约二小时。此次谈话，可使其对余来滇之疑惧完全消失，今后一切处置当较易也。然仍不能不小心谨慎。免误国家大事。盖余来滇，只能成功而不能有失也。”¹从他的心情中可知，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的。

在陈诚和黄琪翔的努力下，最终与龙云商量后确定的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地址，就是今天位于昆明西山区碧鸡街道办事处高峣村冷水塘1号今紫园内。龙云命令云南省财政厅长李培天，在西山脚下建造远征军指挥部。当时建有多栋别墅及1栋礼堂。²

期间，史迪威急于要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作战，而中方的行动未称其心愿，所以他向美国军部报告，说中国远征军迟迟未见集中，担心这样会贻误与日军作战的战机。美国当局在催促蒋介石的同时，并追问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为何中国远征军迟迟不能成军？

3月30日，陈诚召集黄琪翔等人商议，决定给宋子文回复：
(一) 中国远征军已经组建，只是对外尚需保守秘密；(二) 的确遇到了粮食缺乏的问题。

在中国远征军的长官部，根据分工，负责中国军队的训练、后勤保障以及与美军协调的最高长官就是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中将，与他对口的是美军“参谋联络组”组长窦恩准将。史迪威当时在印度指挥中国驻印远征军，而窦恩准将是史迪威的副官，所以史迪威派窦恩长期驻在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旁边，负责联络工作。³

组建中国远征军就是为了战略反攻日军做准备的，因此，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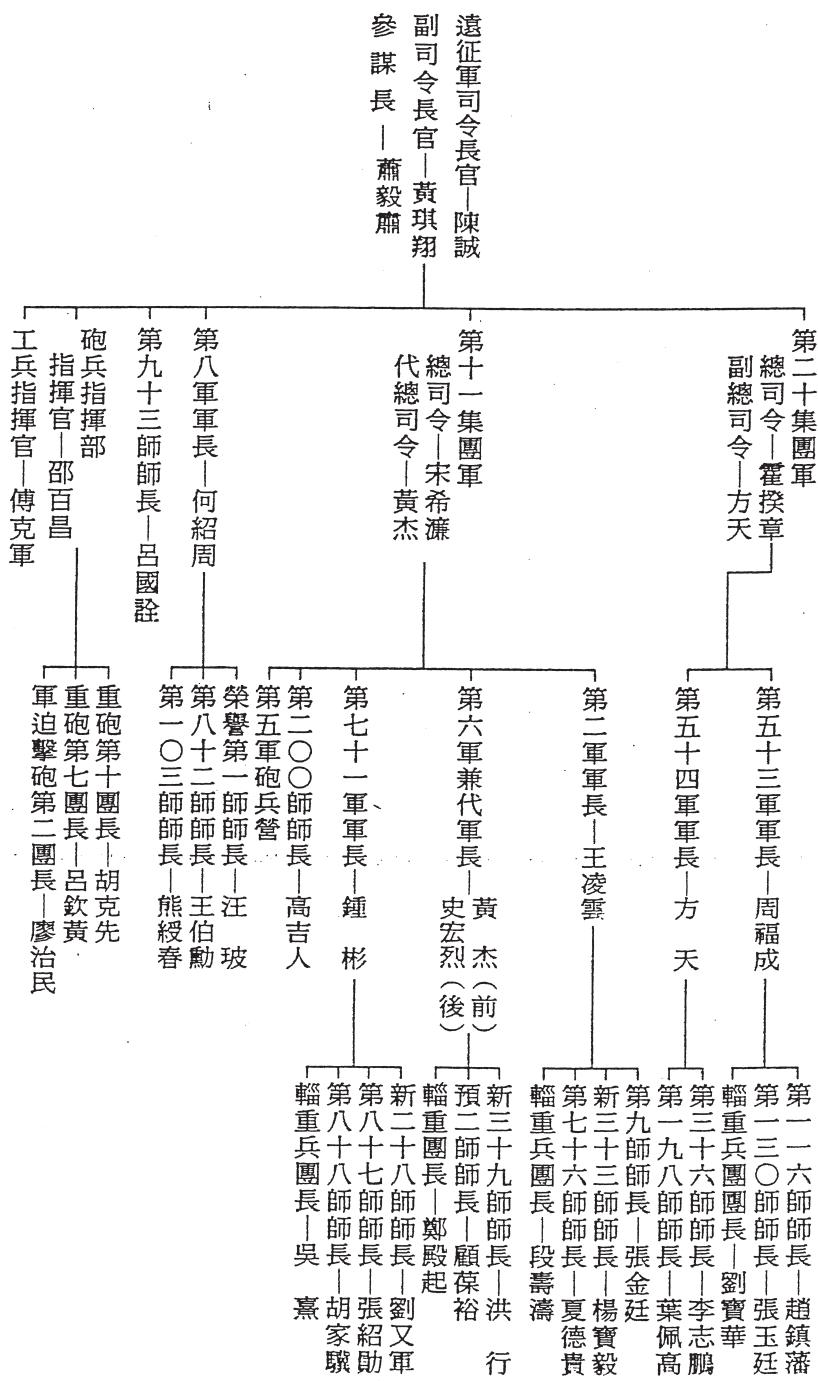
1 《陈诚先生日记》p436。

2 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旧址现存历史遗留建筑4幢，2009年8月，被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p288。窦恩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中文书名叫《当旗帜降下的时候》。窦恩回忆录中记载，以窦恩将军为司令的美国陆军Y部队四千余人，曾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同中国官兵一起亲临前线，浴血作战。美国国家档案馆专门设立了《窦恩文献》专项。

滇西中國遠征軍作戰指揮系統表

1944年5月



滇西中国远征军作战指挥系统表。

立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组织就需要有完善的计划，制定《中国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就显得格外重要。在编撰计划之前，黄琪翔不仅需要组织军事专家进行大量调研，还要负责与美方军事专家组协调，并听取他们的建议。

最终由中国远征军主帅、司令长官陈诚拍板定稿，黄琪翔等高级将领参与，并报经蒋介石批准，完成了《中国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远征军的装备水平，作战能力，为随后展开的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中国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概要如下：

一，编制：军之新编制为远征军卅二年（1943年）军暂行编制。本编制与卅一年（1942年）加强军编制不同之点，即军内炮兵营与师内步兵团系采用美方之建议（军炮兵营为野山炮12门；师步兵团辖步兵1、2、3营，高（平）射轻机枪两连，迫击炮1连，驮马运输1连，通信、特务、防毒各1排，卫生连1队；每步兵营辖步兵3连，机枪1连，战防枪、通信、补给各1班；每步兵连辖1、2、3排，指挥、迫击炮各1班；每排辖3班，每班有掷弹筒1，手提机枪1，轻机枪1，手枪1，步枪8）。

二，装备：依照新编制，每步兵团之主要武器为掷弹筒81具，步枪109支，手提机枪90挺，轻机枪81挺，高（平）射轻机枪9挺，战防枪9支，重机枪18挺，六公分迫击炮27门，八二迫击炮6门。此项武器除原有者外，不足之数由美械补充，计第一次加强装备计划，经军政部核定者为滇西11个师，滇南6个师，昆明3个师，拱卫陪都部队3个师，六战区4个师，共30个师。其他器具、器材、车辆等，均依此计划补充。

三，训练：为增进远征军各级干部之知识能力，特设驻滇干部训练团，内分步、炮、工、通信、电信、军医、兽医九科，及将校班、防空班、后勤队、泰岳缅语班、军需班各部门。截止卅三年（1944年），已经结业的人数为步兵科1184员，工兵科195员，通信科76员，电信科149员，

军医科 242 员，兽医科 175 员，将校班 181 员，陆空 54 员，后勤 76 员。其他泰岳缅语班 120 员，军需班 141 员，正在训练中。至于部队训练，则由本部巡回组担任，自卅二年（1943 年）九月一日开始，至卅三年（1944 年）二月，已陆续训练完毕。

四，人马补充：截至卅二年（1943 年）四月底，预定使用远征军之第二军（辖 9D、76D、新 33D）、第七十一军（辖 87D、28D）、第五十三军（辖 116D、130D）、第九十三军（辖 10D、新 8D、暂 2D）、第六军（辖 93D、39D、预 2D）、第八军（辖 82D、103D、荣 1D）及卅六师等。依照新编制，共应补充官佐 1284 员，士兵 59031 员，乘马 1113 匹，驮马 3489 匹。此庞大数字，补充自多困难，但为迅速完成反攻准备起见，不得不令排除万难，限八月底以前补充完毕。并计划各征兵管区另行编足一个补充兵团（每军一个团），于本（卅三）年十月底以前开到战区，追随各该军之后，随时递补。

五，除上述外，对其他应行准备事项亦均详细计划，分别进行，并曾开检讨会议两次。困难之点，固属甚多，然皆设法补救，陆续进行中。又关于远征军准备事项，共需经费 1340734438 元，经委座核列为 10 亿元，已准先拨 7 亿元，奉委座电令，应视以后实际准备程度、需要情形，再行核定。¹

按照中美协议，美国军事顾问在昆明负责分两期训练国民党 60 个师。这已经超出了陈诚、黄琪翔他们当初设想的装备、训练 30 个师的一倍。

347

中国远征军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抽调部队来云南昆明集中训练。第一期参加训练的有 12 个军总共 31 个师。史迪威通过美国国防部，调来一批美军教官。这些美军教官在“参谋联络组”的领导下，以五、六十人为一个组，分配到中国军队的军级单位

¹ 以上资料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

中去。在中国军队中，先是成立“干部训练团”，由下级军官，即尉级军官和军士组成。美军“参谋联络组”教授他们了解各种美式装备的名称、性能和分解、组合的方法等，并进行射击训练和小部队演习，再由经过训练的中国下级军官，手帮手地教授每一位中国的普通士兵。在中国远征军系统里，从长官部到集团军、军、师、团，甚至有些营级单位，都派驻了美军“参谋联络组”成员。

这些经过美国人训练的中国部队，后来全部换成了美式装备，迅速提高了作战能力。按照规定，远征军每个军配备了一个榴弹炮营，每个营有 10.5 公分的榴弹炮 12 门。每个师配备 1 个山炮营，每个营有 7.5 公分的山炮 12 门。每个步兵团有一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防御炮 4 门。每个步兵营有一个火箭排，配备“伯楚克”式火箭两枚，还有一个迫击炮排，配备“八一”式迫击炮 2 门。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 6 挺，步兵连配备轻机枪 9 挺、“汤姆”式手提机枪 18 支，以及“六零”式迫击炮 6 门，火焰喷射器 1 具。有史以来，中国部队从来没有配备过如此强大的火力！

战地后勤工作也极为出色。各军各师都配备设施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从军级前线指挥部到连级战斗单位，都配备了较完善的通讯、工兵和运输装备。中国军队不仅大开眼界，简直是欣喜若狂。因为大家都明白，那些残暴的日寇，即将要尝到他们自己酿制的苦酒。

可是，远征军中的许多士兵，文化程度较低，学习使用美军装备有些困难，便产生了消极的情绪。远征军便号召官兵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提高技能。身为副司令长官的黄琪翔，率先示范，主动报名考驾照。那时他已经 45 岁。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历史照片中，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正是他参加驾驶考试的情景。时间是 1944 年 3 月 4 日。原档的照片说明是“联军指挥部为远征军提供了驾车训练”。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培训，中国远征军即将开始反攻日军之际，陈诚因过度劳累犯了严重的肠胃病，蒋介石当即命令他回后方疗



1944年3月4日，远征军副司令官黄琪翔通过了驾驶考试。

养，至此他离开了昆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由卫立煌将军接任。

陈诚的肠胃病是旧疾，据陈诚日记判断，此次发作的时间约在1943年10月间。那时他的长官部在楚雄。10月，他尚在为准备反攻日军而奔波，时常从楚雄、昆明、大理间穿梭。10月27日，林蔚奉委座令，“由渝来昆（明）探疾。”

从10月27日至11月16日，陈诚没写日记。推测是林蔚于27日见到陈诚后，发现他的病情十分严重，于是强迫他住进了战地医院。林蔚是代表蒋介石来看望他的，而且与蒋介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陈诚住院期间，恰好英国蒙巴顿将军（1900—1979）来到昆明，

于是陈诚在医院里接见了他。¹

陈诚很想了解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情况，于是致电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说：“蒙巴顿将军号末抵昆，访弟于病榻，情极诚挚，随即飞印。此次彼在渝会谈经过，请择其可告者示知一二。至于此间准备进度情形，拟派琪翔兄飞渝报告并闻。昆弟陈诚。”²

蒋介石十分关心陈诚的病情，除了派林蔚前往昆明探视之外，又要求副司令长官黄琪翔随时报告他的病况。11月2日，黄琪翔从昆明电告蒋介石：“陈长官自号日（10月20日）至世日（31日）症状尚佳，惟睡眠仍感不适，每晚服少量安眠药，大便不畅，日施灌肠，便内镜检尚有极微积血液，检查血素80度，红血球4810.000，白血球4300。荣独山医师已抵。经各医师会商：精神未复尚不能离床起立，须五日后或可施行X光检查。详情另呈。”³

11月3日，蒋介石复电：“昆明黄副长官（琪翔）世电悉获：陈长官病状必须静养，勿烦劳等脑力最为重要。军前、后方军事，由兄负责处理。如有重要不能解决之事，可直接来电请示。总勿使辞修劳神，以期望早日复原也。中正手启。”⁴蒋介石的电令说明，从即刻起，黄琪翔奉命全权指挥中国远征军前、后方的所有事务。

11月16日，卫立煌奉命抵达昆明。11月29日陈诚坐飞机回到了重庆。由此可以推断，陈诚与卫立煌、黄琪翔进行工作交接的时间应该是在1943年11月的下旬。陈诚已经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岗位工作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这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短暂，而且，他已经完成了远征军从组建、训练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开始进入反攻日军的实施阶段。陈诚对远征军的贡献不可小视。

¹ 美英首脑于1943年8月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组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由蒙巴顿出任最高司令。蒙巴顿上任前先来到了重庆会晤蒋介石，然后在飞往印度的途中，降落昆明，看望了陈诚。10月末，蒙巴顿在印度德里上任。

²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13-122。

³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103-00047-015。

⁴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10300-00052-051。



1944年10月卫立煌、黃琪翔与魏德迈将军在保山。

陈诚在离开昆明前，还多次找黃琪翔等高级将领谈话，鼓励他们奋发工作，还亲拟了远征军的中心口号：

远征是
反攻的先锋，
胜利的开始，
正义的保障
和平的曙光。¹

351

黃琪翔说：“陈诚在远征军司令长官任内不久，便患了肠胃病，不能工作，蒋介石把他调回重庆，另派卫立煌来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我仍任副司令长官。”²

1 《陈诚先生日记》p478。

2 黃琪翔《我的自述》。

至此，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是卫立煌、黄琪翔和郑洞国三位将军。卫立煌、黄琪翔负责指挥滇西中国远征军，郑洞国指挥中国驻印军。卫立煌来到远征军后不久，就将远征军长官部推进到保山县马王屯，距离怒江前线仅七十公里，便于指挥。¹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说：卫立煌来到远征军后对待黄琪翔一直很客气，也很尊敬。

1943年的国际战争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法西斯轴心国的军队在苏联、北非战场以及中国战场屡遭失败，特别是美英军队在南太平洋上又恢复活力，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美国每月空运一万吨军用物资由印度飞越驼峰，运来装备中国军队，因此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能力大为加强。而相比之下，日军犹如困兽，南侵日军的补给线发生了困难，于是日本统帅部决心西进独山，企图动摇中国大本营重庆，然后从滇、桂线经过越南和缅甸，从陆路增援日军南侵的海军和陆战部队。同时，控制中印公路，切断盟军对中国大陆唯一的补给运输动脉。中国则反其道而攻之，命令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从东、西方向上夹击日军，齐头并进，尽快打通中印公路，以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有宋希濂为总司令的第十一集团军，霍揆章为总司令的第二十集团军，何绍周、李弥为正副军长的独立第八军，周福成的直属第53军等，总兵力有数十万人，师级以上将军就有百余人。

当时，刚从西南联大工学院毕业不久的高材生丁善懿，风华正茂，应征入伍后来到中国远征军，担任长官部译员，因此有机会整天跟随卫立煌、黄琪翔这两位司令长官，自然对他俩的工作和生活十分了解。丁善懿的父亲曾是黄琪翔的下属，两家有旧谊，因此丁善懿私下时称黄琪翔为“黄伯伯”。

丁善懿回忆说：“黄（琪翔）将军谦虚谨慎，以大局为重，团结部下，深受各方尊重，特别是与卫立煌及参谋长萧毅肃的团

¹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p288。

结协作，更加强了领导班子的统一意志。举一个例子，远征军的各军长、正副集团军司令，都佩戴中将军衔。他以（老资格的）副帅之尊，本来可以佩戴三星上将军阶的，为了突出主帅（卫立煌）的三星，宁愿自己也戴二星（中将）。诚不失为儒将风度也。”¹

黄琪翟能否晋升上将，自有其考核的标准，暂且不论，但他在军中受到普遍的尊敬，此言不虚。

丁善懿还说：“我在工作中得到充分信任和关照，委任为远征军译员队队长，因而能随侍左右，担任两位将军的翻译，经常参加盟军的高级军事会议。在一年多的相处中，黄伯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不仅具有高瞻远瞩、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而且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军旅之暇常把我喊去，纵谈古今，或赋诗，或对弈，有时也用英语对话。如果说（中共）陈（毅）老总、叶（剑英）帅是红军的儒将，那么国军中的儒将当推黄将军。”

¹ 北京市海淀区政协 1992 年 6 月版，《海淀文史资料选编》第 6 辑，丁善懿文章《北伐名将抗日英雄——纪念黄琪翔伯伯诞辰九十五周年》，p67。

十一、滇西大反攻

1944年4月，卫立煌、黄琪翔率领高级将领亲赴前线视察，准备横渡怒江，挥师出击日军之际，突然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日军由广西渡过金城江，侵占了贵州省独山。贵阳吃紧，重庆震动”；同时又传出：“汪伪政府派出代表，潜入昆明，怂恿龙云及其部属叛国投敌。”

蒋介石惊恐之余，立即给卫立煌拍电报，命远征军回师禄丰、楚雄一带，监视龙云，严防龙云部的“异动”。

蒋介石本来不打算令中国军队横渡怒江去进攻。早在1943年底，日军向印缅集结，向英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印度重镇英柏尔陷入危机。英柏尔若失守，不但中国将失去驼峰空运生命线，日军更可长驱直入向中东进兵，与德军会师，损害同盟国的战略，因此美国声称，如中国再不出动远征军，美方将停止对华的军事援助。而蒋介石在1944年3月27日致电罗斯福总统，曰：“中国对盟国之义务及应负责任，其一为目前应尽全力，保持中国战区现在之阵地，勿为敌寇突破。”“中国主力部队自云南发动攻势，殊不可能。”¹

在此之际，前线将领心急如焚，向蒋介石陈述不出兵对整个

¹ 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

抗战局势的危害。黄琪翔奉命亲赴重庆，向蒋介石当面汇报前线战局。蒋介石在黄琪翔等多位将领的劝谏下，并考虑了国际因素，最终改变观点，下达了强渡怒江的命令。

以下是黄琪翔将军到重庆汇报战局后，蒋介石 1944 年 4 月 25 日签发的电文，下令强渡怒江及指示渡江之战斗部署：

黄副长官来渝面报，已悉种切。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除陆上各种准备与战术技能，切实研讨，勿使稍有贻误之外。关于陆空联络之方法技能，除在主攻方面准备周到之外，而于左翼助攻方面，亦须有相当空军之配备掩护，第二、第七十一军各加强团之渡河前进，以及协助其各种动作，使之容易达成任务，故该方面各加强团之与空军联络及通讯，尤应特别注重与事先筹划。至空军如何配属，如何联络，望与友邦空军切商决定后详报为要。凡防守左岸部队之输送队及无线电台与工兵队等，除其少数必要留河前进，以及协助其各种动作，使之容易达成任务，故该方面各加强团之与空军联络及通讯，尤应特别注重与事先筹划。至空军如何配属，如何联络，望与友邦空军切商决定后详报为要。凡防守左岸部队之输送队及无线电台与工兵队等，除其少数必要留存者外，皆应配拨于渡江出击各部，尤其对于各加强团之兵额，必须由其他各师留守部队中拨补充实之外，应再各增加一个充实营，为其预备队，即渡江之各加强团，至少要有四个充实营，务使其能达成任务。至于各加强团之指挥官，必须挑选最有能力之高级将领负责指挥，派定何人指挥，亦希详报。并以此电转告霍、宋、方、梁、黄、施各正副总司令，及周、王、钟各军长，务希同心一德，各竭智力，克复腾龙完成使命，是为至要。¹

¹ 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蒋中正指示强渡怒江之战部署致卫立煌长官、萧毅肃参谋长电》1944年4月25日电文。



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们。前排为卫立煌将军。第二排左起：孙立人、邵百昌、黄琪翔将军、美军索尔登将军。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出击日军。强渡怒江后，卫立煌与黄琪翔一起亲临前线，指挥五个军与日军浴血战斗，至此拉开反攻日军序幕。

长官部翻译丁善懿回忆说：“那时的统帅部常常是彻夜灯火通明，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终于在1944年5月的某天拂晓，下达了强渡怒江命令。怒江对岸有五万多日军，盘踞在高黎贡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有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坚固工事，驻守的日军又擅长丛林作战的王牌军羊佑中将领导的第56师团全部，第二师团和第33师团大部，还有驻扎在密支那随时可增援的第18师团。战斗打响了，在美军第14航空队陈纳

德将军的空军配合下，强渡怒江成功，攻击部队越过惠通桥，直捣腾冲。与此同时，史迪威统率的盟军——英美联军和中国驻印军，也向密支那方向加强进攻，东西合击，使盘踞在缅北的日军本田第33军（下辖两个师团）和缅东牟田口第15军（下辖两个师团）受到牵制，不敢轻举妄动。日军驻缅最高指挥官边正三，在我军强大夹击攻势下，采取原地固守方针，使滇西远征军得以按原方案作战。”¹

1944年6月4日，远征军发起进攻，攻占腊勐街。6月6日，克阴登山。6月24日，第八军接替伤亡惨重的新28师，攻击龙陵。随后松山战役打响。第八军围攻松山，费时二个月又4天，我方战死者3800余人，共歼灭日军3000余人。²夺取日军重要据点松山，共歼日军达两个师团，远征军声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昂。

“经过长达六个月的顽强战斗，终于在十一月上旬结束了战役。根据9月9日重庆军委会发表的公报，截至8月5日止，敌我双方在滇西与缅北战役中的伤亡人数为：我军阵亡4980人，连同英美盟军共6147人；伤员11171人，连同盟军共14046人，失踪连同盟军共479人。而日军被击毙的就有21140人。”³

关于滇西战事的敌我双方伤亡情况，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余戈先生有专门研究。余戈所著《1944：龙陵会战》中引述1945年3月1日第11集团军参谋长成刚统计，我军伤亡39757员名，失踪3540员名。而陆军大学教员吴致皋经滇西战场调研后的统计为，我方伤亡37549员名，失踪3069员名。余戈先生依据日方资料统计，日官兵伤亡为16484人。⁴

黄琪翔直接策划、组织、指挥了龙陵、畹町等战役。

357

1 《海淀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丁善懿文章《北伐名将 抗日英雄——纪念黄琪翔伯诞辰九十五周年》，p68。

2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p309。陈一匡文章《松山攻击战》。

3 丁善懿文章《北伐名将·抗日英雄——纪念黄琪翔伯诞辰九十五周年》，p68。

4 三联书店2017年8月第一版余戈著《1944：龙陵会战》，p822。



1944年10月，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右二）、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代总司令黄杰将军（右一）在滇西前线与盟军指挥官研究作战方案。

据《黄杰日记》所载：1944年10月14日，黄琪翔率领黄杰、张振国以及美军西路士上校等赴前线视察87师、荣1师的前沿阵地，为进攻龙陵城作准备。这是远征军长官部高级将领的罕见之举，因为远征军2号人物出现在敌军步枪射程之内是很危险的举动。11点，他们来到指挥所。12点到达老东坡、风吹坡阵地，在战壕里瞭望文华坡、佛龙寺、双坡、三官坡等龙陵城郊的敌我阵地。下午，他们又赶赴南厂，视察正在开辟连接腾龙公路之叉道。这段公路很重要，一旦公路修建完毕，机械化师就可以径直推进到此处。

《黄杰日记》记载了当天晚上召开研判会的详细情况：

晚召成（刚）参谋长、齐处长、张主任等，陪同副长官黄中将，在（地）图上研判敌情：

- 一、据连日各方情报报告，敌军确实南移，陆续退至遮放，其三台山敌山炮十七门，亦已撤至畹町。
- 二、芒市之敌约1000人。
- 三、放马桥以北之敌约1000人。



359

黄琪翔将军（前）在前线。

四、双坡敌炮兵甚少。

五、长官部过去无高级官员前来视察，对敌我之情况当不完全明了。（黄琪翔）副长官本日亲临前方视察，当深知我军态势处于绝对优势。我之兵力火力，已强于敌十倍，

且龙陵老城已为我军占领，如进而攻之，龙陵一举可下啊，否则，仍将对峙胶着，坐视敌人后撤而不予围歼，实属坐失好机……

黄副长官于听取敌情研判后，提示下列各点：

一、以目前态势，我应对龙陵攻击。龙陵攻克，则推进放马桥之线，态势更好，国际听闻亦好。如万一不克，我亦可予敌以反消耗。

二、判断敌人无积极企图，故攻击时，我之兵力不可分散，应集中使用，对敌之整个企图，亦须确实侦察研究。

三、本日视察前方阵地，深同情我下级官兵苦战生活。我高级将领，应负责加以改善。

四、返（长官）部后，当向长官报告此间敌我情况，建议早日开始攻击。¹

1944年12月13日，黄杰将军从芒市乘飞机赴保山远征军长官部，于当日和次日两次“晋见黄副长官琪翔，请示攻略畹町作战计划。”²

12月15日下午十八时，黄琪翔打电话给黄杰，命令说：“八莫已攻克，准备进攻畹町。”

12月20日，黄琪翔命令黄杰部队要“迅速行动”。黄杰报告：“粮弹准备及通讯网架设须至25日前始能完毕。”

12月27日，畹町战役正式打响。战斗期间，黄琪翔坐镇保山长官部，直接参与指挥作战。

1945年1月6日，黄琪翔再次亲赴前线。当时气候恶劣，大雨磅礴，部队行进困难。黄琪翔当晚就住在黄杰部队于芒市的总部，指挥部队。黄杰在日记中写道：“十五时四十分，陪同副长官登扫线山顶，现地指挥我军各部队位置，及畹町周围地形，与当面敌情。”³第二天，黄琪翔当面给黄杰下达命令：“一、巩固

¹ 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民国七十一年七月十五日（1982年）版《黄杰滇西作战日记》p372—375。

² 《黄杰滇西作战日记》p543。

³ 《黄杰滇西作战日记》p643。

畹町与策应五十三军江南部队。第二军进入畹町后，应沿公路向西芒友方向追击。二、如芒友敌兵力强大，则第二军追击部队，暂时在芒友东北停止，守备阵地；如芒友敌兵力薄弱，则相机进占之。”¹

1月11日上午8时半，黄琪翔返回芒市。9时20分，远征军200师开始向敌大吉山攻击。12日，我军攻占大吉山敌据点，发现此处系日军的补给站，缴获大量物资，黄杰立即通过电话向黄琪翔报告战果。

畹町战役一直打到1945年1月20日，中国远征军占领了畹町老街、新街等地，并清除了畹町附近之敌，迫使日军向西南总溃败。畹町战役宣告胜利。

丁善懿还特别指出：“抗日战争以来，打如此硬仗，消灭这么多日寇的精锐部队，还是空前的。这一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

卫、黄两位将军。他们的功绩在抗日战争史上应占有辉煌的一页。”²这说明，黄琪翔不仅是滇西与缅北战役的参与者，也是主要的组织和指挥者，是卫立煌最重要的助手。

滇西远征军的节节胜利，极大鼓舞了东线中国驻印远征军和盟军。

1944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军节节败退。

10月25日，由魏德迈将军



1944年，郭秀仪与她喂养的两只小老虎合影于云南保山。

1 《黄杰滇西作战日记》p651。

2 《海淀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丁善懿文章《北伐名将·抗日英雄——纪念黄琪翔伯诞辰九十五周年》p68。

(1897－1989)接替史迪威，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由此美国也确定了扶蒋反共政策的方向。

魏德迈从印度飞过来，与卫立煌、黄琪翔举行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共商如何给予日军最后一击，实现东、西线的胜利会师。卫立煌和黄琪翔两人配合默契，给魏德迈唱起了一台双簧戏。

担任这次会谈的翻译丁善懿回忆说：卫立煌在会议上谈及往事哈哈大笑，说：“我们与史迪威将军合作，取得了消灭日军几个师团的伟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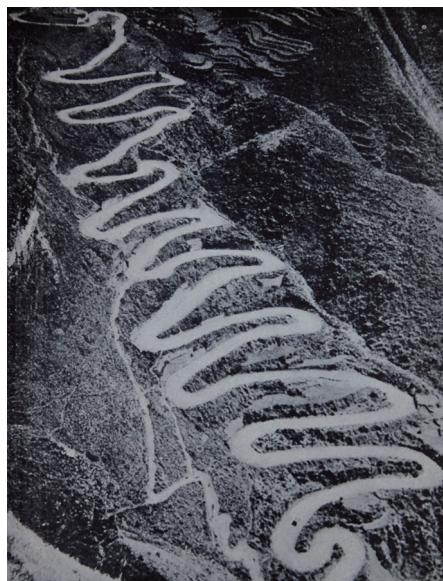
黄琪翔则微笑着说：“我们更希望，与您魏德迈将军的合作，能够迅速而顺利地打通史迪威公路，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¹

中国远征军这两位正副司令的话，听起来是在谈中美合作的成绩和目标，可让魏德迈感觉是绵里藏针，备受压力。中方希望美军再接再厉，全力以赴，迅速打通史迪威公路，以便援华物资尽快能够通过陆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因为“驼峰航线”与陆路运输的能力相比，毕竟是有限的，而且牺牲巨大。

随后，参谋长萧毅肃走到大地图前，开始讲解和分析敌我两军的态势。

魏德迈最后接受了中方将领的意见，表示“愿我们尽快地会师，喝胜利酒！”

丁善懿回忆说：“自此以后，又经过许多曲折，东线盟军一面围攻八莫，一面沿南坎公路向西疾进。这时统帅部下达了卫、黄两将军追歼残寇



1945年1月开通的中印公路。

¹ 《海淀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丁善懿文章《北伐名将·抗日英雄——纪念黄琪翔伯诞辰九十五周年》p68。



在中印公路通车典礼上。右起：孙立人、宋子文、黄琪翔、索尔登、卫立煌、陈纳德。

的命令，几十万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势如破竹，穷追不舍。12月11日攻克遮放，全歼守军。实现了大会师。”¹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第116师第346团沿着中缅公路西进，与驻印远征军新一军第38师在木姐胜利会师。

滇西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在盟军的配合下，全歼日军精锐部队五万余人，收复国土两万四千平方公里，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战争时期，随军的黄琪翔将军夫人郭秀仪大部分时间随着长官部的迁移而迁移，她在1943年至1945年间，主要在楚雄、保山等地生活，为战地服务。

¹ 丁善懿文章《北伐名将·抗日英雄——纪念黄琪翔伯伯诞辰九十五周年》p68。

1944 年间，中国远征军长官部驻扎在保山马王屯，黄琪翔夫妇也住在那里。郭秀仪有个惊人之举，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养了两只小老虎。小老虎的母亲，在轰炸中毙命，留下这两只嗷嗷待哺的小老虎煞是可怜，好心的战士就把它俩从战地捡回，送给了郭秀仪养育。

郭秀仪把这两只小老虎视若掌上明珠，细心喂养，时间一久，养出了感情。而虎头虎脑的小老虎，聪明伶俐，也十分惹人喜爱。

有一天，美军窦恩将军来访，看到已经被郭秀仪养得胖乎乎的小老虎，很喜欢，还专门跑回自己的住所取来照相机，为郭秀仪和小老虎拍摄了很多照片寄回美国。

窦恩将军奉命回国前，再次来到黄琪翔家，围着那两只小老虎转圈儿。谁都看明白了，他是想索要这两只小老虎，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窦恩与黄琪翔相处甚洽。黄琪翔为表示对友军的友好，劝说妻子郭秀仪把小老虎赠送给窦恩先生。郭秀仪虽然心有不舍，但还是依了丈夫的心意，把这两只小老虎赠送给了窦恩。

窦恩将军无以回报，就把一辆镶嵌有二颗星的中将专用吉普车，回赠给了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因为窦恩知道，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都喜欢开车。¹

1945 年 1 月 28 日，中印公路通车典礼在云南畹町城举行。中印公路原名为“史迪威公路”，就在通车这一天，它正式更名为“中印公路”。

中印公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合作修建的、自印度利多至中国昆明的国际军用战略公路，是举世闻名的军事运输线。日军为加紧入侵东南亚，于 1942 年 4 月末占领缅甸大部分

¹ 作者于 2010 年出版的《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一书中，说窦恩将军赠送给黄琪翔夫妇的是美军三星上将专用军车。当时，窦恩先生的军衔是准将，按理说他不可能使用美军三星上将专用的军车。可是，时在 2000 年间，郭秀仪曾亲口告诉本书作者，窦恩先生当年赠送给她的这辆车，就是美军三星上将专用的军用吉普车。郭秀仪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老人家已经是九十岁了，恐怕对此事的记忆有误。近读丁善懿先生的回忆文章《北伐名将·抗日英雄》，丁先生说：“窦恩为表示对黄将军的敬意和友好合作，回赠一辆新型吉普指挥车，车前还特意镶了两颗表示中将的金星。”



黄琪翔在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地区和云南西部，切断了中国与同盟国之间最后的陆上交通线“滇缅公路”。同盟国运往中国的作战物资，只能经喜马拉雅山空运，而这条航空线路，风险极高，人员的牺牲和飞机的损失甚巨，盟军因此受到极大限制。中美双方决定尽快修建中印公路，粉碎日军对中国陆路的战略封锁。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中印公路工程的重要性仅次于北非战局。中国人称之为“抗日生命线”。

这条公路全长 1730 公里，其中利多至畹町段路长 770 公里，路线经过印度东北部和缅甸北部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由美军工程兵部队配属中国两个独立兵团，并在当地民工协助下构筑。昆明至畹町段长 960 公里，路线基本上循沿原来的滇缅公路，由中国战时运输管理局滇缅公路工务局组织改建和抢修，美军派出工程兵筑路机械部队配合。整个中印公路工程分别从两端开始动工，然后合龙。从 1942 年 11 月利多动工算起，至 1945 年 1 月全线通车，历时 2 年零 3 个月。美方投入费用 1.5 亿美元；中方亦投入工程款 2 亿元（民国法币）。

白崇禧回忆说：“（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一月，雷多



1945年2月19日，在陆军后勤司令、副司令就职典礼上，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致辞。黄琪翔（右一）、卫立煌（右三）、切维斯将军（左四）。

公路（即史迪威公路）既已通至中国境内，因此陆路之运输大增，由油管输入之油量每月为五万四千吨，而驼峰（航线）之空运量每月亦增至四万六千吨。由于此项物资之供应，使我国得能装备二十九个美械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国军战力亦因之增强。凡装备美械之部队，由美军派遣干部，分别于昆明、桂林两地协助训练，成绩卓著。据马歇尔报告，贷于中国之物资，其价值已超过五亿美元以上，运输费用尚未计算在内，但以美国贷于其它同盟国之全部约值二百亿美元计算，则我国所得者实微乎其微。”¹

366

尽管国民政府只能得到美国“微乎其微”的贷款，装备美械之中国部队，却已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量，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驻印远征军和中国远征军会师后，中国远征军回国，新一军与新第50师南下，战争形势迅速得以改观。新一军先后拿下了新维、腊戌；新50师先后攻克了南渡、西保、南燕、皎麦等

¹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293。

市镇。新50师自从1944年渡过伊洛瓦底江以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直入600公里，毙伤日军3500余人。日军再无反攻之气焰，只可作自杀式抵抗。

中印公路建成以后，同盟国与中国之间恢复了陆上交通联系，作战物资得以通过公路运往中国内地。后因太平洋战争的发展，日军被逐出缅甸，中印公路逐渐失去了战略价值。

1945年3月，中美盟军准备向日军发起总反攻，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卫立煌调任陆军副总司令，随即蒋介石下令撤销远征军长官部，相应成立滇西警备司令部，以接替其职责。黄琪翔改任滇西警备司令部司令。

1945年4月1日，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成立¹，黄琪翔



由印度加尔各答经过阿萨密至缅北、再至中国昆明的中印油管，于1944年底建成。该油管口径6寸，绵延千里。从此飞机用油可不靠“驼峰航线”飞机运送。图为缅甸至中国的运输队第一次使用该油管。战后此油管即被废弃。

¹ 据台湾“国史馆”藏档案：目录统一编号125，《滇康边区设置主任公署及黄琪翔、周开动对滇边未定界意见书》，写明中印公路东段警备部司令成立于1945年4月1日。

兼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司令，黄杰（1903—1996）任副司令。黄杰等部队归属黄琪翔指挥，同时，将新组建的中央军嫡系部队荣誉第2师也由第五集团军改隶该部。

也就是说，1943年3月黄琪翔跟随陈诚前往中国远征军赴任副司令长官，八个月后，陈诚因病离职，卫立煌接任司令长官，黄琪翔继续留任，至1945年初，黄琪翔任滇西警备司令部司令，至此已长达两年时间。

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的任务，不仅是守卫中印公路，与此同时，中印间正在建设一条大型输油管道，而汽油是现代战争的“血液”，因此守卫这条“输血管”的责任重大。军委会授予该部职权范围上明确规定“本部之权责：针对当前情势，以维持地方自安，保护油管、交通为任务。”¹可是到了1945年的5月，当这条输油管道刚刚竣工，汽油滚滚而来的时候，抗日战争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这条“输血管”的意义已不再那么重要。

黄琪翔的主要任务，开始向社会治安和外交上倾斜。

他上任滇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后不久，昆明及云南各地发生多起袭击美军事件。原因是一些未经美军训练的中国部队，没有分配到美式装备，他们看得眼红，企图盗抢这些军械和美军财产，引发了枪击事件。美国人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则给黄琪翔、关麟征发来电报：“黄总司令琪翔、关总司令麟征：据美军报告称，在昆明及云南各地，常有警卫及其他士兵向美军射击并掠夺美军财产。若此种情事继续发生，（美军称）则拟将滇境所有美军撤退，并于撤退前焚毁一切供应中国之物资及财产等语。查所称各节，实属痛心，极仰该员彻查肇事经过，严加制止，重惩各违法官兵，并于电达后两日内，将处置情形经过详报为荷。若再有同样事情发生，则由该员负担全责。”²黄琪翔当然很无奈，只得派宪兵把美国军人和装备保卫起来，作被动防范处理。关麟

1 据台湾“国史馆”藏档案：目录统一编号125，《滇康边区设置主任公署及黄琪翔、周开动对滇边未定界意见书》。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05-122。



1945年8月，左起黄琪翔、张发奎、吴奇伟三位陆军部队的总司令于日本投降地芷江的合影。中央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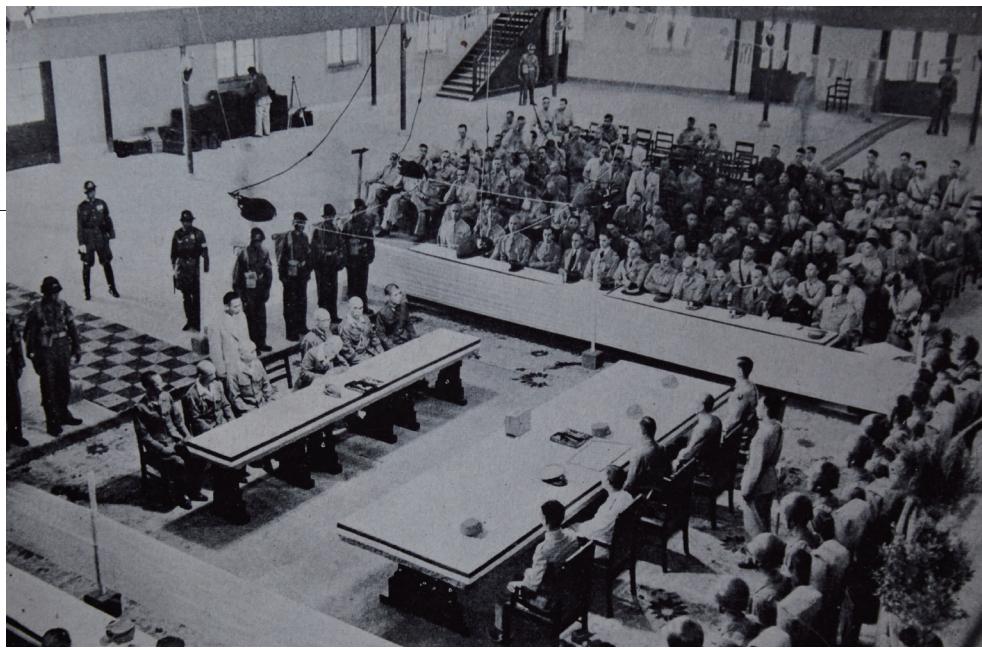
征（1905—1980）时任云南省警备司令。

1945年夏天，日本败局已定，但残余日军在冲绳等地的疯狂抵抗，导致了大量盟军官兵伤亡。当时美军已制订在日本九州和关东地区登陆的“冠冕”行动和“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出于对盟军官兵生命的保护，欲尽快迫使日本投降，并以此抑制苏联，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以加速战争进程。

8月6日和9日，美军对日本本土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不得不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21日下午4时，位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正式举行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了日军代表今井武夫的投降，史称“芷江受降”，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中国受降仪式之所以选在芷江这个无名之地，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偕高级指挥官代表签定投降书。中国由总司令何应钦，偕陈绍宽、张廷孟、萧毅肃在受降书上签字。109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向中国人民投降。

场，是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即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总部。

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就在此地，与中国陆军领导人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张发奎回忆说，1945年“8月23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了今井，在场的有美军麦克缪少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等人。我和其他三位司令在邻室目睹了全过程。今井一进门就向何应钦鞠躬。何应钦彬彬有礼，起立走过去同今井握手。”¹今井武夫（1898—1982）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是日军向中国投降的使节。在邻室目睹全过程的其他三位司令中，除了张发奎，还有黄琪翔、吴奇伟。黄琪翔时任滇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吴奇伟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

¹ 《张发奎口述自传》p303。

南省军区司令。

根据日本陆军乞降代表提供的资料，日军当时派驻中国的全部兵力总数为 109 万人。

当时，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还为张发奎、黄琪翔和吴奇伟这三位陆军部队的总司令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这三位将军都身穿军队的便装，相拥而立，笑逐颜开。这张照片的说明为：“1945 年 9 月 17 日，左起黄琪翔、张发奎、吴奇伟摄于日本投降地芷江。中央社。”¹

1945 年 9 月 10 日，张发奎奉蒋介石的命令，已经兼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并于 9 月 15 日与美军后勤司令奥朗特少将乘专机抵达广州。广州日军受降仪式是在 9 月 16 日进行的，张发奎代表国民政府接受了驻广州等地日军田中久一中将的投降。9 月 17 日这天，他在广州接见日军田中久一中将，商谈日军部队缴械的细节，并命令田中久一中将约束好他的部下。²

日本将军田中久一（1888—1947）曾任日本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1945 年 9 月 16 日在广州代表日本华南派遣军向国民政府代表张发奎将军乞降。张发奎并没有逮捕他，因为张发奎相信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不会自杀。随后，田中久一以战争罪行被盟国起诉，罪名成立，1947 年 3 月 27 日，在广州流水桥刑场被当众枪决。

黄琪翔回忆说：“1945 年远征军在滇西边境和日军作过一次战，便结束了战事。此后日军宣布投降，滇缅路的军事作用基本上消失，改成了一个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任我为司令。”³虽然“史迪威公路”失去了军事价值，但中缅之间沿此路进行的民间贸易从未间断，为推动两地间社会发展，尤其是改善战后

¹ 香港文艺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一版之黄琪翔、郭秀仪的影集《流金岁月》，p128。

² 见《张发奎口述自传》p310。这里有个问题，1945 年 9 月 17 日这天，中央社的照片确认张发奎在日本投降地芷江，有照片为证，可是张发奎自述当时身在广州，其中必有一说是错误的。待考。

³ 黄琪翔《我的自述》。



1945年4月15日，中美军官参加了在云南昆明举办的罗斯福总统追悼仪式。前排由左至右：何应钦、陈纳德 Chennault、龙云、麦克鲁 McLure、黄琪翔、澈维斯 Cheves、杜聿明、Sam Yuen。

人民的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远征军和滇西远征军在芒友胜利会师后，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在云南裁军。黄琪翔在1945年9月30日致军令部的报告中说：“当时因前远征军在反攻时大军云集滇西，迨畹町攻克后，所有游击部队及一部（分）国军复本命裁编，于是编余官兵大多滞留滇西地区兼之兵站。”¹

372

在全国，国民党的政府军几乎裁掉了三分之一。“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时，全国陆军为一二〇个军、三五四个师、三十一旅、一五〇个团、十五个营，至（民国）三十四年底，整编为八九个军、二骑兵军、二五三个步兵师，共裁减三十四个军、一一〇个师、二十一个旅、八十三个团、十个营，旅团营等小单

¹ 据台湾“国史馆”藏档案《滇康边区设置主任公署及黄琪翔、周开动对滇边未定界意见书》：目录统一编号125。

位均编入工兵师，以符合‘减少小单位，充实大单位’之原则。”¹最先被解散的部队是收复区的伪军和抗日游击队，“解散的方式，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受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²随后开始裁减国民党的正规军。

如此大量的官兵被迫转业或复员，他们一旦回归社会，军纪废除，人心浮动，再加上这些人吃惯了官粮，又没有谋生的手段，成天游手好闲，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远征军中的许多人改行当“油老鼠”，专门盗窃“输血管”中的国家汽油，破坏中印输油管线。

龙云还曾向何应钦反映：“昔董附近有新一军逃出之散兵游勇约数百人，在昔马、昔董、甘裨地等，作大规模清班组织，专收闲散军人及土司地之人，以英军为背景，使用该国之武器，阻我军事行动，妨害我之交通，破坏我之油管，打破我行政之机构，专挑拨离间，作大规模之劫取，最后威胁腾冲，恃将来事变发展，即在上述各地等。”何应钦将龙云反映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并请“饬黄司令与英方有关方面洽商，防范处理。”³

黄琪翔整天为应付这种事情大伤脑筋。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296。

2 《李宗仁回忆录》（下），p638。

3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13-204。

第七章 坚决不打内战

一、参与解决边疆问题

黄琪翔身为警备司令，此时又要扮演“警察局长”的角色，开始了猫捉老鼠游戏。他首先要求各兵站加紧遣散这些抗战老兵，同时又主动派员与当地政府联系，想办法安置那些家在云南的抗日游击队员，使他们安居乐业。对待自己手下的警备部队，黄琪翔则“标示：对军主严、对民从宽”的原则，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杜绝内外勾结的盗油现象发生，并要求士兵们日夜加强巡逻，保卫国家财产。



1945年3月24日，蒋介石在昆明与中国远征军、第一方面军将领合影。



1945年3月24日，蒋介石在昆明与黄琪翔合影。

黄琪翔所做的这些努力，很快见到了效果。在黄琪翔致军令部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到了半年以后的当年9月，“油管破坏而损失之油量日渐减少，截止现在，除油管本身间有工程上之自然损失外，所有奸徒盗油殆已绝迹。故本部任务已甚单纯，军事时间已过，今后问题重心似在边区政治。”¹

黄琪翔所说的“边区政治”问题，在他提交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做了几个方面的说明：

其一，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缅甸侨胞的返乡问题。

其二，云南边区，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幅员辽阔，民族复杂，社会混乱，历史上中央从未建立过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导致土司横行其道，无法无天，形成了封建割据势力。

其三，各民族之间的边界划分模糊，纠纷不断，而且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这种矛盾日趋严重，边民疾苦之声纷至沓来，而且这种边界的纠纷，常常会引发流血冲突，或可导致局部战乱。

其四，云南省政府距此地遥远，似鞭长莫及，而且其中的“关

¹ 据台湾“国史馆”藏档案：目录统一编号125，《滇康边区设置主任公署及黄琪翔、周开动对滇边未定界意见书》。

系特殊”，情况错综复杂。面对如此现实，黄琪翔说：限于军队的权责，本部“凡牵涉地方事件，未便过问”，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政令军令之机构，秉承中央政策积极治理之。”¹

黄琪翔的报告，向中央反映情况，不仅体现了他忠于职守，也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实在难能可贵。蒋介石接到这份报告后，也给予高度重视，当即批示行政院、外交部、军令部、海外部、侨委会等相关单位办理，进行相关操作。

缅甸系英国的殖民地，而身在缅甸的英军，与日军作战时败绩累累，而到了和平时期，他们又开始为非作歹，使用种种手段排挤和压迫缅甸华侨。前面龙云所反映的是，英军勾结新一军的散兵游勇，提供武器，使之成为“山大王”，做起了强盗的勾当。

1945年9月，黄琪翔前往云南边境小镇畹町视察，发现世居缅甸的华侨难民都拥挤于此，生活悲惨，于是他对此进行调查，然后给蒋介石发去了第3752号密电，曰：“职最近赴畹町等地视察，目击多数侨胞于抗战胜利后，从各地来畹（町），入缅后被英人指使山头人，以驱逐散兵为名，刑拷打并将衣物搜去，始逐回国境。侨胞进退两难，备尝痛苦，国族荣誉扫地。询究原因，或系护照无效。我政府事先未与英政府商妥办法，特电请饬。”²

9月27日，黄琪翔据宪兵20团第3营营长艾申报告：英驻九谷警察局来电，要求领回“贵国逃兵二十二名”。艾申营长前往九谷警察局带回了23名所谓的逃兵，回国后经询问，全系缅甸的华侨。“英方藉口逃兵名义，拒绝其回缅，并擅自拘捕，对我侨胞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黄琪翔再次给蒋介石发去了第28014号电报，“电请钧座设法解决而维（护）人权。”³

就黄琪翔第28014号电所反映的问题，引起了各方的重视。海外部、外交部、军令部、侨委会等机关与缅甸侨领许文顶先生

¹ 台湾“国史馆”外交部，卷名《南洋华侨复员及缅甸侨务案》，典藏号002-011107-0008。

²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13-204。

³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13-204。

一起，于 1945 年 10 月 23 日在海外部达成决议：

- (一) 请侨委会速设服务站于畹町；
- (二) 请外交部继续向英方交涉；
- (三) 请外交部派员赴畹町协助侨民回缅及调查本案情形；
- (四) 请外交部令新任驻仰光总领事速赴缅甸；
- (五) 请军令部速与英方解决处置在缅散兵游勇问题，以免英人藉口；
- (六) 请善后救济总署对于一时未能复原之侨胞，加以临时救济；
- (七) 请海外部设法利用新闻宣传，以促英方反省，而为政府后盾。¹

此外，黄琪翔报告云南边疆有关问题，也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行政院代理院长是蒋介石（1945 年 5 月 31 日至 1947 年 3 月 1 日），他在此份文件上批谕：“交内政部会商军令部研议具报。”行政院秘书处随即发出会议通知：“兹订于本年二月六日（星期二）上午九时在重庆神仙洞街九十八号本部驻渝办事处开会商讨”“拟其具体意见，届时派员出席”等语。

1945 年 10 月，黄琪翔在云南保山为此召开边疆会议，滇西各军师长以上的将领均出席，研讨与云南边疆有关的诸多问题，并将研讨的建议报告中央。

在行政院、外交部等中央机关的直接指挥下，成立云南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行政官署，借调尹明德先生出任行政长官。尹明

¹ 台湾“国史馆”“外交部”，卷名《南洋华侨复员及缅甸侨务案》，典藏号 002-011107-0008。

德¹当时是外交部的专员，长期从事中缅界务工作，深得众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表彰为抗战做出特殊贡献的各界人士。

1945年10月10日，黄琪翔和郭秀仪夫妇各自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勋章”。据《颁给胜利勋奖章条例》规定授予的对象是：“凡中华民国官民对于抗战胜利著有功劳者，得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授之，对于友邦人员之有贡献于抗战工作者，也得颁授之。”该勋章第一批总共授予的人数是98人，后续又有颁发，共计万余人荣获该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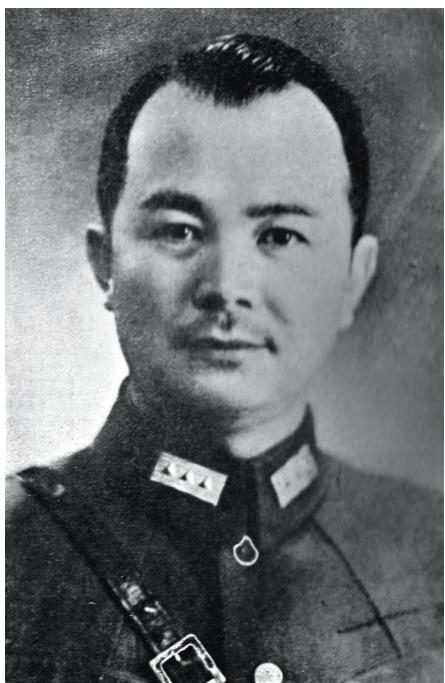
郭秀仪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是为表彰其在抗日战争中所从事的妇女救亡运动、保育战时孤儿、慰劳前线战士、救治伤兵等工作中，所表现出大无畏的奉献精神。

同年，黄琪翔将军在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之后，又“因滇西抗日战役卓著功绩”，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是军职勋章，也是极高的荣誉，仅次于“国光勋章”，而“青天白日勋章”首次授予的时间是1930年，至1946年授予“飞虎队”美国将军陈纳德和魏德迈为止，共授予173位。

1945年，美国政府授予黄琪翔“总统自由勋章”。这一勋章，以前翻译为美国“自由勋章”，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勋章，由美国总统一年一度颁发，与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并列为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受奖者不一定是美国公民。²勋章分金叶、银叶、铜叶，

1 尹明德（1894—1971年），云南腾冲县人。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正好碰上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卖国密约，悲愤之下，尹明德弃学回国。1936年5月起至1947年，尹明德均在外交部专员任上，一直办理中缅界务工作。1941年6月，参与中南界换文的全过程及奉命拟定中方所提方案。这次谈判，中国争回了班洪、西盟、猛梭及猛角、猛董西面的猛卡、拱弄、拱勇、芒回等地共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951年4月，尹明德特邀出席了保山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推举为保山专区政治协商委员会驻会委员，并担任保腾（保山——腾冲）公路修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2年12月尹明德被选为保山专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3年2月担任云南省参事室参事。尹明德先生一生都在为中缅界务研究呕心沥血，在我国对中缅界务问题的处理上，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71年11月25日，尹明德先生病逝于昆明，享年77岁。

2 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最早于1945年由哈里·S·杜鲁门总统创立，以表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杰出贡献的平民。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重新恢复该勋章，并扩充得奖对象，修改为授予在和平时期有杰出贡献的平民。



1946年6月，黃琪翔晋升陆军上将军衔。

黃琪翔的军衔。罗卓英与黃琪翔一样，被授予“中将加上将”军衔。

按照规定，“中将加上将衔”仅限于陆军中将。“陆军中将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者，因受员额所限，可先加上将衔，待二级上将空出缺额，再从中将加上将衔者择优正式晋升上将。”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数量极少，陆军功勋卓著的中将人数也最多，于是，陆军中将们只能排着队等着晋升上将。但规定中还指出，“中将加上将衔”的陆军将军，其服制与二级上将相同，俸薪仍照最高额支给，等同于上将。

实际上，在1946年3月，黃琪翔升任上将军衔之事已经开始运作。3月27日，陈诚拟就了相关报告，送何应钦。其内容为：

- 一、查陆军二级上将李烈钧病故，所遗官位拟请以李济深升补，或由上将衔余汉谋、陈仪二员中，圈定一员升补。
- 二、上将衔上有一缺（张发奎缺，如由余汉谋或陈仪升补二级上将，则上将衔有两缺）查本会中将高参黃琪翔、

中国人获金、银叶勋章殊荣者共79人，其中包括阎锡山、顾祝同、陈诚、薛岳、张发奎、卫立煌、孙立人等人。

因抗战有功而获全部三种勋章（青天白日勋章、美国自由勋章及第一批抗战胜利勋章）者，仅有23位，黃琪翔是获此殊荣者之一。

1946年6月13日，黃琪翔晋升为上将军衔。这批晋升者共有三位，即余汉谋、黃琪翔和罗卓英。余汉谋这次晋升为二级上将，超越了

广东主席罗卓英、本部次长林蔚，或久军符，战绩卓著，
备著勋劳，均堪升任。

何应钦核议后，亲笔签书：“陆军二级上将一缺，拟请以余汉谋升补；上将衔两缺，拟请以黄琪翔、罗卓英升补。”这样，在何应钦处，就把陈仪和林蔚排挤出升补的序位。

1946年4月3日，蒋介石批准了他们三人的升补报告。¹

由于入缅甸作战的中国部队已经陆续回国，加上美国的军援已大幅减少，而且有了更为便捷和低廉的海运进口途径，中印公路的作用已经不再像战时那么重要，1946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了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建制，黄琪翔卸任。1946年3月，黄琪翔依旧像战前那样挂名在军事委员会，当高参。黄琪翔夫妇一起返回了重庆。

此时，国共内战的烽火刚刚点燃，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而且内战的趋势已经日渐明朗。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1945年9月，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心控制东北。从全国各解放区调往东北的共产党部队达10.7万人，干部约2万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人（含4名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力量。随后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明确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这一指示成为东北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在国民党方面，1946年9月下旬，北平行辕集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共11个整编师7万人，从东

¹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33-075。

西两面沿平绥路向张家口进攻，并由东北保安长官部的一部兵力配合进出赤峰附近，企图将活动于该地区的解放军围歼。10月11日，傅作义占取张家口。12月2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北平行辕，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

黄琪翔说：“1946年夏天，我由云南回到重庆。此时国共关系表现微妙，一方面双方甲乙签订了《双十协定》，并根据协定进行和谈；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准备全面内战，并且实际上在边打边谈中。我当时以为战后的和平是必然的趋势，并且相信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力量，将帮助中国人民取得和平。我公开反对内战。我认为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将要成立。”¹

1946年11月15日，在一片喧闹声中，还都南京后的国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国民代表大会。这届大会的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又称“制宪国大”。黄琪翔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会议。

黄琪翔说：此前，“我在重庆会见了章伯钧，重新恢复了和‘第三党’的关系。当时各党派在酝酿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我希望能有‘第三党’方面提出我担任一名代表候选人。但章伯钧告诉我，‘第三党’代表候选人名额已满，希望我由国民党方面选出，将来政治上仍可以合作等语。于是我就和陈诚商量，要他在国民党方面设法提我为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得到了他的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提名我为代表。时年冬，我出席了国民党单方召集的国民大会。”²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大多数中国人都厌恶内战，真诚期望国共两党能够政治协商，携手共建联合政府。因为人民经历这八年的惨烈抗战，目睹过太多的流血牺牲和悲伤，真诚渴望建设和平的新中国，让人民过上真正安宁和自由的新生活。呼声最高的是民主党派人士，他们强烈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行使宪法，不应再搞一党专政。海外舆论也给蒋介石很大的压力。黄琪翔当然厌恶内战，他的主张很朴素，就是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

而在 1945 年 8 月，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举行和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¹，似乎是和平在望了。黄琪翔闻讯很高兴。

对于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黄琪翔真心欢迎，而且备受振奋。一次，在位于重庆较场口广东酒家举行的粤系高级将领酒会上，黄琪翔掷地有声地公开表示说：本人将“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陈铭枢等将军均在场。²但是在国民党阵营内，

¹ 1945 年 8 月 29 日至 10 月 10 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 43 天的谈判，于 10 月 10 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等 12 个问题。这 12 个问题中仅少数几条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

² 《黄琪翔传》p121。

反对行宪的势力也不小。白崇禧就是一个坚定的顽固派。他坦率地告诉蒋介石，不能停止剿共！他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余曾向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公建议，应先将共产党剿平，而后行宪。”¹

1946年3月17日，李济深、李宗仁、田汉等刚刚抵达重庆，而被捕的共产党人叶挺、廖承志等也刚刚被释放出狱，重庆各界为表示欢迎他们，举办了一场大型宴会。与会者有周恩来、博古、冯玉祥、张澜、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章伯钧等人。黄琪翔夫妇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

这是叶挺出狱后首次见到黄琪翔夫妇，赶紧过来打招呼。这对老战友劫后重逢显得格外高兴。²郭秀仪回忆说：“我们和恩来同志又见面了，十分兴奋，又颇多感慨，大家频频举杯，为这些为民主而奋斗的战士祝福。”³

黄琪翔在宴会上致辞说：“我从军队中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要趋于和平，保证内战不会发生。但后来一天天的事实证明与我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后来政协开会，给我以恢复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知道结果完满，停止冲突已成定案，心里转而高兴。虽然问题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内战已绝对不能了。过去官兵问我，现在是怕内战。今天内战停止，相信个人绝无不欢迎的。我衷心希望政协决议的实现。”⁴可见黄琪翔的内心，是多么渴望和平，坚决反对内战。黄琪翔还在其他场合里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302。

2 叶挺将军于1946年3月4日终于获得自由。他出狱后的第二天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说，“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遗憾的是：4月8日他们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3 《流金岁月》，p100。郭秀仪文章《真挚友情，永世难忘》。

4 《黄琪翔传》p121。

他说：中国人团结起来是一条龙，日寇当初那么强大，结果也被我们打败了。可关起门来时，会变成一群虫子，都想搞争权夺利，想唯我独尊，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打击异己，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利贪污腐败，还不许别人说真话，动不动就用暗杀、牢狱来镇压民主精神，实在是可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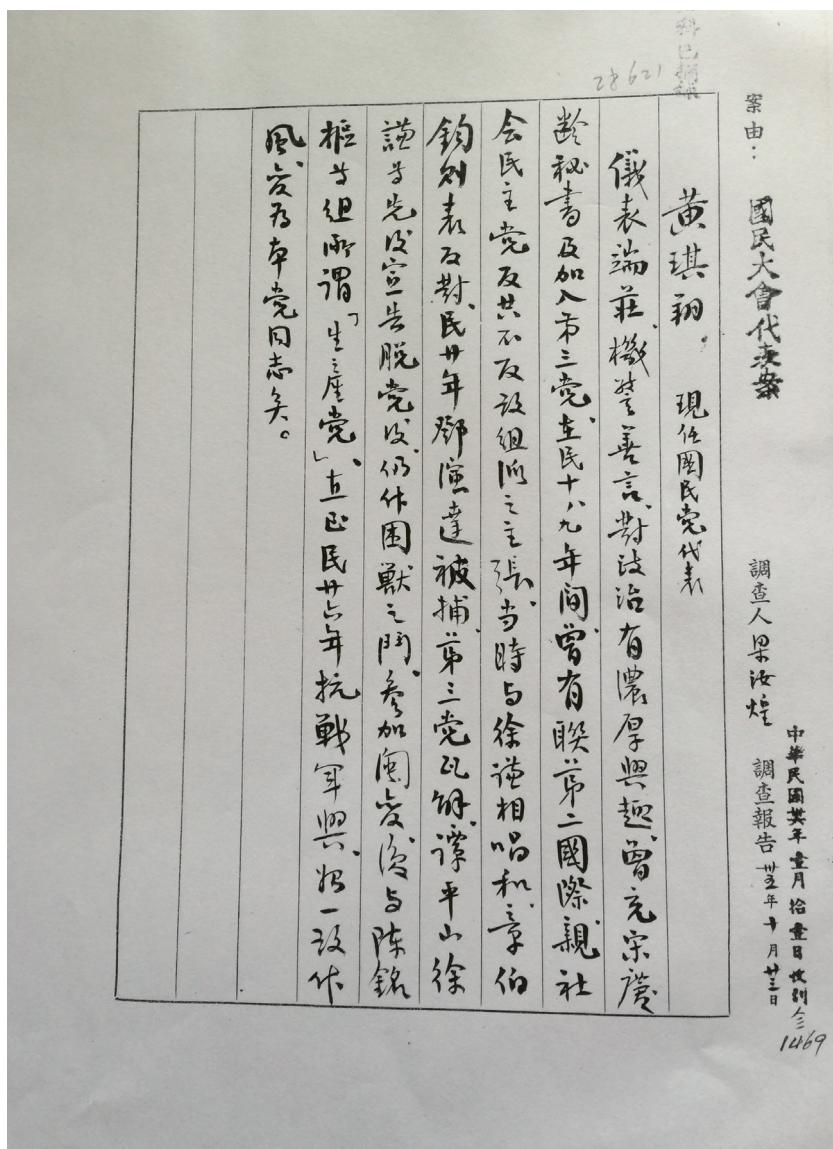
黄琪翔是国内著名的高级将领，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他的这些言论，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要陈诚去找黄琪翔谈谈，要求黄琪翔“以后不要乱讲话。”陈诚知道黄琪翔思想左倾，同情共产党，但他的确不是共产党人。黄琪翔痛恨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这与陈诚的思想是一致的。陈诚也痛恨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可是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陈诚必须维护蒋介石和党国的威望，于是他按照蒋介石的指令，要求黄琪翔约束一下自己的嘴巴。¹

黄琪翔因此很苦闷，也很无奈，所以他说：“与我的愿望相反，1946年我由云南回到重庆，发觉蒋介石在美国的鼓动下，决心要继续剿共，国共关系紧张，内战危机一触即发。我当时持中间路线政治立场，不可能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有正确的认识。尽管当时全国人民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联美反共政策，但我认为国共关系终将通过协商道路和平解决。我认为内战不是一件好事，以不参加为是，因此采取了逃避现实的态度，决心找机会再行出国。”²

1946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单，黄琪翔的名字在列。我们今天从台湾“国史馆”检阅到当年的“黄琪翔调查报告”。这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掌握的“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即“中统”对黄琪翔调查之后所形成的报告。调查人为梁汝煌，调查报告签署时间为1946年10月23日。这篇所谓的调查报告，其实是一篇非常洗练的人物散文，极具太史

1 《黄琪翔传》p121。

2 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四十三辑，p2。



1946年“中统”关于黄琪翔的调查报告原件。

386

公司马迁的文风。抄录于此，共赏其趣：

“黄琪翔，现任国民党代表”：

仪表端庄，机警善言，对政治有浓厚兴趣，曾充宋庆龄秘书及加入第三党。在民（国）十八、九年间，曾有联（系）第二国际。亲社会民主党，反共不反改组派之主张。当时

与徐谦相唱和，章伯钧则表反对。民（国）廿年邓演达被捕，第三党瓦解，谭平山、徐谦等先后宣告脱党后，仍作困兽之斗。参加闽变，后与陈铭枢等组所谓“生产党”，直至民（国）廿六年抗战军兴，始一改作风，变为本党同志矣。

黄琪翔回忆说：“国民大会闭幕以后，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我看到国共合作已经没有希望，内战将继续若干年下去，于是就想法重新远走外国。我本来想通过陈诚的关系到日本去担任占领军工作的，后来因为这个计划取消，没有成为事实。”¹

1946年底，黄琪翔夫妇回到上海。他此时仅在军委会挂一上将高参闲职，在上海过着比较悠闲的日子。

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开始对艺术发生兴趣。上海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妇女文化社，由骆剑冰等发起成立。作为上海名媛的郭秀仪，与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夫人，女议员田淑君等，都活跃在其间。

在上海，黄琪翔夫妇还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油画家李铁夫先生（1869—1952），以及他的入室学生陈海鹰。那时，李铁夫受李济深先生的邀请前往上海，住在上海华山路的一栋寓所里，而华山路与黄琪翔郭秀仪位于靖江路35号的府邸很近，在民主党派人士的社交活动中，他们夫妇与李铁夫相识了。陈海鹰此时正随伺他的老师李铁夫，跟着画油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陈海鹰结识了黄琪翔、郭秀仪夫妇。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曾向李铁夫求画——在艺术市场里，求画的意思与索画不同。索画就是要画，是凭交情而不用付酬金，而求画就是向艺术家买画。由于李铁夫先生已经76岁，很少画人物像，因此答应给他们画一幅静物画。在黄琪翔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履新之前，李铁夫不爽前约，将自己晚期的代表作品《果与鱼》交给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收藏。

国共和谈失败后，内战的烽火已经点燃，而作为国共和谈的

¹ 黄琪翔《我的自述》。

中共代表周恩来准备返回延安，与夫人邓颖超等一起来到上海，举办了一个酒会，意在与民主人士告别。举办酒会的地址，就在黄琪翔位于上海靖江路（今桃江路）35号的寓所内。这是郭秀仪与邓颖超自重庆分别一年后的重逢。

郭秀仪回忆说：“当时在我家周围，已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形势很紧张，但当天还是到了几十位客人，其中有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邓大姐委托我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开始我在厨房里帮助做‘自助餐’，吃饭的时候，我才从厨房里出来。这次聚会，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对于国民党当局决心发动内战，把人民又推向战争的灾难之中，感到愤怒；而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离去，又感到十分难过、惜别。但与会的人坚信：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会再相聚。我把我家仅有的一瓶‘三星白兰地’酒拿出来奉献给大家。我斟满了一杯酒，递给恩来同志，说，‘周公，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们这次回去，早日回来！’恩来同志接过来就干了一杯。他和大家亲切交谈，仍然是谈笑风生，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坚定信心，邓大姐则和我一起招待客人。我看他们非常从容、镇定。他们临行时，邓大姐一定要给我钱，说是这是代办‘自助餐’的费用。我推之再三，终于接受了20元钱。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聚会。”¹

郭秀仪说的那瓶“三星白兰地”酒，是美国窦恩将军赠送给她的礼物，珍藏了几年一直没舍得喝，从云南带到重庆，又带到上海，这次终于奉献了出来。当时国内海关对洋酒课税极高，所以这种洋酒市面上看不到，即使有，其价格也极贵。而聚会做自助餐的西式菜点厨师，是专门从上海西餐店里请来的厨师，而郭秀仪一直在厨房里现场指挥。

郭秀仪说自己家周围有特务。这些特务在监视黄琪翔？还是跟踪周恩来而来的？或者，是监视黄琪翔家的邻居，也未可知。黄琪翔家的门牌号是上海靖江路35号，对面住的是宋庆龄，李

¹ 《流金岁月》，p102。郭秀仪文章《真挚友情，永世难忘》。

两个‘老广’又搞到一块，忙向蒋介石建议，派黄琪翔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远远调开。”¹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快活林》刊登了一篇通讯“漂亮将军黄琪翔！”，公开披露黄琪翔将接替桂永清，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一职的消息。《快活林》是上海著名的报纸《新闻报》副刊，由著名报人严独鹤先生主编。

这篇署名林黛的文章，写得十分轻松有趣，透露出许多不为人知的趣事，兹录于此：

我国原任驻德中国军事代表团桂永清奉调回国代任海军总司令，军界名将黄琪翔将军则由战区副司令出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下月即将首途前往德国。在黄氏未膺此任之前，去年有一件逸话，当时已有人预言氏将出使外国。缘有后勤总司令黄振（镇）球，与黄琪翔俱为广东梅县人氏。黄振球一日晋谒蒋主席，闲谈之间，蒋主席笑道：汝叔仪表真是不凡，黄振球一时困惑，不知主席所指何人，唯唯答应，后知系言黄琪翔。盖二人同乡，琪翔资格老，主席因此误会。归去军部即遍告同僚。群要黄琪翔请客认为堂堂主席赞其仪表不凡，则必将出使外国矣。如今果然出使军事代表团长。

黄氏确系仪表不凡，素称漂亮将军，行伍之间鲜有如此美男子者。闻系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时代号称铁军之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黄氏即辅助张氏而任四军副军长，统率军队，颇具将才，为广东军人杰出者，后升任四军军长。一二八以后，以政治关系离国卸去军职，在德国学习并考察。蛰伏多时战前返国。八一三事件发生时，黄在上海统率大军抗日，张发奎率兵死守浦东，黄氏即为其副。浦东数役，悲壮之至，其时黄已为前敌副总指挥，身先士卒。是以日寇在金山卫偷袭登陆，包围我军，黄氏所在司令部亦被包围，步步进逼，千钧一发，黄氏几陷敌手，后化妆农夫逃出重围。

¹ 完颜绍元文章《暮境坎坷的黄琪翔》。



1947年黃琪翔夫妇在上海。左起：白崇禧、黃紹竑、黃琪翔、郭秀仪、白崇禧夫人马佩璋、黃紹竑之妹黃晋安、阚中华夫人。

由此黃氏作战精神，与其漂亮仪表不同，完全铁军化矣。

当时的后勤总司令黃镇球将军（1898—1979），也系粤军出身，蒋介石在接见他的时候，误以为黃琪翔是他的叔叔，所以闹了笑话。其实他俩是同乡，是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

蒋介石故意透露黃琪翔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一职的消息，意在笼络粤军出身的将领。因为谁都知道，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大家都想过太平日子，尤其不愿意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是耻辱，所以黃琪翔接任桂永清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是个美差。老朋友们都嚷嚷着要黃琪翔请客，就是这个原因。

黃琪翔郭秀仪夫妇性格开朗，热情好客。在他们即将离开祖国前的那段日子里，与各界朋友交往很频繁。1947年5月，白崇禧、黃紹竑以及以前相识的文艺界朋友，如田汉、杨瀚笙、洪深、

安娥等都聚集在上海，与黄琪翔夫妇劫后重逢于上海，相聚甚欢。

黄琪翔说：“此时蒋介石派驻德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1900—1954）调回国内，陈诚征求了我的同意，就向蒋介石介绍我总（充）任驻德军事代表团长。我于1947年6月出国，前往德国。”¹

行前，黄琪翔带着郭秀仪拜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是辞别。他们此时是近邻。

黄琪翔对待宋庆龄的态度，一向非常尊敬，称她为“先生”。

在上海时，宋庆龄若知黄琪翔夫妇回到上海，就会邀请他们去喝下午茶，叙旧聊天。有时，客人们给宋庆龄送鲜花或者食品，她也会转赠郭秀仪。

宋庆龄时常夸赞郭秀仪长得眉清目秀，而且性格好。她用上海话说：“黄太太长得老（很）漂亮格呀，脾气交关（特别）好！”

郭秀仪跟着丈夫的口气，人前人后也称宋庆龄是“庆龄先生”。

宋庆龄知道战败后的德国生活物资十分匮乏，就给他们夫妇准备了很多礼物，大多是吃的和用的，装了整整一个大木箱。²

宋庆龄叮嘱郭秀仪说：“听说柏林已经被盟军炸得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了，一塌糊涂呀。你们得多带点东西去，用得着的呀！”

庆龄先生的关怀，温暖了黄琪翔夫妇一辈子。郭秀仪在晚年依旧念念不忘，曾经说：“每当想起庆龄先生，我心里就内疚啊，因为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报答她！”

1947年6月，黄琪翔夫妇启程前往德国柏林之前，上海依旧很热闹，似乎没有受到国共内战的多少影响，黄琪翔夫妇的社交活动依旧频繁。6月9日下午，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四公子杜维新同时在上海丽都花园联合举办婚礼，黄琪翔和颜惠庆、潘公展、李石曾等作为杜月笙的朋友，参加了婚礼。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见《流金岁月》p21。

黄琪翔已经预见到，国共内战必将扩大化，战火的硝烟将弥漫到各地，所以他急切地想早一点离开上海，离开祖国大陆。他急于逃避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争。

正如黄琪翔所判断的那样，同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8个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蒋介石及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历史，即将结束，自此进入倒计时。

三、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黄琪翔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一职，早在1947年3月就已经确定下来。3月11日，时任驻德代表团临时负责人、外交部参事缪培基在柏林致南京外交部礼宾司的电报称：“黄（琪翔）团长来时，必携带之任命状，不称国书，祇由王（世杰）部长签名已足。”¹

关于出国后的薪酬和经费，黄琪翔先是给陈诚写报告，曰：“奉派为驻德联军管制委员会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以该团系属外交性质，应酬交际，费用浩繁。我代表团额定经费甚少，况职家属随行，教养需资，拟请酌予发给补助费若干，当否？敬请鉴核示遵。”

陈诚于5月5日签呈核议意见，并谨核拟办法于后：

394

一，黄团长于五月一日就职，其薪俸拟自同日起支，按规定在未出国前支国内薪，离国日起支国外薪。

二，现任团长待遇菲薄，拟恢复桂（永清）团长时期待遇，或另定上将给与。

桂团长待遇：薪勤费（美金）860元；特别费500元。

前奉核定中将武官，薪勤费（美金）860元；情报活

¹ 台湾“国史馆”“外交部”驻欧洲国家使领卷，典藏号020-100300-0141。

动费 400 元。

拟办：

一，即按现行给与为薪勤费 860 元，另酌加特别费 400 元。

二，或姑按桂团长待遇支给。

三，该团编制，现仅有副官缺一员，拟由黄团长遴选。眷属拟按规定补助一个人旅费。

四，拟准在 4000（元）美金范围内，电请毛副总司令代购汽车一辆。

五，拟请发一次临时费补助 4000（元）。

蒋介石于 5 月 31 日批示：“拟照准”。¹

黄琪翔出国的薪酬和经费的确不算多，是按照前任桂永清团长的标准执行的。而桂永清出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时候，只是中将军衔，而黄琪翔出任该职，已是上将。黄琪翔随即让已经身在德国的副团长缪培基按当时物价，购进一辆美国别克轿车，价钱是 5000 美金。黄琪翔似在窃喜，因为他远走德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和享受，而是为了躲避内战。他做好了出国前的一切准备，照例还要谒见委员长蒋介石，请示工作。

黄琪翔回忆说：

某天下午，蒋（介石）在他的南京官邸接见了我，和我做了一次简单的对话。

蒋：“辞修（陈诚）对我说过了，你去德国很好。……德国话还会说吧？……到那边要注意，千万提防不要上共产党们的当，……他们恐怕要利用你的。”

395

这种突如其来的“委员长训话”，使我摸不着头脑。沉默了一会，我答：“委员长请放心，我想那边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吧。”

蒋：“唔，还是要注意，他们是无孔不入的。……”

¹ 台湾“国史馆”“外交部”驻欧洲国家使领卷，典藏号 020-100300-0141。

又沉默了一会，我起身问：“委员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和辞修商量商量好啦。”

我告辞而退。¹

1947年6月26日，黄琪翔夫妇乘坐法国邮轮“安德烈·勒邦”号从上海启程去法国马赛，然后换乘火车去巴黎，再由巴黎前往德国柏林赴任，旅途费时需一个多月。

邮轮“安德烈·勒邦”号，法文为 ANDRE LEbon，我国曾译为“盎特莱蓬”号，或“晏打尼般”号。之前，外交部人事处专门致函法国驻华大使馆，为黄琪翔一行预定船票，并请求予以通行的照顾。预定的船票中有两张票是特等舱，为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准备的。头等舱位票三张，供黄琪翔公子及副官林允中等使用。

7月1日，这艘邮轮停靠香港码头。应香港崇正会馆之邀，黄琪翔离船登岸参加了该会馆为他举办的欢迎座谈会。崇正会馆会员，大都是广东同乡商人。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有50余位。

黄琪翔当天身穿黄色卡其布戎装，佩戴上将军衔，神采奕奕，款步而行，与每一位与会者亲切握手寒暄。他演讲说：“兄弟出身农家，幼年目睹农村生活困状及乡村一切落后情形，印象至深，故立身革命。自北伐至抗战二十年间，无时不在工作中。虽无伟大成就，个人并不失望悲观，盖从整个世界与整个中国而言，已有了显著之变化与进步。”他呼吁每一位同乡的商人，在安定环境下，都要开阔眼界，诚信经商，不要做投机倒把的勾当。²

下午1点，崇正会馆在大同酒家举行欢迎宴会，李大超、黄令驹以及崇正会馆的会长廖晖宸等作陪。下午4点宴会结束，黄琪翔回返邮轮。

7月3日，黄琪翔乘坐的邮轮刚刚离开香港，柏林华侨与驻

1 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四十三辑，p3。

2 1947年香港《崇正会刊》第五期。

德军事代表团临时负责人缪培基发生冲突，100多位华侨在柏林集会，“互诉彼等之痛苦，对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代理团长缪培基博士之不法行为，痛加指责。”他们“追念前任团长桂永清德政之余，咸盼新任团长黄琪翔将军早日履新。”这一新闻出现在1947年7月5日《申报》头版。黄琪翔此时还在邮轮上，看不到报纸，全然无察。

同船前往欧洲等地的人还有不少，比如民国政府时任驻埃及大使何凤山夫妇，时驻葡萄牙公使王化成（1903—1965）夫妇，时任新闻局驻法国办事处处长汪公纪夫妇，还有叶公超的秘书王之珍夫妇。王之珍后来成为台湾“外交部”的次长。

何凤山（1901—1997）是一位资深外交家，被联合国誉为“中国的辛德勒”。1938年至1940年间，何凤山出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共向约4000名被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逃离了死亡。¹

何凤山写过一本回忆录《外交生涯四十年》，其中有一节“黄琪翔将军”²，专门写他在“安德烈·勒邦”号上与黄琪翔的交往。他说：

船上有一位令人注目的人物，就是我国驻德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将军。黄某曾一时为军界中的风云人物，后以思想问题而未蒙重用。这次往德国担任代表，听说是得力于当时陈诚参谋总长的推荐。我在国内并不认识这位将军，在船上才彼此见面。他白白胖胖的相貌，中等的身材，不大像一名军人，颇有几分儒雅气。他的太太面目清秀，打扮的如古典美人一样。她与绶荣（何凤山的夫人）过从颇密。

我与黄将军闲来无事，多坐在甲板上聊天，古今中外随便乱扯，然而一谈到时局时，他老是翻来复出的一句话：

1 2001年1月23日，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他的名字被刻入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

2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何凤山著《外交生涯四十年》，p230。

“我们需要和平，不能再打了！”这与当时共产党宣传的口号恰相符合，但我不相信他是替共产党说话，所以再三的请教，希望他能说出一篇大道理来。哪知他的答案仍是上面的那一句，使我听了如坠五里雾中。其后他到了德国，圣诞节时还寄来他夫妇两人的照相贺片。

从何凤山以上文字看，黄琪翔内心郁闷，正为内战焦虑。何凤山系外交家，长期飘零国外，惯于听候政府号令，而对于战争残酷性以及战争将给人民所带来涂炭的认识，远非军人黄琪翔将军的认识深刻。这是他们的分歧点。加上黄琪翔与何凤山是初识，他自然不便向何凤山倾诉肺腑。

7月19日，黄琪翔在邮轮上致电外交部欧洲司长尹葆宇，告知自己将于7月底抵达马赛，并请求“我驻马赛领事馆於该轮抵达时，派员前来照料。”外交部随后致电马赛领事馆要求派员照办，电文中称“黄琪翔将军一行七八人”，¹包括了汪公纪夫妇。然后，黄琪翔一行从马赛坐火车去柏林。

黄琪翔回忆说：“8月初，我们到达柏林。在车站迎接我们的有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另外还有美军总部交际处负责人。美军总部交际处为我在西柏林住宅区安排了一所有现代化设备的住所。过了几天，我前往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拜会了苏、美、英、法四国军队总司令。当时参加会见的有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美军总司令格莱上将和政治部顾问墨菲先生，英军总司令罗伯逊将军和法军总司令某等。这是一种照例的外交仪式，是我到德国后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管制委员会打过的交道。”

他还观察到：“中国代表团的所谓工作，不过是搜罗各种书报杂志材料，加以综合改写，作为情报，按月寄回外交部和国防部报销了事。代表团成员的待遇优厚，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小洋房和小汽车。他们闲来无事，经常开支公款，到处旅行，优游岁月，

¹ 台湾“国史馆”“外交部”驻欧洲国家使领卷，典藏号020-100300-0141。



1947年8月初，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乘火车抵达柏林后，走下车厢。

享尽‘洋大人’的洪福。”¹

黄琪翔于当年9月2日在柏林给外交部长王世杰、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来电称：“职偕参事繆培基、团员屠仁昶、副官林元稜（允中）於八月三十日向管制会四主席（美、英、法、苏）呈递信任状。”²

二战后，战败国德国领土遭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和瓜分，在柏林则以布兰登堡门为界，把市区分为东西两个区。东柏林由苏军控制，西柏林由美、英、法控制，然后由美、英、法、苏四国组成管制委员会，来协调处理东、西柏林的事务，行使最高权力。这个管制委员会主席由四国军队总司令轮流担任。除了美、英、法、苏四国之外，中国、加拿大、比利时、波兰、巴西、卢森堡、捷克、南斯拉夫、丹麦、挪威、澳洲、印度、希腊、南非、荷兰

¹ 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四十三辑，p4。

² 台湾“国史馆”藏“外交部礼宾司收电宾36字第547号”。



1947年8月初，欢迎团长黄琪翔郭秀仪（右二）的茶话会。

等15个盟军国家也派驻了军事代表团。

管制委员会分配给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的人数是“限定十人”，因此在中国代表团内，除团长黄琪翔之外，外交部派缪培基担任副团长，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等单位派出了三位校级军官为团员，其余五六位为工作人员。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在西柏林，由美国负责生活供应。

前任团长桂永清离任回国后，中国代表团的业务全由参事、副团长缪培基负责。缪培基原是国立武汉、中山大学的教授，抗战时进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随后加入外交部。此外，团员还有参事汪孝熙、叶俊恺（外交部），军事代表有中校武官杨国柱、屠仁昶，少校韦曜琪、杨毅雄（空军），上尉有黄琪翔副官林允中以及钟前功等人。武官杨国柱的夫人叫杨懿熙，是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杨永泰（1880—1936）的女儿。

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再见柏林时，已是今非昔比。黄琪翔说：“在这期间，我走遍了东、西柏林各大城市，它们大都经受过不同程

度的战争破坏，断井颓垣，给人以满目荒凉之感，其中除柏林被彻底破坏，几乎令人不能认识之外，东德的文化古城德勒斯登和西德莱茵河畔的科伦损害特重。希特勒法西斯给德国人民带来的重灾大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德国经济仍未恢复，城市居民每天仅靠占领国供应的 125 克面包勉强维持生命，一根香烟成为莫大的追求对象，一磅黄油抵上了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当年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在外国人面前，德国人的威风彻底扫地。”¹

据缪培基回忆：“我与黄琪翔团长过去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委员会在衡山开设游击训练班，以叶剑英、黄琪翔为副主任。我以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由韶关赴衡山拜访训练班主任陈辞修（诚）将军，接洽公务时，承陈诚将军介绍与黄琪翔副主任相识，同进午餐。第二次是一九四二年盛夏，我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充视察室主任，奉部长朱家骅先生派赴湖北临时省会恩施，调查党务。第四（六）战区长官陈辞修上将特设晚宴款待，并请湖北省显要李书城、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作陪。战区副长官黄琪翔亦在座。次日下午，黄副长官邀我同往励志社洗淋浴。他问我：‘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了，你以为如何？’我答：‘党的前途布满荆棘，困难重重。有无希望，全靠我们党员自己。’他即缄默无词。”²

黄琪翔下车伊始，“在团务会议上即声言：‘我这次来德是避难。’”所以在缪培基的眼里，黄琪翔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前途很不乐观。缪培基说：“黄琪翔身材魁梧，上唇留小胡子，军服笔挺，出入盟军社交场合，被誉为‘美男子’”。³

中国军事代表团的办事处，设在西柏林波毕斯基大道 62 号。这是德国的一座民房，美军占领后，拨付中国使用。美军还提供

1 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载《文史资料选辑》，p6。

2 缪培基《驻德军事代表团始末记》，刊登在 1987 年 1 月《中外杂志》第 41 卷第 1 期，p126。

3 缪培基《驻德军事代表团始末记》，刊登在《中外杂志》，p126。



402

黄琪翔夫妇摄于德国柏林。

了另外三处住宅，其一是中国团长官邸，其一是参事住宅，另外一处是代表团成员的集体宿舍。这些地方设施齐全，应有尽有，都由美军免费提供使用。“代表团所需食物及日用品分别向美军粮食店和杂货店购买，使用美国军用钞票。另需向美军财务处按规定价格兑取德国马克（由管制委员会在俄占区印发）为支付代

代表团德籍司机、书记、杂役薪资之用。”¹

黄琪翔最先接触到的德国当地人，均是代表团雇员，他们大多是德国青年人。这些人的经历都非常凄惨，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亲人死于战争。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憎恶希特勒，憎恶纳粹组织，正是因为这些战争罪魁把德意志民族推进无底的深渊。黄琪翔说：

“战后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是降低了。以食物来说，战前德国人每天从食物里得到三千加路里的热量，可是现在最好的享受只能有两千加路里、一千八百和一千六百加路里三种。”²

大多数中国侨民生活在苏联占领区内的东柏林。为示礼貌，黄琪翔刚一上任就让缪培基陪同去拜访苏军驻德司令部，欲与司令官建立友谊。约定的会晤时间是下午三点，黄琪翔准时赶到，却始终见不到苏军司令官的踪影。等了半个小时，其副官出面相告，说苏军司令官的座驾抛锚在路上，谅不久即到；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不露面。黄琪翔只得留下名片，黯然返回。

第二天，黄琪翔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料想苏军会回电话，表示歉意。中国驻德代表团是国家使节，黄琪翔本人又是上将军衔，大家出门在外都应该讲礼仪吧？可是左等右等电话就是不响。可见弱国无外交，在苏军眼里，中国什么都不是！黄琪翔受到了蔑视，又很无奈，只得从此不再与苏军司令官联系。

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双十节。黄琪翔在驻德代表团官邸举行招待会，招待盟国代表，但来者寥寥。可见不光在苏军眼里，而是在整个盟军的心里，中国轻如鸿毛。

黄琪翔是这样介绍自己在德国柏林的工作：“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系国民政府派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一个机关，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是由苏、美、英、法四国组成的。中国政府应邀派出军事代表团，原以为第二次大战中，中国曾经对德宣战，

¹ 缪培基《驻德军事代表团始末记》，刊登在1987年1月《中外杂志》第41卷第1期，p121。

² 黄琪翔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所言。见1949年1月7日香港《文汇报》“黄琪翔谈柏林冷战”。

希望在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中捞一点油水，以补偿我国所受的损失。因此派出桂永清去当代表团长。后来事实说明，关于战后管制德国问题，完全由苏、美、英、法四国包办，其他派出代表团的国家无权过问，也无事可做，因此蒋介石决定把桂永清调回国内任用。我到了柏林以后，除了按月向国防部汇报当时的国际情况作为例行公事外，没有做什么事情。我经常在德国收买古董书画，或外出旅行来消磨岁月。”¹

在清末时，中国曾遭外国侵略，德国就是侵略者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皇城北京后大肆抢劫，清宫无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这些外国强盗把抢盗而来的中国文物，作为战利品带回他们各自的国家；此外，欧洲驻华使节在晚清和民国间，也会购买中国文物带回国，以示纪念；一些中外古玩商人，也曾将中国文物贩卖去了欧洲。²黄琪翔说自己闲来无事，在德国收买古董书画，指的大致就是这些中国流失文物。

黄琪翔最关心的事务还是德国华侨问题。当时留在柏林的华侨不到一千人。黄琪翔说：“一般来说，苏军占领区的生活要安定一点，几百个华侨有三分之一住在苏占区，他们的生活比其余住在美、英、法占区的都要好。苏占区人（口）多一点，资本家都在美占区。”“这几百个华侨确实是比德国人的待遇要好一些，但好处也许只有一点可以指出，就是德国人民除了马克以外，不许存有任何金、银、英镑或美钞等外汇钱财。而华侨呢，同其他外国人一样，可以存有自己需要的外汇钱财。比较起来，在苏联管制区内的华侨，又要比美英管制区内的华侨要自由得多。在苏管区的华侨可以来往各地做做水客（生意），赚些钱。但在英美管制区的华侨，这种做水客的机会就少了些。这批华侨多数是‘青田小贩’之流，除了做水客之外，也很少有什么更好的求生技术。”³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时至今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共有1000万件左右。这一数字相当惊人。实际上，这些数字都属于粗略的估算，并不科学，因为从来就没有找到一种科学而公认的计算方法，对此进行统计和评估。

3 摘自1949年1月15日香港《新生晚报》，黄琪翔接受记者的采访。



黄琪翔（左）郭秀仪（右）与副团长缪培基在一起。

所谓“青田小贩”，指的是以青田为中心的浙江商人。

黄琪翔上任之后，处理过二件比较棘手的事，都跟这些华侨做黑市有关。

其一是德国华侨状告代表团副团长缪培基的案件。

华侨在黑市交易中，把中国江湖恶习也带到了德国。他们内部自成派别，相互斗争。1946年桂永清团长离任至黄琪翔1947年到任，其中有一年多时间，代表团工作全由缪培基负责。缪培基曾在参与调解华侨内部斗争时，不慎得罪了其中一方，于是旅德华侨工商总会负责人在黄琪翔到任之际，即开始揭发缪培基的所谓“罪行”，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他们揭发缪培基的“恶行”，归纳起来主要有几条：1，调戏、强奸华侨某人的女友。2，肆意享受，“借用外势诬陷侨胞”。3，撕毁“主席肖像”等。因此外交部、国防部均来电，要求黄琪翔团长查处。

其实，这些人指控缪培基所谓的“罪行”非常滑稽可笑。比如，说缪培基调戏、强奸华侨某人的女友，却并非该女子本人所控告。而且，他们提供的证据仅仅是该女子曾几次到访过缪培基的住所。甚至，缪培基在社交场合与人行吻礼，脸上留下对方的口红，也

被指责是“无耻轻浮行为”。关于撕毁蒋“主席肖像”事件，发生在桂永清任内，当时苏占区的苏军大规模清理黑市，扣押华侨货物，于是发生了撕毁“主席肖像”的事件。桂永清团长闻讯后当即向苏军抗议。苏军派员进行调查，结论是“犯法华侨自毁壁上主席肖像”，也已经结案，与缪培基无关。还有，由于旅德华侨文化水平很低，误译德语，引发误会，如缪培基在信函中说“一些”，他们误读为“匪众”，等等。

黄琪翔经过调查取证后，于当年11月向国内提交了专门的报告，逐项予以解释和批驳，还缪培基以清白。同时，黄琪翔还不亢不卑地致信“闹事者”旅德华侨工商总会，言明“以上请查照，并本着亲爱团结精神，遇事合作，勿遗笑外人，为要！”¹

其二，营救被捕的奥地利华侨。

1947年10月，国府参军郭德权少将请外交部营救在奥地利被捕的华侨马熙程先生。马熙程是他的妹夫。郭德权少将是总参的能人，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历任参谋本部高参、驻俄国武官、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军委会外事局办公室主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员等职。1941年下半年，军统电讯处侦译到日本将对美国进行偷袭的情报，驻美武官郭德权立即将情报转给美方，而美方毫不为意。“珍珠港事件”后，傲慢的美军才想起郭德权提供的情报，但为时已晚。由此事件美方有了与“军统”合作的愿望。²郭德权因此在外交界有了一定声望。外交部指令中国驻德代表团施以援手。

黄琪翔立即派人前往奥地利调查，查明真相后电告外交部，并提出了营救方案：“马熙程经营黑市，四月间被奥警拘捕。缪代团长培基亲往维也纳营救，无结果。现奥高等法院定日内开审。除将必需文件交马夫人携奥外，拟於宣判后，请沈代表士华援释

¹ 黄琪翔致旅德华侨工商总会常委陈铭奎信。见台湾“国史馆”“外交部”驻欧洲国家使领卷，典藏号020-100300-0141。

² 郭德权于1947年5月21日任陆军少将，1949年7月12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遣送回国。”¹ 外交部随即同意了黄琪翔的营救措施。外交家沈士华（1900—？）早年赴德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47年8月任中国驻奥地利代表（公使衔），同年12月任中国驻奥地利全权公使。

1947年11月，黄琪翔会见了德国老朋友法

肯豪森。法肯豪森将军曾经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1937年淞沪会战时与黄琪翔并肩战斗过。德国战败后，法肯豪森曾被盟军逮捕，移交比利时政府被判12年徒刑，因其非纳粹分子，不久释放归德。此时他居住在美军占领区的西柏林。法肯豪森十分想念中国，希望能再次前来中国为蒋介石效劳。11月13日，法肯豪森请黄琪翔转给蒋介石一封信，云：“余今随时准备供蒋主席驱使。余来克谢恩修养已一周。余之将来命运，现尚不能预卜，俟有机会，当即奉告。”² 蒋介石没有邀请法肯豪森再次来华。

在德国期间，黄琪翔最不愿意与德国人提及的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内战：“他（黄琪翔）说少数知识水准高一点的（德国）人偶然也会和他谈起中国问题，问他中国为什么打了八年仗之后，还要接着自己打自己，（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喜欢打？他很难回



1946年，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在德国浏览时的合影。

1 见台湾“国史馆”“外交部”驻奥国问题卷，典藏号020-041701-0008。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37-112。



1947年7月，卫立煌将军来到柏林看望黄琪翔。

答这问题，因为那时他的身份还是官员。”¹其实，黄琪翔的内心极其厌恶内战，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残酷战争，了解中国人民的痛苦。

不过，此间从国内来柏林的两对夫妻，均是代表团的重要客人。他乡遇故知，让黄琪翔夫妇感到非常高兴。

第一对，就是黄琪翔在中国远征军时期的司令长官卫立煌夫妇。

1945年6月，卫立煌就任陆军副总司令后与韩权华女士在昆明的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为证婚人。韩权华女士是卫立煌的第二任太太。卫立煌第一任妻子朱韵珩，是美国基督教会镇江崇实女子学校的校长，1939年病逝。

韩权华（1903—1985）是位美女，她于1922年考入北大文科预科，后来由河北教育厅保送官费留美，回国后嫁给了卫立煌将军。卫立煌结识韩权华是由他的高级参谋邵光明介绍的，邵光明的太太叫王亚全，是韩权华留美同学。²

1 黄琪翔接受香港记者采访。见1949年1月7日香港《文汇报》“黄琪翔谈柏林冷战”。

2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p298。



1947年，黄琪翔郭秀仪与李汉魂吴菊芳夫妇在柏林。

1946年11月底，卫立煌夫妇由上海启程出国，先到了日本，然后去了美国。1947年7月，卫立煌夫妇由美国纽约乘飞机赴巴黎，然后去了德国。他知道黄琪翔在柏林，所以赶到驻德代表团官邸来见黄琪翔。

第二对，就是李汉魂夫妇。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回忆说：“1947年我和李汉魂去欧洲旅行，到了柏林。那时黄琪翔是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他亲自来接我们。柏林有些地方是禁区，不让一般人进入。黄琪翔坐上挂着上将标志的汽车，带我们到东柏林和西柏林到处参观，一路通行无阻。他们热情招待我们，请我们参加了很多宴会，送给我们许多礼物。至今我仍十分感激他们夫妇两人的盛情。”¹

1948年5月，法根豪森将军闻知蒋介石当选为总统，让其夫人请黄琪翔转发致蒋介石贺电。黄琪翔5月15日致电蒋介石云：“顷接前德总顾问福根（法肯）豪森夫人五月九日来函，略以福

¹ 《流金岁月》p196。李吴菊芳文章《关于郭秀仪的两三事》。

氏现被禁比京，欣闻钧座荣选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他嘱代为驰贺，略谓：‘鄙人谨以至诚，庆贺钧座荣选为中华民国总统，特重申敬意与忠诚外，敬祝诸事顺利。’等语，谨请鉴察。”蒋介石于6月9日批复：“复来电，感谢并祝（他）健康。”¹法根豪森后来出任了中华民国与德国的文化经济协会名誉会长。

这样，无所事事的日子如同白驹过隙，过得飞快，一晃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¹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10-104。

四、回国述职

1948年3月20日，美、苏两大阵营的四国管制委员会举行关于德国马克改革的会议，爆发了激烈冲突。苏联总督兼驻德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愤然退场，从此管制委员会名存实亡。

6月18日，西方占领区宣布改革德国货币政策出台，23日，苏军占领区也如法炮制，以牙还牙。东、西柏林开始严重对抗。

7月24日，苏军突然截断英美控制的西柏林通往外界的铁路和公路交通，200万柏林人民的生活物资就此断绝——苏军企图以此举将英美联军赶出柏林。而美国为坚守孤城，只得动用飞机，将粮食、煤炭等生活物资空运到西柏林。美军的运输机平均每五分钟降落一架，十五分钟卸货完毕再次起飞。从此西方“各代表团团长座车所用汽油每周配发五加仑，团部及团员住宅早晨六时至八时，下午八时至十时有电力供应。”连代表团的日子都如此艰难，普通柏林人民的日子就可想而知。

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柏林，而柏林就如同一只炸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媒体普遍认为，一旦柏林“爆炸”，西方与苏军接火，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48年8月4日，黄琪翔按惯例给民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

杰写了一封信，并附有一份数千言的“四强在德外交策略”报告。¹

外交部长王世杰（1891—1981）是湖北省崇阳人，字雪艇。黄琪翔在信中说：“雪公部长钧鉴：四强对德基本政策纷（分）歧，利害冲突，造成目前最严重局面，德国及柏林最近发展情况，业经随时扼要电呈，祇以文字所限，未能详尽。兹与缪参事及陈育凤兄逐日会谈，对时局问题交换情报，细加研究，将分析所得，加以意见，由育凤兄执笔作成报告，恭呈。”说明这份关于“四强在德外交策略”报告，是黄琪翔组织缪培南参事、陈育凤等三人集体研究的成果，由陈育凤执笔完成。

这份“四强在德外交策略”报告，开宗明义就点明苏联和美、英联盟斗争的焦点是：“苏联封锁柏林，全欧政局为之震荡不安，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局部纠纷，事实上是整个德奥问题的争执。盖苏俄战后在欧基本政策，一方欲在德奥组织共党极权国家，他方又用尽心机榨取德奥赔偿物品，以补偿战时损害。英美计划却在防止共产主义向西推进，故先主复兴德国经济繁荣，使德国人民先能自足自给，减轻英美财政担负，免德国人民思想急趋左倾。根据上项原则，遂积极实行伦敦决议，准备建立西德临时政府，毅然改革货币，想在马歇尔援欧计划下，复苏德国人民经济，以为这个计划成功，苏联共产主义西进必遭阻止，东占领区组织定受威胁。六月廿四日苏俄藉口货币问题，实行封锁柏林，积极的要逼美英法军队退出柏林，消极的要把柏林并入苏俄经济体内。”

报告从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乃至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上作了深入分析，结论是：“苏俄如用武力压迫，美英等必用武力对抗。”

黄琪翔的这份报告，立即引起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外交部长王世杰批示外交部的欧洲情报司“参考”，同时呈报蒋介石。

8月28日，外交部复电：“琪翔团长勋鉴，八月四日台函诵悉，附寄‘四强在德外交策略’报告一件。对于此次‘柏林问题’

¹ 黄琪翔致王世杰信，以及“四强在德外交策略”报告，作为民国外交部档案，现收藏在台湾“国史馆”与“中研院”近史所，编号为长字第5918号。

之了解，颇有参考价值，殊深佩慰，嗣后仍希随时以研讨所得，寄部参考为荷。”等语。¹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急遽变化，国共两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已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1948年7月初，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战争爆发时的3.14：1，变为1.3：1。而且，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日益衰落，越战越萎靡，反而是共产党的军队显示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气概。

1948年8月，林彪统率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70万官兵，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国民党军队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已被解放军分割、压缩，使他们只能龟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北宁铁路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全靠空运，导致物资供应严重匮乏。

东北成为全国第一个解放军军力超过国民党的地区，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把决战的第一个战场选在东北。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统帅部对东北战略尚无决策，蒋介石与卫立煌仍然为打不打通沈锦线、是否要将主力撤到锦州？在争执不休。

黄琪翔回忆说：“1948年以来，解放战争（中共的部队）著著（节节）胜利，形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而在柏林，则苏、美两国因为西柏林换用新马克问题，闹得形势也十分紧张。人们在谈论着苏、美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当时美军总部的政治部顾问墨菲曾为此召集接近西方的各国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征求意见。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各国人心厌战，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小。这是我和美国外交方面负责人唯一的一次接触。”²

黄琪翔回说：“我对于国内的国共战争情况是关心的，但我始终把希望寄托于国共重开和平谈判。”³他依旧相信国民党的军

1 现存台湾“国史馆”与“中研院”近史所，编号长字第5918号。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力是强大的，因为经历过抗日战争历练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在抗战后期，它得到了充足的美援，武器装备已是十分先进，兵源甚多，不大可能被共产党的部队在短时间内快速吃掉。

突然，黄琪翔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黄琪翔说：“9月间，正当蒋介石军队在山东战场上连战失利，济南失守、王耀武被俘的时候，我忽然接到国防部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是：‘闻柏林形势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如何，希速回国报告。中正。’”¹

黄琪翔后来回忆说：“大约在九月，忽然有一天，我接到蒋介石个人署名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是：闻柏林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的可能，究竟情况如何？希即回国报告等语。我当时推测蒋介石在‘剿共’战事失败情况下，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是完全无望的。我还是希望蒋介石在了解这个国际情况之后，采取恢复国共和谈政策。我于是决心回国。”²

1948年9月28日，黄琪翔夫妇启程回国述职。黄琪翔离开柏林后，其驻德军事代表团的工作由副团长缪培基负责。他在离开柏林以前，对中央社驻德国记者说：自己携带家属和副官一行，将在法兰克福、巴黎和布鲁塞尔三地作短暂停留，然后直飞上海，而且表示自己“不久即可返任。”³

途经法国巴黎，恰巧第三届联合国大会在巴黎召开。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是挪威人特里格夫·赖伊，他是1946年2月1日当选为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⁴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凌鸿勋（1894—1981），当选本届大会副主席，并被推选为第四小组主席。⁵10月18日，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为参加联合国会议而抵达巴黎。黄琪翔与王世杰举行会晤，介绍了驻德军

1 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p8。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1948年9月13日天津《益世报》第二版。

4 1951年特里格夫·赖伊再次连任，后因支持联合国对朝鲜战争进行军事干涉，被迫于1952年11月10日辞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

5 1948年7月5日《外交部周报》第二版。

事代表团的情况。

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彭学沛（1896—1949），历任内政部代理政务次长、行政院政务处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职。¹为迎接黄琪翔夫妇，彭学沛在巴黎中国饭店的“天下乐园”酒楼宴请他们，还邀请了时任中国政府驻巴黎领事凌其翰（1906—1992）、时任驻意大利大使馆公使薛光前（1910—1978）作陪。

中国人身在异乡，内心真正的牵挂自然还是自己的祖国。席间，这些外交官们讨论了中国的前途问题。

彭学沛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前途，表现出悲观情绪，感觉前途渺茫。彭学沛说：“我准备流亡三年，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可是彭学沛没能等到三年以后，在当年，即1948年12月21日，他乘飞机赴香港办理公务时，因飞机失事罹难。

薛光前说：“我看大局未必不可为。目前这场（国内）战争可能是一场胶着战，（国民党政府）还有江水滔滔的长江是一条天险，可以凭险而守，划江而治，苦苦地守住江南半壁天下，指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彭学沛当即摇摇头，接着说：“我看长江也靠不住。”

黄琪翔本来不想说话，因为他与凌其翰是第一次见面，不了解对方的背景，故而不方便有话直说。见他们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抱以如此的幻想，实在有些书生气，忍不住，黄琪翔便敞开了心扉。

黄琪翔谈了自己的三点看法：第一，以他自己在德国的观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因为美、苏之间的马克思主义之争，而演变成一场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如果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和谈不成，一旦开战，长江是守不住的，政府必败无疑；第三，国共内战，最大的牺牲者是中国人民。这是最叫人痛心的。

黄琪翔的谈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多年后，凌其翰先生在

¹ 彭学沛在历史上属于国民党的汪精卫派，在1927年以前与黄琪翔属于同一政治阵营。



1948年10月15日，黃琪翔将军夫妇回国述职，在上海机场与外甥女刘帼英（右一）合影。

北京与黃琪翔夫妇相聚，回忆起这次聚会，他对黃琪翔的远见卓识极为赞赏。¹

黃琪翔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素有军人政治家的赞誉。程思远证实：“黃琪翔同志性和易，有仪容，待人接物，穆如春风，见者几难令人相信他曾是北伐时叱咤风云的铁军军长。因其雍容尔雅，故有军人政治家之称。”²

10月12日，黃琪翔夫妇飞抵曼谷，在此勾留三天。当时泰国名为暹罗，中华民国驻暹罗的大使是谢保樵。黃琪翔的行踪已受人关注。当日中央社驻暹罗站报道说：“（暹罗）大使馆顷接驻荷兰张大使来电谓，驻德代表团黃团长琪翔偕夫人，将于十二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乘KIM飞机来暹，在暹拟作三日勾留。”

1948年10月15日，黃琪翔夫妇回到上海。当天的中央社报

1 以上资料见《黃琪翔传》p128。

2 《纪念黃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16，程思远文章《深切怀念黃琪翔同志》。



1948 年国民政府法币贬值严重，堆积如山的 10 亿元法币价值与 3400 元美金等值。

道说：“我驻德代表团团长黄琪翔返国述职，于十五日下午三时乘机抵沪，定日内晋京。”¹

黄琪翔回到国内，所见所闻令他极为失望。他说：像德国这样的“战败国的人民，虽然远不如从前，但德国人民在盟军管制之下生活，仍比较我们中国人民目前所遭受的不知要好出多少

倍。三年多来，德国人民的粮食一直很缺乏，而且因为是战败国，每一粒口粮都要受到盟军的支配和供给，可是还没有见到有德国人，在这种情形下饿死冻死的事。但作为一个战胜国的中国人民，在今天的情形下，饿死冻死的就太平常了。中国人民在今天所过的简直就是生活。德国的若干大城市的房屋在战争中毁坏的，几乎是十分之八九，但德国人民还没有到今天中国人民所过的流离失所，栖身无处的地步。”²他同情祖国人民的遭遇，坚决反对内战。他渴望和平，赶紧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黄琪翔随后只身前往南京，去向委员长蒋介石述职。

他此时仍然一心一意希望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重开真诚和谈。这无论对哪一方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国内的形势与他一年前去国时已经大为不同

黄琪翔之前参加了 1946 年举行的“制宪国大”，却因为身在德国而缺席了 1948 年的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而“行宪国大”开得波谲云诡，已经充分显示出国民党内部离心

1 1948 年 10 月 16 日天津《益世报》第三版。

2 1949 年 1 月 15 日香港《新生晚报》刊登的文章《记黄琪翔将军》。



由于法币价值暴跌，通货膨胀严重，这是1948年上海民众挤兑黄金的情形。马克·吕布摄影。

离德的现象。

1948年4月召开的“行宪国大”，有两个热点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其一是关于确定首都的问题。来自华北、东北、西北等省的国大代表提议，希望把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北平。但蒋介石认为，南京对国民党更为有利，因为它政治稳定，经济条件好，军事力量强，特别是对于“剿共”更为有优势，而共产党的势力主要在北方。在表决这天，白崇禧是大会的执行主席，他主动联络蒋介石，贯彻蒋介石的意见，结果以鼓掌而非投票的形式，强行撤消定都北平的提案。

其二是关于副总统的竞选问题。鉴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无人能及的威望，总统一职非他莫属，但是副总统一职，竞争激烈。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人是候选人。选票大多落在孙科、李宗仁、程潜三人头上。蒋介石的原意是让孙科当选，理由是副总统之位不要军人坐，应该让位于文职，而且孙科是孙中山的哲嗣。可是，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不

顾蒋介石的再三劝退，偏要竞选副总统。结果在4月29日，李宗仁果然当选，这让蒋介石很没面子，于是总统蒋介石与副总统李宗仁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得益于白崇禧鼎力相助。白崇禧自谓：“我个人与这次副总统选举的关系极大。”还说“人家说我是帮他（李宗仁）最得力的一个。”¹

黄琪翔自德国回来的时候，总统依旧是蒋介石，而副总统李宗仁已经上任。

黄琪翔说：“我这次由柏林回国，原来就抱着一个目的，想向蒋介石说明第三次大战一时不可能发生，要他恢复和共产党的和谈，组成联合政府，进行合作。我并设想，如果蒋介石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我就决心辞职，不再到德国去了。”²

黄琪翔在南京等待蒋介石接见的时候，住进了南京励志社招待所。励志社成立于1929年1月的南京，社长就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办公室均在励志社主楼的二层。蒋经国住在三层。³

1948年10月，总统蒋介石在南京前后两次接见了黄琪翔。

民国著名记者陆铿，在其《铿锵集》中写了《黄琪翔见蒋介石的故事》一文，说：黄琪翔返国后“到达南京的第二天，蒋老先生就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他，第一句话就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黄的答复竟是：‘打不起来。’发现蒋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也只好照实陈述柏林所见所闻！冷战几乎无日无之，但热战，从两个阵营看，都没有可能发动。蒋老先生听后失望之余，就站起身来送客，告诉他：‘你休息休息吧！’黄原来认为休息几天就可以返回柏林，后来得到通知根本不必回任了。反映蒋介石失望到什么程度。”

针对这次与蒋介石的会面，黄琪翔自己是这样记述的：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548。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南京励志社招待所的建筑，始建于1929年，建成于1931年，其主楼等保存至今完好，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飞机，经过三天航程，10月初到达上海，随即转赴南京，会见了蒋介石。

蒋一看见我，装着很客气的样子，开口即问：

“柏林情形怎么样啦？世界大战快爆发了吧？”

我知道他喜欢听的是什么，但我没有理由满足他的愿望。我简单地答复说：

“‘柏林危机’似乎快要过去了。苏联和美国都不想打仗。看样子，冷战还会继续下去。”

蒋对此大失所望，脸色变得很难看。他让我喝茶。

不识时务的我，端起茶杯，以缓和的语调大胆进言，说：“委员长，还是以恢复国共和谈为好吧。”蒋默然不答，他哪里还能考虑这个问题呢！他吩咐我：“辞修有病，现在台湾休养，你去看看他吧！”

我知道话不投机，答应回上海后再赴台湾，旋即告辞。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与蒋介石见面和脱离他的政权的经历。¹

黄琪翔还说：“我到南京见了蒋介石。我根据自己对于第三次大战不可能马上发生的看法，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他感到很失望。对于国内问题，我并提出劝告，要他设法恢复和谈，他更加表示不耐烦。蒋介石当面告诉我，不必再回德国去了，这正符合我的愿望。因为我回到国内以后，亲眼看到解放战争（共产党）的胜利情况，认为蒋介石的彻底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愿再度流亡海外。蒋介石叮嘱我到台湾看看陈诚，我照办了。”²

蒋介石叫黄琪翔不要再回德国去，任命他为军委会的战略顾问，并亲口叮嘱黄琪翔去台湾看望陈诚。那时陈诚在台湾养病。表面上看，这是蒋介石对黄琪翔的关心，因为他知道黄琪翔和陈诚的关系很深。黄琪翔之所以能够避开内战，远走欧洲，也正是

¹ 黄琪翔文章《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记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p9。

² 黄琪翔《我的自述》。

得益于陈诚的推荐。他自然不能忘恩。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却一再催促他去台湾，黄琪翔不能不对蒋介石的用心保持警惕。他说：“我不能不考虑蒋的用意，是否借此来考验我听不听话？我之最后终于决定到台湾去一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¹

恰巧在此时，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1895—1974）来南京参加军事会议，也住在南京励志社招待所。俩人做过两次私下的谈话。“黄琪翔基于他对当时国内局势的看法，殷切希望停止内战，恢复和谈，以实现国家的和平。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极大风险，坦诚对傅作义说：‘此次内战毫无意义，也只能延长战祸。使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中，在此关键时刻，正是有志者当机立断，对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时候。’希望傅作义能在结束内战，促进和平方面起些作用。”第一次谈话时，傅作义抬头凝视了黄琪翔，沉默不语。第二次再谈，傅作义还是没有表态。²

其实，傅作义当时所辖四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的兵力，位高权重，连蒋介石都很倚重他。傅作义一定会想：你黄琪翔胆子真够大的，咱俩还不算很熟，你居然敢来策反我华北“剿匪”总司令——即使是熟人的话，在这个大厦将倾的危急关头，正常人都快要变成疯子，你黄琪翔更应该格外小心呀。³

傅作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1948年6月，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1883—1950）是汤恩伯的恩师。1949年1月，陈仪眼见国民党要垮台，欲尝试策反京沪杭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投共，不料汤恩伯将此事密报给了蒋介石。陈仪在1949年初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随后被软禁。1950年4月陈仪被押解到台湾，后来又被囚禁于基隆。1950年5月，蒋介石以匪谍罪的名义，指示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仪死刑。6月18日清晨5时许，陈仪于台北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黄琪翔传》p129。

3 解放后黄琪翔与傅作义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据《黄琪翔传》载，傅作义曾经与黄琪翔见面，忆及此时，“傅作义至为称赞黄琪翔当时的胆识和坦诚。”

市马场町刑场被枪决。

离开南京后，黄琪翔回到上海，对妻子郭秀仪说：“蒋介石的意见不能公然对抗，因为周围已有特务在监视。如果去台湾，（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他感到很为难。

郭秀仪也很着急，为丈夫出谋划策说：“你去台湾先到香港，然后从香港机场直接溜走掉算了。”

黄琪翔考虑的比较周全，他说：“这样做不行，你们都在上海，我一溜走，国民党就会把你们都抓起来。”黄琪翔是军人，他深知连坐法的厉害。

黄琪翔这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台湾。¹1948年12月14日，黄琪翔见到了主持台湾政务的陈诚。²陈诚当时的职务是台湾省警备司令，还没有上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那是1949年5月19日以后的事。

俩人再度相见，没有了抗战胜利之初的喜悦。说起当前内战形势，陈诚皱起眉头，满脸悲观。

黄琪翔试探着谈到陈诚的未来前途。黄琪翔自述说：“我劝他出来从事奔走和谈工作，他表示不能接受，并建议我搬家到台湾去。”³陈诚的态度反映出两个意思：其一，不论蒋介石的下场如何凄惨，陈诚决心一条路走到黑，哪怕为蒋介石殉葬也义不容辞；其二，他劝黄琪翔搬家到台湾去，也是好意，或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度携手反攻大陆，或是可以因此偏隅一方，颐养天年，相伴老死。

从陈诚在12月16日拍发给蒋介石的密电可知，黄琪翔是于12月14日抵台，在台湾住了三个晚上之后于17日返回上海。陈诚在电报中向蒋介石汇报自己与黄琪翔的“晤谈结果：一，渠（他）已遵钧谕不出国；二，在代表团团长名义未开缺前，拟先回粤稍住。对于工作，以目前环境，似不急要。”

1 以上资料见《黄琪翔传》p129。

2 1948年12月16日《申报》第二版。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蒋介石确实有意要留用黄琪翔，他在陈诚的来电上批示道：“拟留黄琪翔在国内服务，希召其赴台，一商其志愿。”¹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黄琪翔尽快携家去台湾，至于黄琪翔以后的工作安排，可依照黄琪翔本人的意愿再行商量。

但是，黄琪翔有自己的理想和生活，不想为蒋介石政权殉葬。看到陈诚已经无望新生，于是他告诉陈诚说，像定居台湾这样的大事还需要同母亲、夫人商量一下，便乘坐飞机回到了上海。

黄琪翔在上海住了几天之后，就秘密逃往香港。

他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与海员会的关系，代买了一家老小前往香港的船票，然后由他们护送上船。黄琪翔此时已化名、化装，还扮着一位病人的样子，一上船就蒙被大睡，避开了人们的视线，这样才安全抵达香港。郭秀仪回忆说：“当时系农工党的欧阳平同志代我们买的船票，并送我们上船。一上船，琪翔就裝作病人，蒙着头睡下，到香港后就在亲戚家住下。”²这时已是1948年年底，距离1949年的新年不远了。黄琪翔这才正式脱离国民党阵营

1948年12月25日，中共新华社发表《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文章说：“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吴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45-132。

2 《流金岁月》，p104。郭秀仪文章《真挚友情，永世难忘》。

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¹一共是 43 位，即所谓的头号战争罪犯。黄琪翔实在高兴不起来。这个名单中的大多数人，他是熟悉的。这些人早年大多追随过孙中山，后来又追随蒋介石。他们是民国时代的弄潮儿，因为坚持反共立场，如今成为人民的罪人。

可是，有极个别的人，因为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共战犯名单中而感到宽慰和欣喜。比如卫立煌将军，他与共产党的交情很深。抗战时，据《彭德怀自述》中说，十八集团军“归卫立煌所指挥，但他又从未指挥过我们”，就是说，身为长官的卫立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坚持不干预、不夺权、不搞“磨擦”。1938 年春，他一次就拨给八路军子弹 100 万发，手榴弹 25 万颗，得到了共产党的好感。甚至，他去访问延安，还亲自向中共提出自己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中共考虑利弊后，派林伯渠答复卫立煌说：“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²

卫立煌与共产党人的来往，引起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的察觉。他们四处搜集卫立煌和共产党人往来的所谓“材料”。在香港时，他知道曾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学校长的好友杨杰将军（1889—1949）要“投共”。卫立煌便去看望杨杰，恰逢杨杰外出，就给杨杰留下便条，表示第二天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一早，杨杰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寓所。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毛人凤手里有一份暗杀黑名单，卫立煌确信自己也在这份黑名单上。所以他闻讯自己的名字也出现在中共的这份战犯名单上，长叹道：“我有救了！”³

还有白崇禧，他是蒋介石的老对手，曾经于 1927 年和 1948

1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 月《43 位战犯的后半生》，p1。

2 《43 位战犯的后半生》，p364。

3 《43 位战犯的后半生》，p363。

年两度逼迫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当然要怀恨在心。在解放战争的后期，白崇禧的部队被解放军收拾殆尽，毛泽东还骂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再加上他的铁杆政治搭档“代总统”李宗仁又借病出逃美国，“光杆司令”白崇禧走投无路时，共产党公布了这份战犯名单。白崇禧因此得救。蒋介石向他敞开怀抱，邀请他去台湾。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逃到了台湾。针对蒋介石收容白崇禧去台湾之举，张发奎赞誉蒋介石先生的胸怀宽广，人格伟大！而史学家则认为白崇禧此举是“轻率的决定”，因为白崇禧在与蒋介石长达22年的斗争中，让老蒋吃尽了苦头，而白崇禧最后是“蹊跷”地死于台湾。这些都是后话。

黄琪翔此次秘密来到香港，很快被记者发现。当时香港的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议论纷纷，猜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马上会爆发，因此人心惶恐。针对一些媒体炒作第三次大战就要爆发的传闻，黄琪翔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美苏“虽然都玩手段，但距离战事却遥远得很。”¹

黄琪翔还在上海时，邂逅了张发奎，可是张发奎不知道黄琪翔随后曾悄悄去台湾拜访陈诚。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说：“我去看望当时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黄琪翔。蒋先生叫他回国写一份报告，然后又叫他回德国去。他已经拿到飞机票，正准备把行李托付海运。蒋先生突然命令他留下来改任战略顾问。他对我一声不吭就失踪了，后来才知他去了香港，加入了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那伙人信任他，因为他一向左倾。我相信，如果蒋先生让他回德国，他绝不会出走投共的。”

张发奎认为，如果蒋介石让黄琪翔夫妇回到德国去，黄琪翔是绝不会出走投共的。这个判断，或许有他的依据。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可人的命运不能假设，历史的进程总是跟神秘魔方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1949年初，黄琪翔在香港露面后，公开了自己对时局的判断，

¹ 1949年1月7日香港《文汇报》。

认为和平已经没有希望。一些反共人士希望他再上战场，与共产党绞杀。《南洋周报》发表署名“安心”的文章，说：“尝在中国军政场合中，负有盛名的龙云、黄琪翔、黄绍竑诸将军，到了香港，住的颇久。国家在动乱中，闻鼙鼓而思将帅，他们都是军政界的良才，及锋而试，亦有静极思动的意向否？”又说“现国家仍在内争继续进行，人民处水深火热之中，亟待拯救。不知曾经政海风浪舍己为人的龙、黄诸将军，对时局作何看法？亦肯一举手以救这芸芸众生否耶！”¹黄琪翔则回答说：“和平是决计没有可能的。两年前我曾经主张过和平，但现在已不是时候。新的局面是一定要来的，旧的局面已毫无可取之处，但新的究竟会好到甚么程度？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²

1949年1月13日，黄琪翔正式亮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他在接受法国法新社记者访问时说：“蒋（介石）已经完了，失掉了人民支持的南京政府（李宗仁代总统）也拖不了多久。”关于预定在哈尔滨举行中共所领导的新政协会议，他说：“会成功的”，“坚信由于共产党与各反蒋党派合作的结果会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权。”他还说：“目前他自己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他是同情共产党及他们的朋友，也许他会参加反蒋集团。”³

在接受法新社记者访问的最后，黄琪翔说自己“将长期住在香港并无前往华北的打算。”这是黄琪翔在使用障眼法，故意放出的一个烟幕弹。实际上，他此时已向中共地下党提出了前往中共解放区的请求。中共方面则希望他暂时留在香港，以便策反其他国民党的高层将领。

1 1949年香港《南洋周报》第25期第2页。

2 1949年1月7日香港《大公报》。

3 载香港《新生晚报》1949年1月13日法新社本港讯。

五、迎接新中国

国共内战的进程，完全超出了黄琪翔的预计。国民党部队人心涣散，一触即溃。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4个月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在同国民党进行的战略决战中，取得了包括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至同年11月2日）、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平津战役（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三个战略性战役的彻底胜利。

1948年，解放军攻克拥有10万重兵、工事坚固的山东省首府济南。毙伤国民党军22423人，俘获国民党王耀武中将（1904—1968）及以下61873人。解放军的部队变得无比强大，拥有了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实力。

济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的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大部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备受打击的国民党政府只能幻想用和谈来阻挡、延缓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国民党总统蒋介石与代总统李宗仁已经离心离德，相互掣肘，甚至彼此都提防着被对方暗杀。国民党阵营呈现

出一盘散沙态势。而共产党抓住时机，再接再厉，痛击着国民党的势力。

1948年12月28日，蒋介石批准黄琪翔出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委员。¹黄琪翔已对蒋介石政权彻底绝望，因为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当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在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北平许多开明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并于1949年1月21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31日，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的李宗仁政府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他们觉得中共和谈条件太过苛刻。中共方面再无客气可言，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于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3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三野战军一部攻占了南京总统府，南京政府至此彻底垮台。

黄琪翔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源自于自身的腐败，而张发奎则认为，“共产党摧毁了我们的士气，战争的胜负不是依靠武器而是士气。”²其实，这两位国民党将领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是眼睛往上看，另一个则往下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愿意会为国民党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去殉葬呢。

黄琪翔此时身在香港，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和报刊。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显示出衷心的拥护和强烈的向往。他认为，共产党执政后，“中国从此可以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统治，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了。我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兴国家的政治面貌，当然不可能有具体的、正确的预见，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337-126。

2 《张发奎口述自传》，p364。

但在报纸上接触到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则十分欣赏，认为十分正确，认为按照这个方针做下去，中国便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繁荣的国家了。假如说，我当时对共产党有信仰、有信心的话，也就是止于这一点。”¹这就是黄琪翔在那个风雨飘摇年代里最真实的想法，也是他主动投身到共产党怀抱的根本原因。他公开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个人出处，前天如是，今天亦如是，在国家人民的需要上，个人是从不考虑其他，只求有利于国家人民，随时准备工作。”²

许多人都在关注黄琪翔。当黄琪翔自台湾返回上海后，他的“第三党”战友连瑞琦说：“我把这个消息向吴克坚³汇报。我们中一位同志劝黄（琪翔）不要做蒋介石的宣传员，希望他到解放区去，并说服了他的家属，他们都同意去。”“我们建议黄（琪翔）乘此经台湾去香港，到港后与温康兰联系，转往解放区。他在香港等了一个时期，借机策反广东军队起义。黄琪翔是在北平解放后才去解放区的。”⁴

在香港，黄琪翔遇到众多亲朋故旧，大家都焦虑不堪，纷纷在寻找出路。所谓出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大约有四条：其一，就像陈诚那样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以不忘旧主之恩；其二，去海外，最好是美国。美国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度。当时从香港飞美国的机票是五百美金一张。李宗仁、李汉魂他们去了美国；其三，留在香港，比如张发奎。香港是英国的租借地，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1949年1月5日香港《大公报》。

3 吴克坚（1900—1986），中共隐蔽战线上功勋领导人之一。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吴克坚在上海加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1929年，由他负责保护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32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出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曾协助国民党将军龙云出逃，计划乘船北上解放区，但未能实现。1949年在上海负责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进行策反工作。获得敌人大量的军政战略情报，参与组织并成功地争取多起国民党军事人员的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职。1986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4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沪滨掠影》，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p15。连瑞琦文章《动员黄琪翔去解放区》。

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一旦国际间发生意外，还可以再度选择进退之路。进，可以回到大陆。退，可以浪迹天涯；其四，就是回到祖国，投身到共产党的怀抱，洗心革面，重新步入人生之路。问题是，这些国民党的将领们，历史上都有着与共产党的恩恩怨怨，许多人与共产党打过仗，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双手还沾染过共产党人的鲜血，比如杨虎。他们难免不怕后患，担心共产党秋后算账。

黄琪翔没有犹豫，他决定回到祖国，与共产党人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许多熟悉黄琪翔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惊诧，因为在黄琪翔的历史中，他一向都同情共产党，与共产党中的许多领导人保持着亲密友谊，比如周恩来、叶剑英、贺龙、周士第等人。

一些香港媒体对于黄琪翔的政治态度，作出了想当然的误判，说：“当他从南京初到香港时，确曾一度极为活跃而敏感的人士，亦均认为他这次来港或为南京方面派来与李济深打交道的‘和平人士’之一，籍以试探李（济深）、蔡（廷锴）方面的条件。以他过去与李济深、蔡廷锴等的关系，这种推测与揣想也不无道理。惟一经其与李接触之后，方知对方已远非当年‘福建人民政府’时代的人物了。故今年入春以来，他便一反常态突然变得非常沉默起来，就是偶尔遇见新老记者时，也顶多‘哈啰’一声，或者‘你好呀’的招呼一句。此外便什么话也不愿谈了，样子显得很颓废，尤其自从李济深悄然北上以后，这对于他，好像更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刺激！”¹这些记者误以为黄琪翔于1949年底来香港，是肩负着南京李宗仁政府的使命，来笼络李济深、蔡廷锴的。

这显然是一种假象。外人不知的是，黄琪翔在香港与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接触已非常频繁。他家雇请的厨子阿妈李少轩，是何凤山夫人的熟人。李少轩于1951年来到埃及大使馆何凤山家当

¹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版千秋出版社1949年版《反动派在港近况》之《意兴阑珊的黄琪翔》，p39。

保姆。何凤山把阿妈告诉他的情况写进了回忆录里：

1951年我们由香港请来一位阿妈，名叫李少轩，是小女曼礼的保姆。绶荣在上海早就认识她，这次未来开罗前，她在香港黄琪翔家中做过厨子。她说黄将军返香港后，拒绝返回台湾，家中车水马龙，非常热闹，每天不断的开流水席，来往的人都是中共的大头儿。黄某终日笑逐颜开，兴高采烈地说：“毛主席长，毛主席短。”后来全家决定搬往北京。临行前再三问阿少是否愿意同去，她很率直的笑道：“我没有享共产福的命！”¹

与共产党人秘密交往的同时，黄琪翔也时刻不忘邓演达一手缔造起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早在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之际，身在北平的民主党派都没有经费来源。北平市的农工民主党组织，当时叫中国农工民主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后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方荣欣（1912—2010）回忆说：“就在这困难时刻，季方同志有一天交给我一张四百万元（旧币）的汇票，说是香港的朋友寄来的。不久季方同志又悄悄对我说：‘给你的那张汇票，是黄先生（琪翔）从香港寄来的。’我听了随之联想到历历往事。琪翔同志，他对待我们党组织，堪称是苦心孤诣，关怀备至。他是一位深受我党同志们敬爱的领导人。”²

黄琪翔雪中送炭汇来的这笔款项，被用于这个组织的经费，驻会委员每人每月4万元（相当于人民币4元），工作人员每人每月2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元），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费用。这笔钱支撑了这个组织的运转，直到建国后，民主党派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为止。

1949年间，张发奎很不屑于黄琪翔的“投共”行为，斥黄琪翔为“投机”。显然，黄琪翔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没有与张发奎

1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何凤山著《外交生涯四十年》，p230。

2 《黄琪翔传》，p153。

私下交过心。张发奎不理解他。张发奎本人也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很敬重蒋介石，口口声声称之为“蒋先生”，可是当他到了香港之后，居然举起了“反共反蒋”的旗帜，走上了“第三势力”的旧路。张发奎成立的这个组织叫“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¹，纠集了被中国共产党开除的张国焘，以及顾孟余、张君劢、童冠贤、李微尘等人，还去争取美国政府的资助。美国政府向来极度自私，心口不一，他们从来不会想去做蚀本的买卖，而他们嘴上标榜的所谓正义，永远只挂在嘴上，因此张发奎等人组织的这个“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很快就寿终正寝。

早在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²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开列出一批有政治声望人士的名单，准备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这份名单上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等 29 人。第二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李济深和沈钧儒，说，“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1948 年 5 月 2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告知中央已决定，新政协会议的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375。

2 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中国共产党 90 年史话》2015 年 5 月第一版，p200。

召开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拟在“今年秋季”。¹ 随着三大战役的快速进程，尤其是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及北平城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改为北平，会议时间延至1949年9月。

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的代表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抵达解放区。他们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主要有：从北平经石家庄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这里是中共中央城工部的所在地；从上海或香港经山东到李家庄；从香港经大连到哈尔滨；天津解放后，从香港经过天津到北平。² 在中共方面，负责护送、迎接和安排这些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最高领导者，就是周恩来。

正在美国考察的冯玉祥，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后立即回国。他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1948年7月31日自美国乘坐“胜利号”轮船返国，途经黑海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行进途中，9月1日因轮船失火与女儿冯晓达一起遇难，享年66岁。³ 10月下旬，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抱着丈夫的骨灰赶到东北解放区，以实现冯将军的遗愿。

1948年8月初，从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人数最多。因为这些民主人士一遇到变革时期，最爱往那里跑，这似乎已是历史惯例。周恩来派钱之光前往香港，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等一起工作。潘汉年等负责联络、组织在港的一些抗日名将、民主人士做好进入解放区的准备，然后由钱之光用货船悄悄地把他们护送进入解放区。

钱之光回忆说：在香港，“每次都是由原来与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人去联系好，等载货回解放区的船准备好以后，就由他们

1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p5。

2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迎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p5。童小鹏、于刚、尹华的文章《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

3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594。白崇禧说：冯玉祥“是军委委员长，位高而无实权，不得志。到美国去考察水利，一到美国就反（国民党）中央，后来要到苏联去，船到黑海看电影，电影忽然失火，给烧死了。”

负责，把民主人士护送上船。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们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要调查熟悉；还事先约好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对付等等。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他们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我还另派工作同志随船护送。”¹

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钱之光他们在香港负责输送四批民主人士北上。第一批共十几位，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和章伯钧等，由中共负责人章汉夫陪同。他们乘坐的是从苏联租来的货船，名字叫“阿尔丹”。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母子、马叙伦、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30多位，由中共负责人连贯陪同，胡绳随行。郭沫若当时的化名叫“丁汝常”。鲁迅和许广平之子周海婴爱好无线电，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在船上收听到新华社播发沈阳解放的消息，大家很兴奋，还举办了一个庆祝会。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由中共负责人李嘉仁陪同。

以上三批均是抵达大连，然后去了哈尔滨。

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那时天津已经解放。他们是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寰澄等人，由中共负责人刘恕护送。3月25日抵达北平。

显然，黄琪翔的名字不在以上四批中共邀请的名单之列。事实上黄琪翔北上的时间已是很晚，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已经结束。这是因为中共希望黄琪翔留在香港，以帮助他们策反国民党军队

¹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迎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p48。钱之光的文章《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里的一些高级将领。

1949年8月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黄琪翔才从香港出发北上。他化装成一位病人，在中共特勤人员的帮助下登上一艘英国太古公司名叫“岳阳号”的客轮，驶离香港，前往天津的塘沽港。

与黄琪翔同行的还有著名旅美侨领、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1868—1955）。毛泽东于1949年1月20日发函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司徒美堂于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8月13日抵达香港，然后他与黄琪翔以及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一起坐上了“岳阳号”客轮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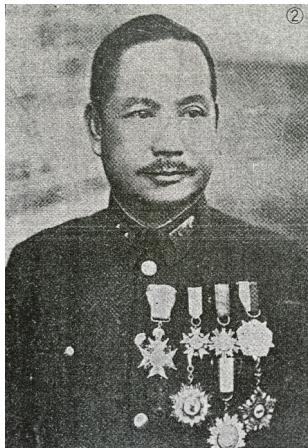
黄琪翔、司徒美堂这行人从塘沽港下船后，即刻由中共天津交际处的工作人员护送至北平。9月初，他们入住北平六国饭店。当时，天津解放才四个月，时任中共天津市市长是黄敬，副市长张友渔。

黄琪翔回忆说：“我到香港后，很快就和那边的中共地下负责人取得了连（联）络。我向他们表示，我愿意立刻到解放区去。后来他们接到指示，答复我，希望我在南方做些策反工作，因此未（成）行。此时农工民主党在香港的组织活动在继续进行，我对它的工作表示支持。我对于当时在报（纸）上接触到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也初步有所了解。1949年8月，香港中共负责人通知我，已为我准备好船位，要我到北京来，我抱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接受了通知，来到北京。9月间，我光荣地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¹

中共方面希望黄琪翔上将“在南方做些策反工作”，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请他对张发奎、薛岳、余汉谋、李汉魂等人施加影响，争取他们参加起义投诚²。这四位均是国民党上将，在国民党军队中享有威望。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p456。



吴奇伟

1948年5月，余汉谋临危受命升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到了1949年5月，陆军总司令由张发奎接任；薛岳时任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此前在欧美考察，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职后，他应召回国任上将参军长。3月，李汉魂出任内政部长。

黄琪翔与这些军界老同学们保持秘密联系，进行策反。他是怎样劝说这些将领们的呢？黄琪翔在接受香港

《大公报》记者访问时说：“将领们也很彷徨，他们找不到他们的道路。我告诉一些上层人物说：跑不是办法，你跑得了你的孙子也跑不了。若果你们认为打下去是对人民有利的，你就应出全力在战场上决个胜负；若果战争对人民是没有好处的，就自己吃点亏，请不要再打，让人民少吃一点苦。”¹他也不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接触，称“偶然碰碰头是有的。”结果，这四位老同学都拒绝向共产党投诚，黄琪翔所作的策反工作宣告失败。

不过，黄琪翔的另一位老同学吴奇伟中将，时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是薛岳的老部下。1949年5月，吴奇伟在广东东江地区率部起义，导致广东省的政局大乱。吴奇伟通电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并宣布投奔中共时，毛泽东、朱德复电，对吴奇伟等人的投奔，表示“极其欣慰”与“欢迎”。据后来和吴奇伟等同举义旗的魏鉴贤先生回忆说：他们的行动，“就是与黄（琪翔）的教导有密切关系的。”²

1 1949年1月7日香港《大公报》。

2 完颜绍元文章《暮境坎坷的黄琪翔》。

1949年7月，国民党第十二兵团总司令胡琏¹采取“纵深防御、移动防御”的原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他们分兵两路南下，成功摆脱了解放军南下围歼的计划，于7月14日从江西进入广东兴宁，然后进入梅县。就在胡琏兵团撤出梅县时，他们已经知道黄琪翔在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并“叛变”投共，于是一把火把黄琪翔家“仪园”烧了，只留下了残壁断墙。那时候，“仪园”是梅县当地最好的洋房之一，远近闻名，而且刚刚建好才三年。

这栋新楼名曰“仪园”，取郭秀仪名字中的“仪”字，是黄琪翔为实现对母亲的承诺，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在家乡水车墟修建的。它是一座西式两层的洋房，黄墙白沿，精雕细琢。洋房前有平台，后有庭院，十分漂亮。据当地人介绍，建造“仪园”的建筑工匠，是黄琪翔夫妇委托专人从汕头等地请来的，墙体由石灰、沙、黄泥加糯米等搅拌夯筑，因此十分坚硬。楼面底层为木桁，上面铺设杉木木板，再在木板上铺一层灰沙，然后再覆盖地板。这种复杂的工艺，起到了防潮隔音又坚固的作用。

1949年9月初，也就是黄琪翔的“仪园”被烧不久，黄琪翔来到北平城，被共产党安排住进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黄琪翔所住的房号是133号。

六国饭店是民国年间北平最著名的高级酒店。它最早由比利时人于1900年建成。这位比利时人所在的sleeping-car公司，是晚清年间中国火车之车厢的供应商。1905年，英、法、美、德、日、俄六国合资买下原来的西式宾馆，并推倒重建成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现代建筑，有客房200余套，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取名“六国饭店”。1949年4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派出以张

¹ 胡琏（1907—1977），陕西华州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属陈诚的土木系，国民政府统治大陆后期的著名将领。1949年去台，为首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兼福建省“主席”，后升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10月25日，胡琏第十二兵团与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在台湾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村，击溃一万多登陆金门的解放军，俘虏约五千人，取得金门战役的“胜利”。后受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晋级陆军一级上将。

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就在这里与中共谈判。¹

黄琪翔刚来到北平，堂妹黄甘英闻讯后领着丈夫张文松来六国饭店看望黄琪翔。这让黄琪翔喜出望外。堂妹黄甘英和丈夫张文松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潜伏在北平。黄琪翔这是第一次见到堂妹夫张文松。儒雅而又谦恭的张文松，给黄琪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黄甘英比堂哥黄琪翔小23岁，她的父亲正是黄琪翔小时候最为敬仰的族伯父黄锡铨先生。²黄甘英的丈夫张文松（1919—2011）是黄甘英于1943年在北平做秘密工作时的战友，由此相恋成婚。新中国成立后，张文松先后任北京市委政治秘书，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主任，市委教育部部长，市委常委。

张文松回忆说：“我早就知道琪翔先生其人，后来看了郭沫若同志在《北伐途中》一书中对琪翔先生生动的描写，更是心仰久之，想象中他应是一位风采翩翩的青年将领，所以当1949年夏他从香港北上，我和黄甘英同志与他在六国饭店初次见面时，竟仍然保留着郭老所写的琪翔先生的形象。他那时大约五十岁了，虽然略微发福，看起来却像四十岁的人，英俊不减当年，颇有儒将风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³

黄琪翔非常开心，对黄甘英张文松夫妇敞开了心扉，坦言“此次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毅然从香港回归北平，决心共建新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转变。”⁴

黄琪翔初到北平，还遇到一位旧属，就是共产党人廖沫沙。1940年廖沫沙跟随黄琪翔参加了枣宜会战，是黄琪翔的少校秘书。廖沫沙回忆说：“从（1940年在襄樊）那次同黄琪翔先生分别以

1 解放后六国饭店被国家接受，成为外交部招待所，后来更名为“华风宾馆”。

2 黄甘英于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威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妇委书记。1943年调回北平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4月全国妇联的机构成立，黄甘英先后任组织部科长、副部长，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3 《黄琪翔传》，p190。张文松《缅怀先哲 倍增钦敬》。

4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18，黄甘英文章《怀念兄长黄琪翔》。

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以后，才在北京重逢。这时他已经
是两鬓飞霜了。”¹

廖沫沙是在 1949 年 5 月应中共中央的电召，到北平市委机
关工作，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¹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第一版，廖沫沙《同黄琪翔先生在
前线的时候》，p15。